



共产主义者

月刊第2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6

时事

天价耳环事件--
一场特权与贪腐
的“现形记”

理论

革命者如何
“走向人民”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谁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CONTENTS

● 时事

● 理论

● 投稿 / 梯子

05

山西大同二审案——反对统治阶级为需要挑起对立

09

帝国主义与南亚次大陆危机

12

日内瓦贸易谈判——谁能睡个安稳觉？

16

武汉枪击案——一个人恐怖主义与资本主义

18

学术自由的幻灭：哈佛大学留学生被驱逐

●

21

谁在压迫谁？——特朗普指责南非对白人种族歧视

●

24

协和医院的董小姐，究竟为何平步青云？

●

28

天价耳环事件——一场特权与贪腐的“现形记”

●

30

马克思主义如何思考问题？

●

35

革命者如何“走向人民”

●

43

从坚定拥护到彻底反对——中国中产者为何投身反建制运动

●

53

人类社会是什么？

●

60

科学思想与意识形态

●

65

马克思主义还是身份政治？

●

73

我们不是成绩的奴隶——反对教育中的物化和扭曲

●

84

论仕途主义问题

●

88

左派内部自我批评

●

93

梯子推荐

山西大同二审案——反对统治阶级为需要挑起对立

2025 年 4 月 16 日山西大同二审案宣告判决，仍然维持一审时的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引发了社会的巨大争议，也引发了无数人对法治能否带来社会公正的怀疑。那么为什么山西大同二审案这件事情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七问七答中，证据链就有很多可疑之处。

例如说对于疑似使用春秋笔法将在男方床上收集到的精斑和混合 DNA 放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男方精斑和女方 DNA 有混合。而我们知道目前 str 分型去认定是否性侵更为司法届认可，若 str 分型在女方或女方贴身衣物上发现了这个 str 分型会成为强奸罪的有力证据。

但这里只是男方住处的床上有发现双方的混合 DNA 分型，而不是在女方身上或贴身衣物，不能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在这里所谓床上的混合 DNA 分型是不够证明实行了强奸，只能说明女方是在男方床上留下了一定痕迹，而不能证明达到了目前司法意义上的强奸罪的既遂标准。

综合通报里的所有证据，只能说明男方在自己家中对女方实行了一定强制性暴力手段，而不能证明有强奸的既遂。

如果只看物证的话是明显不足以满足强奸罪的定罪的。但是我们知道我国强奸罪实际上是口供大于物证的。强奸罪的前提是“违背妇女意愿”，女性若遭受强暴又往往会对自身进行清洗等等，使得很多时候确实物证的搜集确实比较困难。

那么这样一种口供大于物证的情况下又给下了很多操作空间，例如在这里作为证据的电话录音最初公布时男方在接受女方母亲质问是否实行强暴时回答“嗯”，并不是目前七问七答里的“哦哦，对对”这样一种明显的肯定。一系列证据并未行成闭合链条，排除合理怀疑。

而我们又看到这个案子发生的背景又有男女双方订婚但彩礼并未谈妥的情况，女方是有足够的动机去做出这种因为彩礼未谈妥而男方又施暴的报复性行动的。再比如一审判决时法院判决为三年有期徒刑，是顶在强奸罪的起刑点 3 年来判的，同时男方也是一直拒绝认罪认罚，若事实十分清晰，那么完全没有必要顶在 3 年起刑点来判。同时法院透露在二审开庭前曾多次劝说双方当事人调解，但男方拒不认罪，不然很有可能会出现判三缓三这种情况。

综上，整个案件靠着官方通报始终难以服众，并且在中国的二审无罪率为万分之四的情况下，即使二审认为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想要疑罪从无，也会受着整个司法体系的压力使其不敢这么判，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社会争议的案件。如果只从司法的角度去思考，这似乎就仅仅只是一个证据比较缺失的并且案件性质比较特殊的案件，应该只是局限于司法届的一个争议性的案件。然而此事又进一步演变成网友们特别是男性网友对于女性网友乃至整个中国法律体系的不满以及骂战，背后的原因显然远不止司法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近几年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关于男女矛盾的种种事件层出不穷，能够看到非常多的离婚案也好，强奸案也好，司法往往倾斜向女方，而这也确实是写进宪法里的保护女性权里的。这些在广大男性网友中就是一件件的“斜塔”事件。而在这样一种明明应该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体系中，广大群众却能够明显感觉到有偏袒女性。



如果我们翻看中国的法律，也能看到有许多保护女性权益的条款在法律中也有对女性职工的诸如带薪产假做出明确规定等等，对女性的保护力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看起来似乎很好地保护了女性使其不会受到社会的偏见和迫害。如果单看法律体系和司法判决来看，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的各项权益以及社会地位靠着法律的保障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保障社会公正的。

但我们看到现实中即使保护地这样好也根本没有维护女性权益，例如公司带薪休假反而导致企业拒绝女性入职，然后又在例如大同案中明显偏袒女性，一方面让男方坐牢，一方面又让女性都变成所谓“捞女”和借着强奸案或者离婚案“创业”“报复”的刻板印象，挑起男女对立。有人可能会说：“一部法律挑起男女对立合适吗？一部法律能被统治阶级制定出来应该是维系他自身的统治，去调和社会的矛盾，怎么能是主动挑起矛盾呢？”

实际上就如恩格斯所说一样，法律等等作为上层建筑始终是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起到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法律始终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去行动。**似乎挑起男女对立只会让社会更加不稳定，那么是不是统治阶级自己犯蠢呢？当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

们说**通过挑起男女对立，使得男女无法团结一致，最重要的，使得无产阶级内部无法团结，始终彼此对立，分裂，争吵。**而这种对立不光是出现在男女，还有诸如民族对立，国内外的对立等等。这种对立始终只是在分化着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得无产阶级无法团结起来。

并且看似法律很好地保护了女性权益，然而如果我们看现实的统计数据的话，女性的社会劳动率是始终低于男性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也要高于男性。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私有制。**

例如我们看到因为法律给女性规定了诸如带薪产假等福利待遇，反而让企业因为害怕因雇佣女性而减损本来就是从员工身上敲骨吸髓得来的利益。甚至许多公司反复强调让女员工不要结婚生孩子乃至立下一些莫名其妙的条款给那些女性职工穿小鞋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看的很清楚了，法律作为为统治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始终是无法去做到社会公正的。

同时整个司法体系缺失人民的实际监督，都是一群中共的奴才当上了法官、检察官等等。包括我们看到为什么二审无罪率那么低，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司法体系官官相护，没人愿意得罪自己的同事。只要统治阶级存在一天，他就必须要利用法律作为他统治的手段，他并不一定非得以赤裸裸的暴力，赤裸裸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出现的。

在现代国家机器里，这种**表达统治阶级意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往往是以隐蔽的，伪善的面目出现的。**比如法律为了去维护统治阶级能维持稳定，挑起男女对立，他就要假惺惺的表现出“我们非常在乎女性权益”。所以今天的中国法治被如此多的人诟病并不仅仅只是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或者什么司法需要去进一步改革，而是因为目前社会中统治阶级需要挑起对立，维护自身统治的稳定和利益，麻痹群众。

最根本的，资本主义日复一日的生产着不平等，生产着剥削与压迫，使得所谓社会公正完全成了痴人梦语，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那么既然**单靠着法治或者对法治的改良根本无法实现社会公正**，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呢？

我们认为只有靠着无产阶级真正能团结在一起，不被统治阶级人为刻意挑起的对立陷于内斗。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不是该向着我们的阶级兄弟恶语相向，而是向我们的吸血鬼老板，向着为中共为虎作伥的法官等等发起斗争，向着我们真正的敌人，盘踞于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和一切剥削者压迫者发起斗争。真正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是把我们的命运交由“良心发现的好老板”，“刚正不阿的并不是我们选出的法官”，“廉洁奉公的人事任免完全由中共把持的政府”。

而在斗争的最高潮中，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中，我们能够去推翻资本主义，推翻私有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之后，在根本上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剥削和压迫都将在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中逐渐消亡，法律将不会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少数剥削者利益的工具，而变为大部分群众用来巩固无产阶级统治，巩固苏维埃、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的工具，防止剥削者卷土重来，调节群众内部的小摩擦和争执。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根本上也不是社会主义法律能带来社会公正，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等等，使得不公正的源头已逐渐被消除了。**而在社会主义中，首先社会主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等等，会由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人民的苏维埃选举出能代表大多数群众意见的立法者，法官，检察官等等。这些“官”能随时被人民罢免，随时受人民监督权，并且流动性很强，一切具备相应技能素质的群众都可以参与竞选，而不是像现在的完全由中共的官僚系统中完全不受人民选举和监督产生。

对于法律来说，无产阶级专政还意味着需要对资产阶级等反动阶级实行专政，使得公有制的财产和财产关系得到最坚决的保护，以成文法的形式广泛规定民众的民主和一系列权利，在劳动生产率足够高的水平和群众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基础上，使得群众能直接广泛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里，“人人为官僚，因而无人是官僚”，而这又必须带来诸如四天四小时工作制乃至更短的工作时间才能保证人民能够有时间精力去使用这些民主权利。

广泛保卫计划经济，保卫苏维埃，以法律剥夺这些破坏分子的权利，并且促进工人民主和计划经济的运转，使得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的巩固，计划经济的惯性和巨大优势逐渐消除了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由此以往，一切的社会不公都将逐渐消亡，社会也逐渐迈入共产主义的人类历史的新天地！

不要被统治阶级的谎言麻痹，不要对目前无产阶级的纷争和内乱而灰心，我们作为无产阶级，应该比任何人都应该都乐观积极，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我们才是这个社会拥有最大力量的人，也只有我们才能解放全世界，最终解放我们自己！

II

帝国主义 与南亚次大陆的危机

在探讨南亚印巴问题这一延宕至今的政治冲突时，必须超越表面的宗教或民族矛盾叙事，而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观进行全面分析。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治目的、手段和结果等方面出发，剖析印巴问题的本质成因——印巴问题深刻揭露了“宗教意识形态”与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身份构建因帝国主义的煽风点火被彻底动员为阶级统治、瓦解工人阶级的工具。印巴问题遗留至今的腥风血雨恰恰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为可憎的遗产之一。

显然，任何能够认清基本事实的人，无论抱有何种意识形态，都明白英帝国主义在南亚的扩张绝不是其所宣称的“现代化使命”，而是赤裸裸的资本掠夺与过剩产品倾销。自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通过军事与商业手段控制孟加拉以来，英国统治者通过暴力镇压与制度控制，摧毁了全南亚次大陆的自给农业结构与手工业体系，使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地区被纳入帝国主义势力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中，成为原料供给地与廉价劳动力市场。英帝国主义深知分化当地民众的重要性，其惯用手法即为通过法治、教育、宗教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再生产，认为创造当地民众的“身份认同”分裂，如锡克教和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宗教在被英帝国主义人为发明为所谓民族身份后互相之间产生的冲突，这一现象和巴尔干半岛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被奥斯曼帝国通过种族屠杀与隔离的方式强行转化为穆斯林、发明“穆斯林族”的历史进程是如出一辙的。

作为历史迥异、文化差异巨大的上层建筑，宗教是帝国主义势力分化瓦解民众最好的武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宗教逐步从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组成要素，异化为政治动员的核心工具。英属印度在制度上确立了基于宗教的身份治理模式（这也是从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体系与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成分体系中习得，帝国主义势力向来是臭味相投的一丘之貉），将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等分别纳入不同的行政、教育、司法轨道之中，从而人为构建出两个“族群实体”，为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服务。在这一框架下，宗教不再是纯粹的信仰实践，而是用以分辨资源二次分配的标签。这一制度性的所谓“认同”分裂，为后来的印巴分治埋下了最为深远的结构性种子。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也并非一个单一的反帝国主义共同体。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受到了殖民资本的高度干涉，其发展依赖殖民经济的边缘环节（即南亚次大陆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在政治上也依附于殖民势力治下的社会稳定。印度国大党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追求国家独立的同时，始终试图维持社会秩序与自身既得利益，对广大

穆斯林小资产阶级与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诉求反应迟缓，导致同样寻求独立的穆斯林联盟逐步强化“两个民族”的政治主张。在这个过程中，穆斯林民族主义并非源于所谓宗教信仰的觉醒，而是穆斯林社会内部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国大党主导的泛印度民族主义中被政治边缘化所采取的反制对抗措施，代表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同国大党印度教资产阶级精英集团与英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矛盾不可弥合的背景下，1947年的“印巴分治”代表英帝国主义彻底放弃直接管理当地。印巴分治绝不代表去殖民化，而是帝国主义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的地缘分裂，核心目的在于将已经被人为创造的民族矛盾激化点燃为持久冲突，从而维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南亚的间接控制。由蒙巴顿所主持的分治计划，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草率划界，不仅未解决民族自决问题，反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超过1200万人口因宗教信仰被迫迁徙，造成百万人死亡，而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问题更成为分治留下的最大火药桶——这两个地区的当地民众为穆斯林主体，但是统治者为印度教地方土邦贵族，进而在领土分割时保留了“独立”，随后通过政府合并与民意统计作为支持分别被选成为新成立的印度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领土。印巴分治过程中的大量无组织暴力不仅是民族矛盾，更是殖民主义推波助澜的直接后果，也是新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独立时因极为复杂的阶级矛盾集中爆发的后果。

分治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构建方法，然而南亚次大陆从未逃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干涉与内部统治阶级和社会阶层错综复杂的势力网络。印度在继承了殖民行政机器的基础上，确立了表面上的世俗宪政体制，但其实质上却是在印度教多数主义基础上维持通过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维护政治稳定，并长期边缘化穆斯林、达利特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而在经济政策上，印度虽然在初期推行形式上的国有化与计划经济，但其从未能真正实现土地改革或消灭生产过剩，反而使城市中产阶级在精英官僚集团执掌的国家体制中获得特权地位，形成印度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巴基斯坦则更为明显地将国家认同与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绑定，试图通过宗教统一来弥合内部民族矛盾。然而，俾路支、信德、普什图等族群与旁遮普人之间的民族差异与阶级状况的巨大分化无法被单一宗教所消解，这些地区的人民也普遍反感伊斯兰堡或白沙瓦地方寡头带

来的经济剥削。1971年孟加拉（原东巴基斯坦）的独立，正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失败的最清晰体现——显然，同样没能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经济自立，同时面对外部帝国主义殖民与中央对地方经济内殖民的巴基斯坦无法有效处理任何内部的阶级矛盾。

冷战期间，南亚次大陆也充当两大阵营的第一前线。印度与苏联结盟，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的盟友，而克什米尔问题则成为武装对峙的焦点。随着1998年印巴两国相继进行核试验，南亚次大陆开始了核威慑时代。在核威慑之下，两国不再进行大规模武装冲突，而是先后使用恐怖主义、边境骚扰等各类手段试图通过蚕食战略扩大自身利益，进而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升温。在今年，两国还使用了空袭等新时代战争中常用的低烈度攻击手段作为测试对方底线、争夺利益和政治话语权的方法。

十分明确的是，南亚次大陆的根本问题在于，印巴两国无论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产生还是政府的治理体系，都始终未能脱离殖民资本主义的遗产，其甚至不能算得上是充分现代化的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印巴两国所谓的现代化与去殖民化长期维持对各类无产阶级民众的剥削，通过殖民时代整个南亚次大陆内部以政治和经济中心（如德里、加尔各答、卡拉奇）对其他劳动力密集区域的经济压迫和剥削维持国家权力。在这国家体系中，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对全体“他者”的排斥，无论是在国内外都通过各类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转移内部阶级矛盾，制造各种民粹主义的政治幻想。在印度，这种机制体现为“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政治崛起，将穆斯林群体妖魔化以维持印度统一的合法性；在巴基斯坦，则体现为军事建制的常态化，以“国家安全”名义压制民主和经济进步、反压迫诉求，维持对边疆和西北山地地区的控制，进而形成一个军阀国家。

因此，印巴问题的实质并非两国民族之间无法和解的宗教仇恨，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去殖民化失败血淋淋的教训，是殖民秩序局部解体后无产阶级未能被动员起来打碎旧有国家机器、建设新政权的一场悲剧。宗教、民族、领土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被政治化、制度化，成为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如此，克什米尔不是简单的“争议地区”，而是帝国主义维持军事撤退后持久经济利益的牺牲品，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帝国主义战略性收缩夺得不完整喘息空间的畸形儿。唯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一切殖民时代所遗留的国家机器，方能还南亚一片晴天。

III

日内瓦贸易谈判——谁能睡个安稳觉？

数周来垂头丧气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全世界绝大多数政客、资本家、银行家、投资者——特别是挤在华盛顿和纽约某条著名街道的那两小撮，刚刚在日内瓦的一个小会议室度过了煎熬的几天。随着 5 月 12 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的发表，这场历时数个月，波及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的关税战争以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对冤家的“和解”而暂时落下帷幕。善良的斯科特·贝森特终究没有让上述可怜虫白白“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损他淡淡春山”。

然而，这既不是近年来第一次有美国财政部长带着和平的消息荣归故里而相信自己赢得了“九十天的和平”，也远远不可能是最后一次。随着美国通过疯狂而惊悚的关税战争推动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利益再分配的激进尝试在北京城下碰了一鼻子灰，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美国 and 所有受影响国家的消费者和广大劳动人民——将会一天比一天清楚地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末日的迫近。根植于资本主义最底层的矛盾将不会给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留下多少“回家，好好睡个安稳觉”的机会了。

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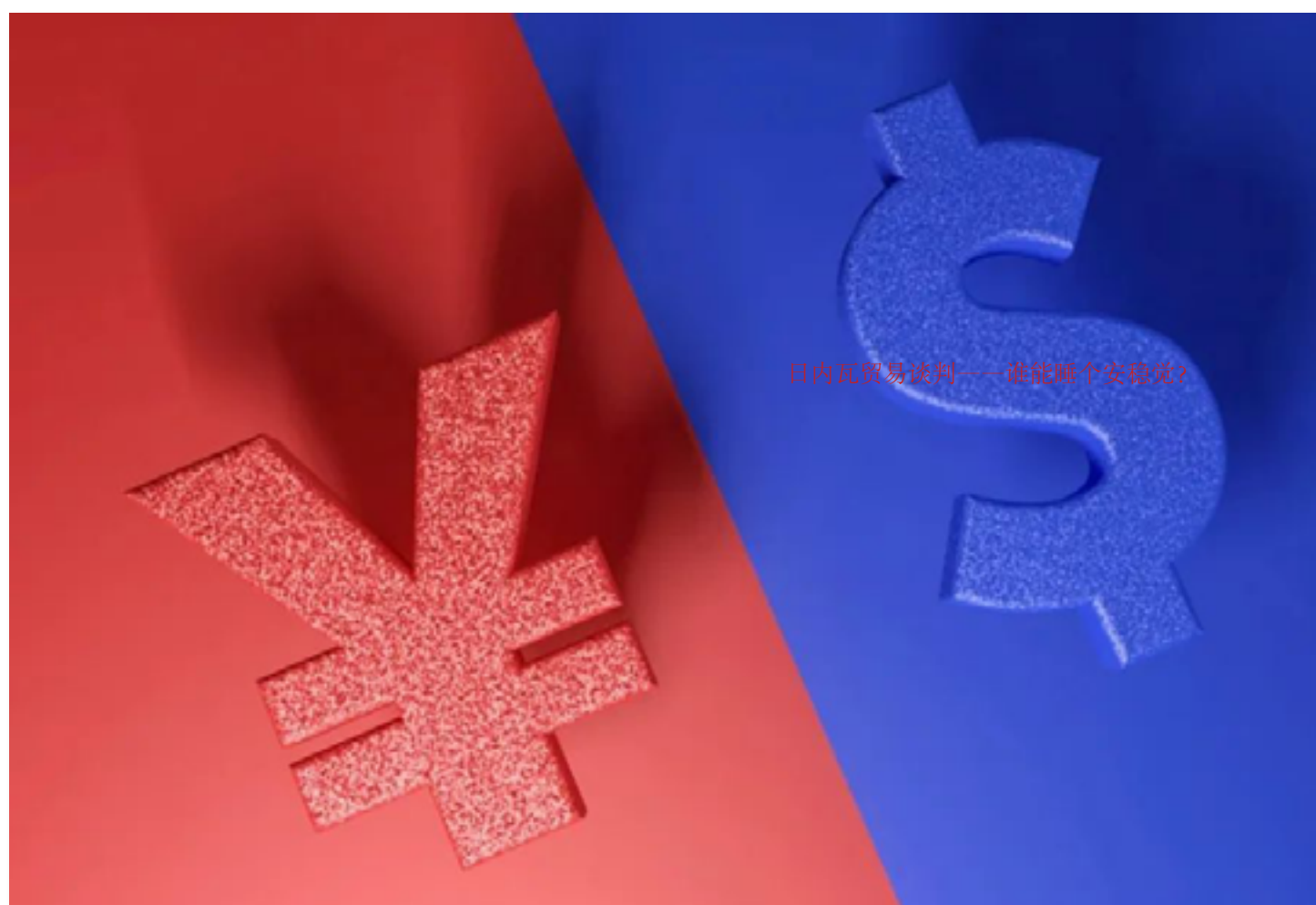
早在 4 月 17 日和 4 月 22 日特朗普就曾发出过暗示中美贸易战将会降温的信号，但 5 月 12 日的会谈取得的成果依然好到令不少经济学家和跨国企业感到意外。根据声明，报复性的关税升级行动已被取消，双方的关税税率因而得以大幅降低。具体而言，美国对中国货品维持 30% 关税（其中包括原有针对打击芬太尼非法贸易的 20% 部分）；中方则对美国货品征收 10% 关税，同时将取消其他非关税反制措施，例如对美国的关键矿物出口。BBC 将此评价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已从悬崖边缘退后一步”。

我们（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曾在三周前的时事评析《关税、贸易战：右翼民粹主义的无足之鸟》中简要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的成因。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4 的出口货物达到 25.45 万亿元，进口 18.39 万亿元。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为 7.06 万亿元，打破了之前的记录，即 2022 年的 5.86 万亿元；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货物贸易逆差则达到了惊人的 1.2 万亿美元。作为用以创收的手段和兑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竞选承诺的美好希望，疯狂的关税战争仅仅在特朗普的大脑中稍加酝酿就被以不容暂缓的姿态提出并执行，甚至在

全世界金融市场遭到重创而纷纷向白宫寻求更多信息的时候，后者的部分官员甚至无奈地表示自己乃至部门在政务沟通上的停滞。

即使美国在短时间内迅速收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软和示好，但它最主要针对的敌人——中国则表现出了令一些同样受到美国施压的国家的普通百姓感到莫名出气的强硬立场。在这里，作为在贸易关系中提供了巨大市场的贸易逆差巨大的国家即美国，并没有在这场博弈中攫取理论量的好处。中国海关总署5月9日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外贸延续了平稳增长态势。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14万亿元，同比增长2.4%；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3.84万亿元，增长5.6%。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同日报道称，4月份，在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激增的推动下，中国4月份出口大幅增长，抵消了对美出口商品因高额关税开始大幅下降的影响。中国已经为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做了多年的准备，这包括积极拓展欧洲、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和培育并扶持尽可能独立自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等措施。依然是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610.32亿美元，占中国顺差总额的36%，而2017年这个比例是65%。虽然中美贸易对前者来说仍然是最为重要的贸易关系，但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相对重要性有显著的下降趋势。

中国处心积虑的准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法国世界报高度评价联合声明对中国的意义为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美国从在部分商品问题上被迫让步走向了全面让步，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消费品短缺和物价上涨的窘境所给政府造成的压力不得不让他们成为“先打电话的一方”（即使他们不会承认）。中国政府不会放过这宝贵的穷追猛打的机会制造舆论，特别是在同样前不久的印巴冲突中外售的歼-10C战斗机恰巧适时地获得了夺目的战绩的情况下，大部分民众越发地相信中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始终试图构建的高傲神话，即中国正是像法国世界报所感叹的那样“凝聚起来了”，具备与美国相抗衡甚至提出进一步要求的能力了。



就此为止？

联合声明不会是令所有人皆大欢喜的灵丹妙药，而只是国际资产阶级在利益的争夺战中互相妥协退让以求安稳地继续剥削本国和世界人民的罪恶协议。全球，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劳动人民再一次见证了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丑恶面目。

中国并不像她所表现或试图表现出的那样坚韧而强大，正如美国孱弱的制造业根本无力靠着特朗普口头的承诺度过关税带来的消费品和原材料短缺造成的冲击一样。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如此发达与完备，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自发展。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政府引导的对制造业的大力投资和海量让人难以拒绝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倾销，而这必将影响其他国家的产业和就业岗位，无论这个国家是向来被宣传为可恶的大反派的美国，还是与中国甜甜蜜蜜的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本家的工会，他们决不可能允许任何触碰自身利益的行径。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下更为扩大了的生产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间的矛盾，或全球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特定产业企业基于盲目逐利的生产组织性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行调节这种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必然爆发的矛盾危机。关税的存在首先威胁了美国劳动者的消费市场和就业岗位，所带来的更加凸显产能过剩问题也会威胁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的中国，后者要么踏尽天涯海角再找几块足够倾销产品的新市场，要么就关闭工厂，让大下岗的历史重演。

中美两国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对这一切毫无反应，因此就没有什么比在经济体系上相互依存、经济利益上高度攸关的两国资产阶级立刻达成协议暂缓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内斗而专心稳住本国劳动人民更重要的事情了。资本家会意识到比起分钱的时候少分一笔，总比被无产阶级尽数剥夺要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两国的共识是“双方都不希望脱钩”；而中国商务部则形容此次协议是“解决分歧的重要一步”，“为弥合分歧、深化合作打下基础”。事实相当清楚明白：比起人民，两国资本家的好朋友自始至终一直是千方百计榨取本国劳动者价值并伸出血淋淋的手的对方。

我们看到，中国直到最后还在试图营造一种是自己代表理性和正义对美国的错误做法尝试拨乱反正的圣洁而又坚毅的形象。这场贸易战早已从经济纠纷上升到了甚至事关政治信誉和政权稳定的赌博：任何主动或被动的让步都将与中国长久以来的民族主义宣传相悖，而万斯傲慢的言论和特朗普疯狂的行径将会是这种宣传伎俩和将国内经济困境转嫁美国的绝佳的素材。

九十天的休战后会怎么样？这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分赃纠纷还会继续下去吗？除了两国政府间忙碌的秘密电话线之外，从何处都不得而知。我们唯一清楚地知道的是：懦弱的蛋糕主宰不了分蛋糕的刀！

该怎么做？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然而当山中有足够的猎物时，他们不会吝啬于坐下来共同享用而不是厮杀个你死我活。但是当今世界市场几乎已经被开发殆尽，资本再生产自身的根本属性却随着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一下一下地为这个走到末路的世界

剥削体系敲响丧钟。

特朗普大肆鼓吹的美国优先计划并没有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而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经济危机。

“但当美梦延期到达，一切将会怎样？”天文数字一般价格的商品零落地摆在货架上，而政府却不得不向太平洋对岸的中国人低头退让。变革的妄想破灭了，斗争的现实清晰了。在继续相信这个满嘴胡话的疯子会给自己带来高薪工作和回到更无能的自由主义政府之间，美国的无产阶级最终会被生活这位最好的老师教会：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才是自己乃至全球无产阶级的出路；

中共在谈判桌上的头扬得再高、放的话再狠、“咱妈”的武器打人再疼，也不会改变中国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加速激化、人民群众从迷惘困惑走向坚定觉醒的进程。中国群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的记录显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规模不一的群众性抗争运动爆发。埋藏在中国人民心底的阶级意识和组织意识数十年来遭到束缚、遭到折磨，几乎焚骨成灰、抛洒入海。但是“她会解脱，她将觉醒，她将归来解放众生”。

停止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评头论足！停止对无产阶级“无能”的傲慢的污蔑！“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申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从今天就组织起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共产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党，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党，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党，团结起日益奋起的工人阶级向着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迈进！

IV

武汉枪击案——一个人恐怖主义与资本主义

5月18日晚，很多网民看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武汉发生了枪击案，并导致了1人死亡，2人重伤。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官方媒体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正面回复，而是在短时间内在微博等媒体平台下架了所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话题，导致很多人直到20日才看到官方媒体的报道。在我们为这件事情感到骇人听闻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思考，那个在中共叙述下的“法治国家”“和谐社会”怎么会发生如此恐怖的事件？

中国政府不再能保证社会稳定

这些年来肉眼可见的是极端事件在不断发生，社会高压下，长期的压力导致很多人在遇到极端无助的事情时走向了极端，在无锡发生的学生持刀杀人就是典型的一例，该凶手在行凶前说“自己看不惯社会压迫，宁愿用极端的方式唤醒政府”，但事实他换来的只有无辜百姓的死亡，本次的武汉枪击案据传闻则是因为黑社会关系，由于黑社会老大杀害了枪手的亲属，枪手才决定以残忍的方式以牙还牙，在这些案例我们都能看到，在凶手行凶前都或多或少了遇到社会或个人的压迫冲击，这才纵使他们做出极端的事情，而恐怖主义的发生并不展示着这个社会像政府说的在慢慢变好，相反，他展示的是**底层民众对社会的彻底失望以及对未来的恐惧**。“我要拿燃烧瓶去冲塔（即冲击政府）”似乎已经可以不再是一句口嗨的话，而是绝望的民众对社会的最后呐喊。

当大部分人惊讶于在中国能有人上街持枪杀人时，共产主义者不应该感到意外。细节性的问题，比如子弹和枪支的来源，并不重要；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社会在它的末年苟延残喘时，不幸不会是个例而会是常态**——一个人恐怖主义不是需要大惊小怪的事情，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就是无止境的恐怖，将人变成疯子，把社会变成屠宰场和战场。

他们宣传的“和谐，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属实，会存在黑社会吗？会存在枪杀案吗？中共近年来一直在宣传自己的法制工作，也许很多人真的相信了社会在不断地变好，变得更和谐更友爱，但一旦这种事情真正地发生了，统治阶级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可笑的是，2019年，中共就开始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但本次恶性事件的发生则正是由于黑社会，抓政治反对派、封锁消息、镇压工人运动如此灵活有力的中共，为什么这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呢？其实黑社会现象所代表的各种法外恶习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共存的关系，就像人身体里的细菌一样：太多了会生病对身体不好，太少了人的基本生理机制也无法正常运转。**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必须建立在这种压迫之上的。**恐怖袭击出现后，他们可笑的遮羞布被一丝不剩地撤下来。

中国社会并不会按照经济学家的蓝图一样“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造福全体公民”。相反，中国资本主义体制只会在生产过剩、高失业率、需求低迷、债台高筑等等难题中四处撞壁。社会的不幸不会减少，恰恰相反，除非一场深刻的变革发生，我们只能从不稳定走向更不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来说缺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共产主义者如何看待个人恐怖主义

自由派看到这种个人恐怖主义的新闻后就像小孩子第一次进到游乐园，失了智的高喊“中国要完蛋了”或者拿人命开玩笑说些什么“大献忠时代”。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政治方向，所以我们也不期待除了找乐子外能说出什么有思考的话。但是，这种类似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共产主义者的思考，更很多时候被打着革命的旗号转化成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很多共产主义者认为个体的暴力可以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手段，相比于建立起全国性的党组织、开展基层群众工作，从海外运输枪支弹药是更加“快捷”的通往革命的道路。

这种思考方式认为历史是少数人用炸弹和子弹创造的，认为革命是小群革命者和反动派在舞台上搏斗，而群众则负责在底下坐着看戏。**个人恐怖主义不可能对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任何撼动**，反而会给反动派以镇压、逮捕和封杀的理由并助长群众的政治冷感，贬低工人阶级在建立新社会中的主力作用。不管是提议刺杀政府官员还是聚集一批人去山区打游击，都是完全反共产主义的恐怖主义思想。历史由人民创造，**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不会是几十个手握步枪的共产党员，而会是工人阶级自己。**

我们不应该鼓励恐怖主义趋势。这是**社会的不幸**，我们对所有敢于在黑暗中挺身而出反对不公的人表示理解，但绝对不会赞同丧失理性的针对平民的袭击或者降低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恐怖主义行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会是团结一切受压迫群众的革命，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在资本主义下，被压迫者没有自救的方法。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才能彼此解救。

面对滔天的愤怒，先不要发泄；先思考，再组织起来做出变革。

成为运动的先锋，勿飞蛾扑火；看四周，团结起自己的力量。

学术自由的幻灭：哈佛大学留学生被驱逐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于 5 月 22 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宣布，哈佛大学学生和交流学者项目的资质已被撤销。这意味着哈佛不仅不能再招收国际学生入学，正在哈佛就读的外国非应届毕业生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哈佛大学国际办公室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哈佛大学招收了来自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6800 名国际学生和学者，国际学生占哈佛学生总数的 27% 以上，其中，国际学生中占比最高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约占五分之一。

这份禁令并非毫无来由。早在今年 1 月，尚未迎来新总统特朗普的登基的美国政府，就曾向众多高校发出威胁；4 月 14 日，哈佛大学拒绝遵从美国政府的多项要求，包括大规模改革学校管理层，修改招生政策，关闭校园内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相关的项目等。美国政府随即宣布冻结哈佛大学 22 亿美元多年期拨款。5 月 5 日，美国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表示，联邦政府将不再对哈佛大学提供新的资助。5 月 13 日，美国政府表示，八个联邦机构将终止向美国哈佛大学提供另外 4.5 亿美元的拨款。这意味着哈佛大学的财政问题最终还是走到了不得不完全依靠自身的紧要关头，而受这份禁令所影响的国际留学生，“碰巧”是哈佛大学经济收入的重要一环。

一方是高呼学术自由的高校，一方是强调国家安全的政府，其间的冲突并不如表现出的那样局限于行政管理上庸俗的官僚矛盾，而是反映着**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各阶级围绕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持久博弈**。

2024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即承诺整顿高等教育，他指控包括哈佛在内的常春藤名校“成为激进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扬言要“夺回我们曾经伟大的教育机构”，然而事实果然如此吗？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除了归属国家机构为政权政策摇旗呐喊之外的，包括家庭、公共媒体、学校等在内的社会机构，都是构成精神生产资料或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一部分，其生产内容的本质最终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根本决定，和国家机器一样并肩凌驾于社会之上基于经济基础发挥其作用，而非表面上的单纯的政权意志的延申。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和国家机器之间屡有以王权与教权之争为代表的矛盾，在现代这个矛盾以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的形式得以再现，揭示了**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根本触动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延续**。

美国政府辩解自己的禁令是针对哈佛校园内“反美、反犹太支持恐怖主义煽动者”给出的，后者可以明确地被定位到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哈佛校内支持巴勒斯坦解放、反对以色列种族

灭绝暴行的英勇的学生群体。特朗普猛烈抨击哈佛大学拒绝接受政府在招生和聘用方面的监管，并多次声称该校充斥着反犹主义和“觉醒”的自由派意识形态。不仅如此，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哈佛大学需要“为在校园内与中国共产党协调行为承担责任”，而这一切都于美国自上世纪庇护逃离欧洲纳粹崛起的高级知识分子时起标榜自身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民主灯塔的形象背道而驰。

这时候资本主义宣传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暴露的一览无余。即使在最开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自由和民主也只是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一种手段，而非其所信奉的“真理”。列宁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可见作为**欺骗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制度会允许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以确保权力稳固；但在社会动荡、群众大规模激进化、不满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他们则不得不收回昨日的假笑，掏出棍子来教训不服从者。自由灯塔、学术自由的港湾，就因为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基地”。



进步学生掀起的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声援巴勒斯坦反种族灭绝运动曾基于各美国高校对美国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这事实上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掌握和争夺始终在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阶级斗争进程中动态博弈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哈佛大学这一超精英大学同时培养统治阶级和投身工厂企业的技术类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得到自然化的确证，即再生产不同阶层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持续在个体实践层面复现“政治权力”的分配，将人固定在围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等级秩序中。然而，**先进知识分子的得以接触到激进的进步思潮并受之影响**，是走向末路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到处出现的自然而然的现象，这意味着客观历史进程将要借助历史主体辩证地得以表现，是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本身身处资本主义教育体系制高点的哈佛大学，轻易就能成为意识形态变革领域的领头羊，无论这个变革的具体性质如何；学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自身的高台之上创造性地发出自己乃至社会的声音，将意识形态灌输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变为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变革的

战场，**矛盾走向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知识分子自然走向激化寻找其他的出路。**

美国政府将矛头对准国际学生，既是扼住哈佛最后的经济支柱的尝试，更是在维持知识霸权垄断，在大洋彼岸复刻老对手中国的“境外势力论”。为了呼应国内右翼保守选民的诉求和兑现特朗普发现越来越难兑现的竞选承诺，特朗普政府还给哈佛加上了一个别样的罪名：“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而后者恰好是坏蛋民主党的得意招牌。面对经济颓靡，民众不满日益加剧的社会现实，特朗普政府不惜继毁掉自己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外交上的形象的同时，再毁掉学术自由上的形象。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将会被暗戳戳地视作在美国煽动不和谐因素的“境外势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标靶，为美国社会的矛盾激化负责。**学术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和执政不力的替罪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过解雇拒签反犹声明的教授换取了豁免，而哈佛因坚持学术独立遭受制裁，这种选择性打压揭示了**资产阶级法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弹性本质**。教育机构标榜的“学术自由”在资本权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所谓“知识中立”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已被国家机器彻底撕破。

我们重申以学校等机构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的阶级即生产关系本质，更强调国家机器在转移国内矛盾和确保自身政治利益上所使用的手段的不遗余力。真正、彻底的学术自由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得以实现，在国家机器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的社会里，学术研究将不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政治利益的操纵，而是纯粹地为了人类的生产力，即改造自然的能力服务，如果说他再生产了什么生产关系的话，也只会是确保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生产关系。

走向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造就了意识形态变革的基石，然而这块基石也必须矗立在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变革之上。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党的领导，进步分子零星的抗议运动是不可能导向一场能够取得成果的革命的。组织起来，为推翻根本制约着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属于群众自己的解决方案而战，应当成为一切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共识。

谁在压迫谁？——特朗普指责南非对白人种族歧视

数月以后，面对一块小屏幕和在其中手舞足蹈地唱着“杀死布尔人”的朱利叶斯·塞洛·马莱马和在一旁煞有介事的特朗普，西里尔·拉马福萨会回想起自己在《征用法案》上签署大名，使其成为法律的那个细雨濛濛的日子。

2025年5月21日，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在白宫上演：就在南非总统的到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突然下令关灯，并在这个临时的小电影院里播放了经过剪辑的、南非反对派领导人高歌著名南非反种族隔离歌曲《杀死布尔人》的视频，随即他又拿出了一摞印有材料的纸张，控诉南非政府对白人农民的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拉马福萨的笑容瞬间消失，在座位里局促不安地蠕动的他却在接下来沉着、冷静地反击了特朗普的无端指控，不卑不亢地化解了一场外交风波，即使所以构成这一场闹剧的素材，绝大多数在后来被证明为漏洞百出：事实上是路透社报道的刚果（金）与反政府武装组织冲突后的场景——路透社视频记者贾法尔·卡坦提愤慨地补充“这是路透社获得的独家画面”——却被特朗普张冠李戴为所谓的“白人农民的集体坟墓”；一条公路两旁排列着白色十字架而被称为“南非白人遭迫害”的画面，被证实为2020年发生在南非诺曼丁的一场抗议活动的影像。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令人困惑和不解：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不惜使用他一直以来口中最讨厌的“假新闻”的手法，也要抛弃惯常的国际外交礼节给拉马福萨一场如此的下马威呢？

早在今年2月7日，上马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1月23日签署施行的南非《征用法案》表达过严重不满，指责南非政府“没收土地”构成对南非白人的“种族歧视”，并签署行政命令，削减美国对南非的财政援助，以应对该国“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特朗普在命令中还提到了南非于2023年12月就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向国际法院提起的种族灭绝诉讼。命令写道：“南非共和国最近颁布了2024年第13号《征用法案》，令人震惊地无视其公民权利，并授权南非政府无偿征用少数族裔阿非利卡人的农业财产。”特朗普还补充道：“美国不能支持南非政府在其国内侵犯人权的行为，也不能支持其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友、我们的非洲伙伴以及我们的利益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紧随其后的是对所谓“种族主义所有权法”大加指责的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后者的卫星互联网公司“星链”就是在这项可恶的法案影响下未能在南非推出。3月14日，南非驻美大使拉苏尔在一次外交政策研讨会上表示，**特朗普正在引领全球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斥责拉苏尔“憎恨美国、憎恨美国总统”，是“不受欢迎的人”。拉苏尔随后被美国驱逐。5月20日，作为美国“正义”地抵制南非的措施之一，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一场发言

中明确宣布，由于两国政策“始终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抵制”今年11月计划于南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无论是在外长层级还是总统层级”都不会派出代表参加。

不难看出，南非与美国延绵数月之久的关系的恶化，是诸多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激烈矛盾走向深化的必然性，将会在一次次乍看令人诧异而迷惑的偶然中得以表现。



南非《征用法案》的核心是通过合法程序重新分配土地，以纠正殖民和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垄断土地的历史不公。当前，占总人口8%的白人拥有73%的农田，而占80%的黑人仅拥有4%；南非还是全球关键矿产（如铂族金属、铬、锰）的主要储备国，这些资源对美国的新能源和军工等产业走向特朗普梦寐以求

的产业升级至关重要，而这一改革直接触动了南非本土白人农场主及与之关联的包括矿产、农业综合企业在内的国际资本的利益。面对竟然不自量力地妄图与美国平等合作开发稀有金属，却又在同时外交上亲近中国伊朗俄罗斯这一对美国而言的“邪恶同盟”的小国南非，特朗普政府兴高采烈地挥舞起经济制裁的筹码，以求更有利的资源准入条件，试图通过经济胁迫确保核心资源的垄断控制。

南非与美国聚焦的法案除了可恶的《征用法案》，还有更可恶的由比尔·克林顿的坏蛋民主党政府推出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后者框架下最大的非石油出口国不是别人，恰是每年对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包括矿产、汽车等多个领域的南非。然而，原定于2025年9月重新谈判的该法案，每年都会由美国国会根据相关国家是否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法治及反贫困政策等指标更新符合资格的国家名单，而这个法案的安危意味着南非数十万个工作岗位的稳定：拉马福萨在4月美国为保护本国制造业而掀起的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中就曾强调与美国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议以保护南非制造业的紧迫性。南非的这一诉求被美国敏捷地抓住，用以施压南非服从其地缘战略，同时削弱南非的“全球南方”独立外交路线。

帝国主义国家国际博弈的背景下，小国往往不得不按照大国的心意选边站队，难保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外交合作的独立自主。中国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在金砖机制下深度合作，在国际事务上也频频步调一致，中国通过各类投资和基建项目进行的资本输出进一步巩固了在南非包括稀土开采权在内的资源影响力，而这对美国来说不啻一个隐藏的定时炸弹。特斯拉等美国企业需要南非的钴和锂资源以替代中国供应链，但南非与中国的密切合作必然威胁美国作为提振本国制造业措施中的重要一环的产业链重构计划，迫使南非在资源出口上“选边站”，服务于特朗普脑中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天真幻想。

从美国自身来看，特朗普虚构“白人种族屠杀”指控，本质是通过炒作煽动种族矛盾以转移美国国内经济颓靡而特朗普竞选承诺难以兑现的背景下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建立美国仍是

保护全球白人的自由民主灯塔的光辉形象的策略与大洋彼岸的中国构建自身世界和平正义的卫道士的做法不谋而合，服务于资产阶级官僚集团重申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为国际干预张本。“白人遭到迫害！”这和希特勒关于雅利安人遭到犹太人迫害的贼喊捉贼如出一辙，既然黑人在美国国内恰如犹太人在德国国内一样不受欢迎，特朗普和马斯克或许会借此在美国保守选民的心中走向光辉的白人救世主的形象，从而稳固自身统治的基本盘。与此同时，美国在接收被渲染成国际难民（却大摇大摆地乘坐包机来到美国）的阿非利卡人上的做作，即一边加剧中东等地的人道灾难，一边遣返真实的需要帮助的难民，却又一边“政治挂帅”地接收阿非利卡“难民”，毫不留情地向我们揭示着这种“选择性庇护”背后，美国政府将移民问题政治化的伪善嘴脸。

事实就是如此清楚明白：**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国际霸权；不是种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经济衰颓，消费市场不尽人意的现实拒绝了温和的对外政策的可能，要想满足走向激进保守的美国右翼群众，特朗普不得不越来越走向相同的反动意义上的激进，**通过某种“战狼外交”的美国翻版以制造美国伟大光荣正确且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取得胜利的的政治假象，试图背靠美国的家当奋力一搏，从早已不再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昔日的伙伴身上攫取与其地位不匹配的利益填补自身。**经济胁迫或许会使南非政府让步，但特朗普政府梦想中的制造业复苏将在长期内继续维持在他们的头脑中和政府的纸面上，最终为跨国垄断资本的人格化们疯狂的行径买单的只有各国的无产阶级。南非人民将会无助地看着一个癫狂的黄头发疯子抽走自己的岗位，美国人民将会在更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被迫听着新鲜的右翼民粹主义对非白人抢走美国人饭碗的愤怒声讨的谎言。工人和农民辛勤创造的价值就是这样成为各国资本家和政客餐桌上的蛋糕，在腐朽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下，只配眼睁睁地望着桌边大腹便便的他们落下屠刀，肆意宰割自己的肉体。

觉得眼熟？我们不感到奇怪。这样的事情从爱尔兰到契丹到处都在发生，并且已经发生了数百年。悲剧、惨剧、闹剧，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现在正躺在华尔街、陆家嘴梦想着下一个数百年的延续。**资本主义就是无止境的恐怖。**除非……除非你和无数个你能现在就做出此生最重要的决定：作为革命共产主义者组织起来，握紧唯一的武器——革命共产党，走向唯一的道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抛弃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叙事，洞察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包括民族矛盾在内的诸多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并为了你和无数个人提出属于你和你们自己的方案——共产主义。

VII

协和医院的董小姐——究竟为何平步青云？

“天才”之路

协和医院是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医院，那么协和医学院自然是在培养医学领域的顶尖人才。其院长王辰说：“（协和医学院）‘4+4’选拔的这批孩子将是中国医学界一支重要的希望之队。”作为协和医学院2019届的“4+4”学生，董袭莹董小姐无疑便是这些“天才”中的一员。这样优秀的人才，为何在最近却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就让我们好好看看这位“天才”的履历吧！

在美国的一所高中毕业后，董小姐随即上了一所社区大学；美国的社区大学是一种任何人都能接受教育的学校——但这并不影响董小姐转学去巴纳德女子学院，这是一所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女校，其校友全部拥有哥大的毕业证并在国内被认证为哥大毕业生，尽管许多哥大学生和校友对巴纳德更高的招生录取率颇有微词。总之，董小姐作为哥大毕业的高级海归，被协和医院“4+4”模式录取，放弃了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前来“吃苦”钻研医学。

在中国，一般的医学生要至少经历11年的寒窗苦读，或者连续8年临床，才能真正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就算是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欧洲或者澳大利亚等地区出色医学院的海归医学毕业生也是如此，就算取得学位后也仅仅是去医院实习。但“天赋异禀”的董小姐非常人可比，仅仅学了一年就发表了博士毕业论文——尽管这还没有她漏洞百出的一篇本科论文长。不过好在这篇论文已经被知网删除了——尽管知网此前从没有删除论文的流程。总之，她经过一年的学习与两年的规培，现在终于拿起了手术刀，成为一名光荣的实习医生了。

“天才”总是有一颗令人难以理解的心，董小姐也不例外。她很快与肖飞医生上演了一场协和医院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只不过肖医生的朱丽叶一共有六个。事发后，董小姐并不为此而放弃爱情，甚至还产生了爱情的结晶。在2024年7月的一次手术中，董小姐更是展示了天才的傲骨，仅仅因为护士提醒她“仪器拿反了”，她便怀疑护士“白了她一眼”，直接离开手术室。毕竟天才的工作可不允许凡人指摘，哪怕离岗40分钟，她也有绝对的自信能把人救回来。

像董小姐这样的人，真可谓走上了前途光明的人生路！

谁在铺路？

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董小姐铺路呢？网友们很快扒出了董小姐的家庭，其真可谓群英荟萃、满门忠烈：爷爷是超声介入专家、博士及博士后导师；外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是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总经理；母亲是博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几个舅舅、姑姑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教授。一个腹中草莽的人如何被塑造成一个天才？网友们为其背后的推动力专门起了个名字：医阀。

“门阀”在中国古代是世代公卿的世家大族的称呼，是阶级固化的显著标志。在今天这种门阀似乎复活了：在学术圈、医疗圈、教育圈，总之，在一切权力可以触及的地方，门阀们都把手伸进去，死死地抓住每一分利益。门阀的力量确实很大，但是，他们究竟是如何在一个标榜自己“民主法治”的国家如此猖狂呢？

其实，与其将他们称为门阀，不如换一个词：统治阶级利益联合体的掌门人，或者说，官僚——要把董小姐称为医阀家族的一份子，至少要其本人确实在医学领域有所建树才是；但是据网友们推测，董小姐志向可不在医学，她打算的是评上副高级职称，最终进入行政岗位搞“管理”，说白了就是当官。在那里，她除了不用担心医术露馅，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权力。

我们都知道官僚很“坏”。可是为什么官僚会坏呢？难道就不能多出几个“青天大老爷”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看看官僚们到底是什么人。

官僚试阐释

对任何社会进行管理，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运作，而权力首要的特征是能强制他人服从自身的意志。在阶级社会，政治权力几乎全部由统治阶级掌握，它一方面被用于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能保证统治阶级本身的代际传承。因此，权力本身也是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统治的手伸到哪里，哪里就要建立起权力的天堂。到了现代，权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几乎全世界的权力都在采用科层制运作方式的阶段，并具备有这样的特点：首先，它强调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权力自上而下运作、行使；然后，它需要组织成员具有专业的技术资格，以保障机构的正常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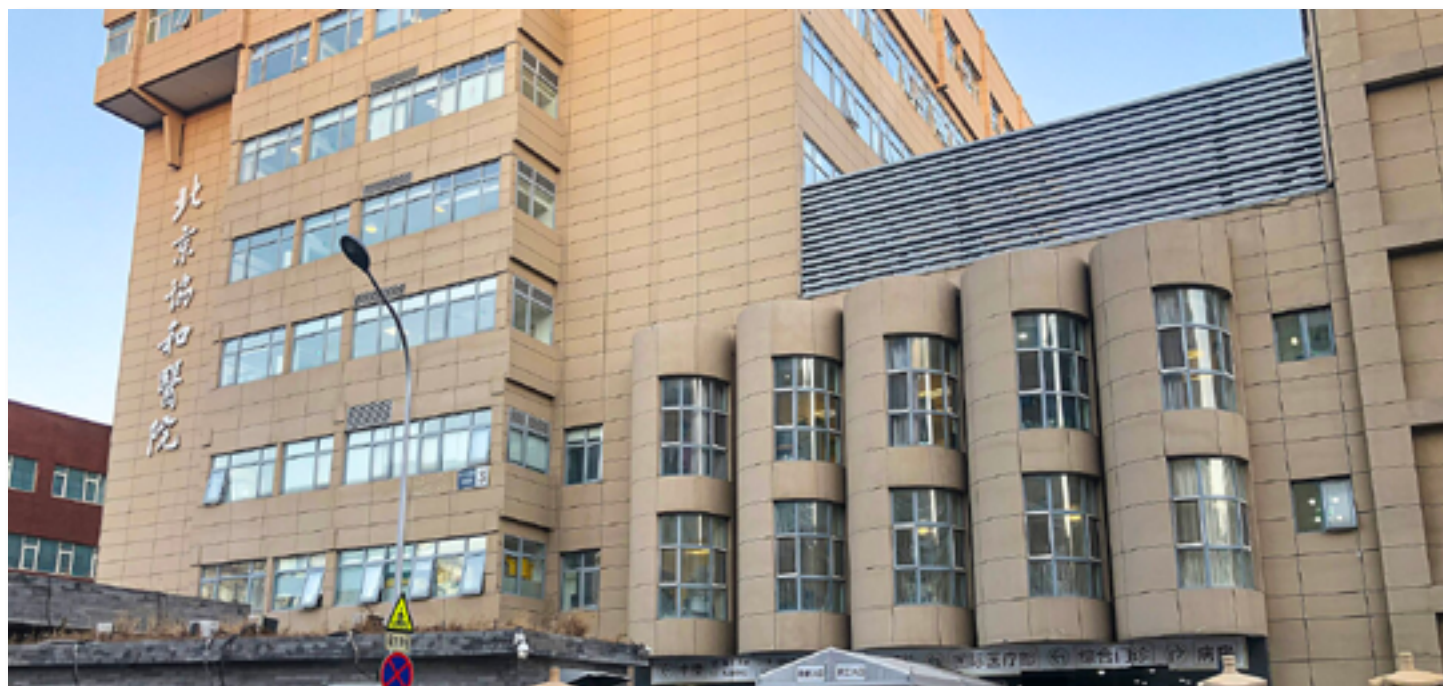
有人会认为第二点似乎更重要：我们可以很容易设想出一个这样的机构，它只依据成员的专业性或实际经验决定其升迁还是降级，这样就保证它的管用，并且这样的选拔方式也反过来证明它是管用的——这样的逻辑确实是自治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机构是处在阶级社会中的——它需要面对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统治阶级必然在这个机构内占据优势，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夺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董小姐的例子难道不足以成为明证吗？

而且科层制这种组织方式本身，由于其被广泛运用，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种物质基础，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便会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在科层制下，“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的意志决定一切，下级难以对抗上级，这又导致了权力的运行极不透明，这两点叠加使得掌握权力的人首先行使的不是他的职位要求他行使的职能，而是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利益。这种几乎不受监督的权力是科层制给予他们的最大的好处，是他们能够将自己意志强

行加于他人之上的基础，也是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自觉地产生出有关自我认同的基础。他们明白自己往往并非凭真才实学掌握权力，而是权力接受了他们开出的价码；因此，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要用权力回馈那些支持他们掌握权力的人。关系网就此形成，并逐渐膨胀，直至把整个体系遮蔽得严严实实。这足以让每一个进入该体制的人被驯化成蝇营狗苟之徒。比如肖医生，他的家庭无权无势，是典型的“寒门贵子”，但他掌握了权势之后，也作威作福，与那些贪官污吏长出了一模一样的嘴脸。

他们付出的某种代价，比如金钱或者人情，是通向权力的通行证，是以权谋私的先期投资。于是，在这个系统下，所有人的行为首先承认权力的至高无上，其次又将权力看做实现私欲的工具。其结果就是，权力如何分配，最终取决于谁能使这个体系的人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些人转头又认同利益至上。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又被虚化了一一只有对那些完全无法参与战利品的分配的人们，比如被当做牛马使唤的实习生们、处在最底层且升迁无望的小职员们、被雇佣卖出血汗的工人们，权力才是至上的。至于官僚的七大姑八大姨、老同学、朋友之类，权力则露出灿烂的微笑。

而在权力运行的内部，由于利益成了真正至上的原则，即使有人依靠真才实学进入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名利场，其被提拔的原因也不再是才能，而是运用才能为统治集团带来最大的利益。倘若有些“新人”有骨气，拒绝如此的腐败，那么他就会被无情地抛弃，被彻底边缘化、甚至直接清扫出门。这也是为什么董小姐的导师已经八十岁高龄，仍然要从骨科跨界到医疗影像学去指导这样一个学生。



如此，官僚体系最终就又否定掉了它的第二点特征，那些选拔人才的规则也逐渐被改变，只剩下一个空壳。而那些共同分享利益的拥有权力的人，就构成了狼狈为奸的官僚集团。他们懂得所有的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人情世故，也懂得如何把这一切都蒙上遮羞布，他们由于其特殊的利益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官僚无疑是和资产阶级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与资产阶级合流能为其带来极为丰厚的物质利益；资产阶级也需要官僚来掌控社会；“权钱交易”、“利益至上”的原则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暗合，并且最有利于资产阶级。有时，官僚自己就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比如董小姐的父亲旗下就有一家私营医疗公司，据说还侵吞了几亿国有

资产；有时，官僚是受资产阶级雇佣，为资产阶级管理国家，比如不少“西方”国家；有时，官僚的势力较大，甚至能够赐予资产阶级以特权、促使他们发展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帮助自己巩固权力，比如改开初期的中国。

董小姐的经历就是中国官僚制度的一个缩影。她受到家人的“投资”，希望登入高位，为其家族的学阀争取更大的利益。只不过她似乎反抗既有命运，与“寒门贵子”的肖医生相爱了。但当官僚体系一直如此运作下去的时候，只能让越来越多的蠢人进入这个体系。他们可能不一定有什么专业知识，但是工于心计，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的本事倒是十分精通。他们一方面会成为这个体系的蛀虫，把它干实事的能力腐蚀一空；另一方面，也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压迫，激起他们普遍的全面的反抗，直到把科层制完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如何改变？

对于董小姐，公众最直接的呼吁便是“撤销学位”，任谁也不会允许才不配位、德不配位到这种地步。除此之外，他们也对“4+4 医生”的信任度直线下降，要听到“5+3+3”才能松一口气。

但是这足够吗？查出了一个董小姐，还会有无数个董小姐，网友们也扒出了与她同级的“4+4”名单，发现“天龙人”比比皆是，他们都有相似的背景与大差不离的学术能力——当真正有志于医学的学生在当实习医生时被当做牛马使唤时，他们已经镀完金，拍拍屁股走人当官去了；更何况，“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我们已经明白，科层制，或者说不受监督的权力把官僚们塑造成了什么样子——这种制度蔓延到了每个角落。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出手压制舆论，许多知名博主的视频都被下架。谁站在哪边，不还是一目了然吗？难道我们能指望一次舆论、一轮曝光、一阵风波，就能扫清这些官僚的影响，让他们改邪归正吗？难道我们揪出个别的几个官僚，即使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这就足够了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是极为幼稚，要么就是在欺骗自己。

也有人说：“科层制毕竟是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你难道还能推翻它不成？”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推翻这种不断生产出腐败与黑暗的官僚制度。有些人似乎从出生到现在几乎还没见过官僚制度以外的组织方法，闭目塞听，认为更好的组织方法肯定不存在，这就是一种无知与狂妄。官僚制度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批量制造出腐败与黑暗，根本在于权力被自上而下地行驶。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权力运行方式，让权力自下而上地行使，这要求我们行使完全的民主——只有完全的民主，才能真正反映出广大群众、代表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无产者的意志与愿望，并让它成为全社会的前进方向；只有完全的民主，才能促成有效的监督，让权力的运行现身于全社会人民群众的目光之下，铲除暗箱操作存在的基础；只有完全的民主，才能让官员的升迁与撤销遵循真正合理的规则，而不是遵循利益至上的原则；只有完全的民主，才能让“选贤举能”的理想得以实现，让所有人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让社会发展的利益普遍地惠及每一个人。

而怎么样实行完全的民主呢？必须要发动无产阶级，必须要使他们组织起来；必须革命，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与官僚的统治，必须打破现有的国家机器——这是一个漫长、艰巨，且残酷的任务。我们必须与那些否定民主、维护官僚制度的思想观念与旧制度的卫道士做最彻底的斗争，让民主的旗帜飘扬在有人存在的每一个角落。

压制我们的政治权力牢笼必将毁灭！

VIII

天价耳环事件——一场特权与贪腐的“现形记”

刚刚送走了协和的董小姐，又出来个天价耳环的黄杨小姐。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只是又一次经典的富家子女“坑爹”，自改革开放的春风遍吹中国大地，日益靠着人民的血汗中饱私囊的富豪权贵膝下的优秀子女已经无数次在尝尽了“阵痛”滋味的中国人民面前上演讽刺度拉满的滑稽剧。这群人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里，自身丝毫不创造社会价值，却在物质上得到了来自家庭传承的、普通人穷尽一生都难以想象的满足。她们脱离了所以养育她们的社会，脱离了她们所以存继的现实，脱离了她们虚伪地歌颂着的苦难，精神上成为了孤高但是残缺而虚无的木偶。也许现在她不会感到难过，因为她的背后仍然有自己的父母，乃至党和国家来撑腰，但是对于得知自己的善心被用来养活这种废人而没有帮助受难的雅安灾民的全国人民，愤怒像洪水一般冲破了舆论审核。

黄杨小姐之父杨伟的履历堪称政商领域成功人士的典型：2011年以公务员身份入职雅安城管部门，2014年借调至投资促进局，同年注册影视公司；2017年辞职后，迅速成立多家企业，注册资本动辄千万，却在舆情发酵后紧急变更法人、减资至2万元，被质疑“洗白资产”。更讽刺的是，其女黄杨钿甜2017年因《楚乔传》爆红，与其辞职经商的时间线高度重合，商业利益与权力余温的“巧合”令人浮想联翩。这些东西在看惯了社会不公的中国人民心底不是不清楚，而是被长期压抑着，直到偶尔公开跳出来一个暴发户才给了所有人表达不满的窗口。

然而在滔天般愤怒的声浪之外，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网络上的各种所谓“理中客”呼吁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问题，声称官方已经给了通报，更应该信任权威信息的看似理智的说法。更有甚者列出一条条所谓的证据证明全网对黄杨小姐的指控都是“虚构”的。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事件只是风波最初的起因，而规模化了的这场舆论就并非福尔摩斯式的断案或者单单针对黄杨小姐一人和她家庭的调查：即使四川慈善总会终于出面声称所谓雅安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的负责人仅仅是“恰好”与黄杨小姐的父亲杨伟同名同姓，但**中国地方官僚的贪腐与最顶尖这一小撮权贵与富豪的糜烂生活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的**；黄杨小姐的父亲再解释耳环是假的，全国人民也清楚，他所代表的中共官僚利益团体豪饮人血、花天酒地的日子是真的。更何况经过调查，其父亲作为公务员在雅工作期间虽然未经手灾后重建项目招投标，虽然未涉及灾后重建资金审批管理和慈善捐款，但仍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在参加公开招录公务员考试和工作期间涉嫌故意隐瞒违法生育二孩问题，并遭到了监察机关的立案调查。这种因谣言而起却真的查到了问题的情节，真是幽默到令人忍俊不禁。

最后，事件也将会如同此前无数次发生的那些“坑爹”事件一样，随着热度的退去而淡出大众视野，即使有人发现，随着事件发酵，杨伟卸任原来名下的公司相关职务并退出股东行列，有“紧急切割”的嫌疑；即使还有评论指出，黄杨钿甜曾晒过豪宅，其过往发布的图片中也出现过价格不菲的奢侈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里没有去服务于帮德国人马克思拿到中国护照，而是最为尖锐地向权贵发起挑战。黄杨小姐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第二个赤裸裸地展露中国腐朽的官僚家庭吸血本质的例子。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统治阶级，或上流阶层的利益，从不会因单纯的一番网络舆论风波而得到彻底的动摇，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更没有彼方乐土可供离去。要想创造人类的幸福，实现人类的解放，除了从自己开始在一个坚强的革命共产党中组织起来，为了一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做足准备外，别无他途。



IX

马克思主义如何思考问题？

“科学”思维

在 21 世纪，算法推送的茧房效应和社交媒体上的谣言风暴时刻都在提醒我们：科技越发达，越需要科学的思维穿透表象来分析问题。科学的精神是革命者有效、正确处理信息的必备工具：它教会我们用证据替代偏见，以逻辑对抗情绪，并保持清醒的判断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和其他社会思想与政治理论不同的核心在于其“科学性”——它不是武断或臆想。但它自己宣布自己是科学并不代表它就是科学了，其研究方法必须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称之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认识，终归是在从“政治表面”向“社会生活的深度”了解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必须发现潜藏在“按照经济科学”的社会生活的底部的“某些事物”。“现代历史著述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所谓科学，就意味着发掘出隐藏于此类现象背后的本质：“前者（‘一切表现形式’，即现象）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即本质）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再比如在资本论中谈到“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时，马克思已经将现实世界中现象与本质的分离一语道破。“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它是用何种方式进行的呢？答案是**抽象力**，也就是说运用抽象力而实现的抽象这一活动。

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闻名的记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所面，对的对象就是现实。而被抽象的现实则表现为“范畴”。所以，具有科学性的作品，即使看似是在罗列“范畴”，其实也是将被抽象的现实进行观念再建造的结果。**在表面观察中无法捕捉到的本质现实，以科学的手段被再建造，从而得以表现出来。**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蒲鲁东，也是由于这点。“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此外，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

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所谓科学，无非便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不断探求事物的“为什么”和“为了什么”的工作。

这里我们要明确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后者将科学简化为对孤立事实的观察、实验与归纳，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批判的“小买卖”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将自然现象切割为碎片化的局部，用机械的因果关系解释整体世界。那种科学，就是所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恰恰体现在对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把握，这种思维在21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

现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宏观系统论与微观机制论**的辩证统一。在宏观层面，生态学揭示了生物圈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的整体性规律，气候模型展现地球系统的非线性反馈机制，这些复杂系统的理论体系证明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层展”现象。这些发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与运动转化的基本原理。而微观层面的分子生物学、纳米技术等则通过精密实验揭示物质结构的深层机制。解剖刀下看到的不是器官，而是组织的形成过程。两种研究路径看似对立，实则构成科学认知的完整图景：宏观规律为微观研究提供方向指引，微观机制为宏观现象提供物质基础，这正是辩证思维中“对立统一”原则的体现。

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层展论”为这种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注解。当生态学家研究森林碳汇功能时，既需要理解树木光合作用的分子机制，更要把握气候、土壤、生物群落构成的系统网络；当经济学家分析全球产业链时，既要考察具体企业的生产成本，更需揭示资本积累与空间重构的历史规律。**自然科学在微观实证中积累的知识碎片，需要通过辩证思维整合为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整体把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超越传统实证主义的关键。可见，**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替代具体科学研究的“科学之科学”，也不是与实证方法对立的玄学思辨，而是为处理复杂系统问题提供了宏观的方法论指南的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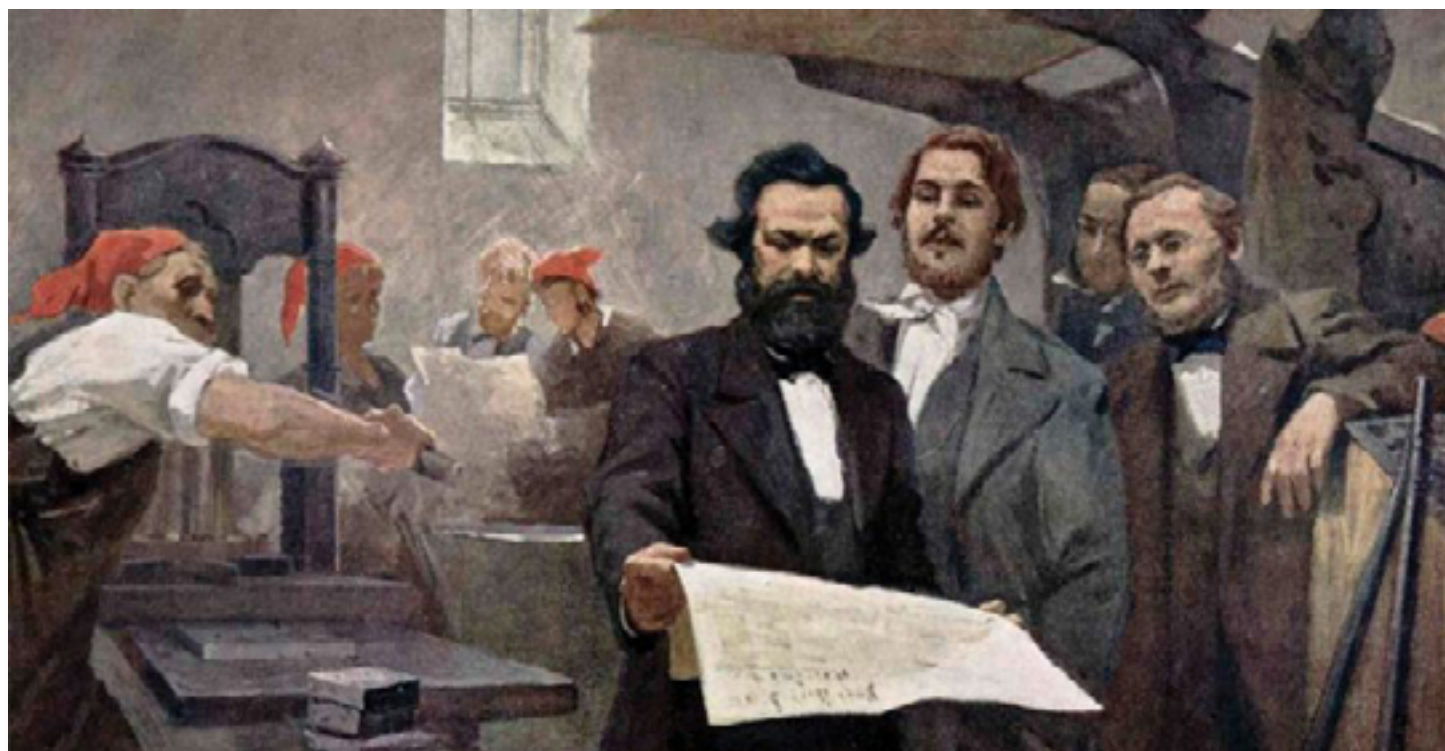
所谓“真理”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把自己视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了作为对它的批判的实践哲学。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历史主义，但只有在实践哲学那里，它才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本身也必将在文化的发展中被取代，这种取代将意味着人类意识已取得一致，并且这种一致是以一种把必然性完全吸收到自由之中的社会形式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过自身必然会被否定，同时还指出自身在未来必然被否定。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前，是不可能被真正否定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一段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法国物理学家雷诺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会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对它作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它的表述方式。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真理”，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

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碰到，它们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可见，人类的认识就其本性而言，对于漫长的历史发展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但是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科学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美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认识，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个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无条件的真理权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前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可见，人的思维既是至上的，又是不至上的。思维的至上性体现在其本性和终极目的上，但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由于个体和历史的局限性，思维又是不至上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可以把“现象界”和“物自体”相连接。



道德、“人性”

为了防止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本质主义”，因此在这里顺便提一嘴马克思主义对“本质”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始终是实践的、动态的，它强调本质的社会建构性和历史条件性，将本质视为一定历史的产物。

对于本质主义（尤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观）试图通过抽象概念（如“人性”“事物的永恒本质”）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些理论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本质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而非先验的、固定的。本质主义常将事物的本质归结为某种普遍性（如柏拉图的“理念”、宗教的“灵魂”），而马克思主义认

为这种普遍性是意识形态的，掩盖了具体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关系。

此外，马克思的写作方式突破了本质主义对固定范畴的静态考察，转而从辩证法的动态逻辑揭示现实关系。他拒绝用“XX是什么”的抽象定义框定社会现象，而是以历史具体性为基点，展现事物内部矛盾推动的演进过程。以商品分析为例，他并未给出本质主义的固化定义，而是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切入，呈现商品形态如何经由市场交换向货币转化，最终形成资本增殖的矛盾运动。这种正题（商品二重性）-反题（价值形式异化）-合题（资本逻辑生成）的螺旋式推演，使概念在自我扬弃中获得新的历史规定性。（本文也会使用这种写作方法写作）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将商品本质视为永恒自然属性的谬误，指出商品本质实则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呈现——劳动异化使得价值成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辩证思维在文本中表现为表面“混乱”的逻辑展开，本质上正是对社会关系动态性的理论映照。马克思主义通过这种辩证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具有历史动态性，例如阶级属性随着生产方式变革而演化（如封建领主向资本家的转变），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的，自然与社会规律都具有历史性，本质是“过程的集合体”。

马克思主义也特别强调实践的基础性作用，认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是理解本质的关键场域。**事物的本质并非独立于实践的先验存在，而是在实践中被不断重构。**以劳动为例，它不仅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物质过程，更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赋予产品交换价值的属性。当劳动产品脱离具体社会环境时，其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便随之消解。这印证了交换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形态，而非物品的固有属性。

马克思主义既然重视“科学方法”，那么它会怎么看待道德呢？（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科学分析必须和道德“结合”，才更能接近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道德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并且跟一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利益相联系的，不存在永恒的合适任何人的道德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道德说教，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科学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组织行动时坚持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一个手段只能由它的目的来使其正当，但目的本身必须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例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虽然客观上带来了铁路和电报系统，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殖民统治和资本积累，手段上的“文明开化”无法改变整体非正义性。目的和手段不是相互割裂的，目的本身就排除了一部分手段——正如我们不能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手段实现和平，也无法通过雇佣劳动制建成共产主义。

实现正当目的的手段都可视为正当，但这些手段必须与目的保持本质同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例如苏联对芬兰的冬季战争反映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扭曲，其手段违背了国际主义原则，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也存在程序瑕疵，但这些行动在最终都终结了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对工农的压迫，从整体来看，这些行为实际上是进步的，是“道德的”。

康德的“绝对命令”主张道德法则应具备普遍性与无条件性，但单单是中国的历史表明，**道德标准与“善良”“邪恶”的界定始终随社会结构、政治需求与文化思潮变动，难以形成超越时空的绝对准则。**商周时期，周人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取代商朝神权政治，将“德”定义为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政治品格，此时“德”与政权合法性绑定，具有鲜明的功利性。至春秋战国，儒家将“仁”塑造为内在道德核心，而法家则宣称“法”高于“义”，商鞅以严刑峻法重构秦国的善恶标准，证明同一时代不同学派对道德的理解已存在根本冲突。汉代“独

尊儒术”表面确立伦理统一性，但统治实践中“外儒内法”的策略，使得道德教条常为现实政治妥协。

此外，宋明理学试图以“天理”统摄道德，将“三纲五常”绝对化，但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催生士商阶层融合，传统“重义轻利”观念逐渐松动，徽商等群体通过“贾而好儒”重塑商业伦理，证明经济基础变动必然冲击道德教条。近代以来，道德标准的颠覆更为剧烈：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吃人”，将传统家庭伦理视为封建压迫；社会主义革命又用阶级斗争的标准重新定义了善恶，例如地主阶级的慈善行为被重构为“剥削伪装”，到了20世纪60年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又成为了最高道德律令，青年在“破四旧”中摧毁宗庙祠堂，将孝道斥为“封建糟粕”，而子女揭发父母“罪行”也会被视为“大义灭亲”而合理化。

历史证明，**道德从来不是先验的绝对法则，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利益与文化博弈的产物**。从周人的“德治”到中国工人国家的“革命美德”，中国社会对善恶的评判始终服务于现实秩序的重建，康德的“绝对命令”无法解释这种道德相对性与历史流动性。当道德标准随时代更迭不断被解构与重构时，所谓“普遍必然”的伦理原则不过是形而上的幻象。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道德的批判并非完全否定道德本身起到的一定的作用，而是揭示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历史暂时性**。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用了不少“道德谴责”。这是为什么？

道德话语的运用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三重逻辑基础。首先，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并非基于先验价值预设，而是从科学分析中推导出的客观结论。例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证明的剥削机制，在工人意识层面必然表现为“不公正”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的理性化过程就是阶级意识的形成路径。

其次，“道德批判”在这里也可以作为意识转化的催化剂，在认识论层面架起了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逻辑桥梁。工人对“剥削”的道德愤怒，实为对劳动力商品化本质的感性把握，这种情感能量推动其跨越“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认识鸿沟。最后，这种“道德谴责”的历史特殊性使其能够让工人阶级在主观上突破意识形态。当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粉饰雇佣劳动制时，马克思通过揭示契约自由背后的强制劳动本质，使“道德批判”成为撕破意识形态伪装的解剖刀之一。

这种辩证运用之所以可能，根源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主客体关系的重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必然在主体意识中投射为道德异化感，**科学理论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种主观体验，而是将其提升为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认知**。当工人意识到流水线上的压迫不仅是个人遭遇，更是系统性的价值剥夺时，“道德批判”就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阶级立场”“道德批判”必须是科学分析的结果，这两者必须服从科学，而不是让科学服从立场和道德**。

X

革命者如何“走向人民”

“走向人民”是我们革命党人基本的追求，如果留在原处，做一辈子可怜的边缘团体，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将是空想，是胆小的理论家们幻想一日群众捧着书来找自己签售的白日梦。如果不能尽可能精准地把握到工人群众的情绪和想法，了解在某一个突发的工人运动背后的主导情绪和个中细节，推动甚至领导一场革命便基本不会成为可能。但是，走向人民或者走向工人的最有效率的路线是什么？这个问题事关一个革命党的基本路线，多年来左派围绕着革命方法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回顾 19 世纪沙皇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为我们在这个讨论上提供绝佳的参考样本。

19 世纪下半叶的俄国面临的是一个逐步被资本主义所浸润的环境，这在外体现为克里米亚战争中帝俄惨败于工业化或基本工业化的法英两国，在内部则体现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腐朽的农奴制对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而对渐次开展资本主义改革或革命的中西欧国家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地处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在 200 年前就由彼得大帝开始了的追赶西欧豪强的进程上再迈一步。曾经的这场追赶由国家完全主导，通过强制命令驱动，试图“用野蛮制服俄国的野蛮”，这种仰赖蒙古式手段的西欧化的进程长期仅仅以贵族们争相学习巴黎和伦敦的礼仪、文化、时尚，不甘与世界脱轨为主要表现，未能渗入到政治经济与下层社会中。而现在他们必须把目光从俨然是一个袖珍“法语国家”的宫廷内移开，重新开始考虑数以亿的农奴和少数地主以及地方行政官员。在俄国，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思想，却同时也看到落后保守的生产组织形式对传入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强烈抵制——在这一点上，邻国大清都比它更为先进。

一些有条件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机会接触到的西欧最先进的社会思想和他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产生了如此的背离，以至于当即使坐拥了亚历山大三世改革成果的俄罗斯帝国再度在国际舞台中遭遇惨败——远东的日俄战争甚至使得帝国折损了相当程度的用作维持其帝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时，他们立刻担当了在这个动荡的社会拉开俄国接下来的几十年政治经济思想通过数次改革乃至革命激烈碰撞的舞台剧的大幕的报幕员，在俄罗斯帝国的舞台上演的戏码将完全不逊色于西欧以及世界上任何国家。

农奴制改革

1861 年俄国进行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消灭作为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因

为改革的方式极为保守且不公平：贵族以割地形式把部分农村土地占为己有，而农民为了得到土地，却还需要缴纳惊人的赎金。根据 1877—1878 年的统计，俄罗斯 49 省的 9150 万俄亩私人土地中，有 7300 万俄亩以上的土地，即约 80% 以上的土地，仍是属于贵族的。农民长期接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灌输，浓厚的皇权主义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他们经常掀起基于单纯的的不满的反抗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争，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甚至拥护和崇拜“好沙皇”。在田间地头，“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

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农民长期遭受着以教会为首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灌输而缺乏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意识，农奴制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也导致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能力的缺乏。1861 年的农民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当前社会制度的希望更是渺茫。但是随之而来的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走向工厂成为了无产者，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也不曾想过 50 多年以后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在农奴制改革后，一群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其基本理论可追溯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的自称是人民精粹的民粹派（又称以人民为根本的人或在人民中诞生的人）成为了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潮、运动之一。

想要理解俄国的民粹主义，就不得不先观察俄国的传统农村和村社。俄国的农村是公社的世界（在俄语中米尔——村社与世界共享同一个词），农民是米尔成员，米尔实行土地公有制，并定期重分。征税则“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米尔还具有村会选举和村社审判制度，在很多时候，米尔成员对于村社要承担的责任甚至要大于对国家，他们不仅是共同的束缚，也是共同的保护。

民粹派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视农民村社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坚信俄国资本主义没有生命力，可以通过推行村社化的计划走上社会化的道路，他们还预测用不了三两年时间就可以很快完成“社会革命”的目的。在民粹派看来，基于村社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依托村社便能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图景。从这些特点便不难嗅出他们空想社会主义的气味。

民粹派的发展

一，小组时期

19 世纪 60 年代末民粹派的小组遍布于各大学，不仅在莫斯科、彼得堡这两个首都城市、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一些省会城市，甚至在一切边疆区都出现了“地下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彼得堡大学生为核心的“柴科夫斯基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涅恰耶夫的组织叫“人民惩治法庭”，涅恰耶夫这位以不择一切手段的革命者所著的骇人听闻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对后来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革命者教义问答》共 26 条，包括革命者对自己、对革命同志、对社会和对人民的态度四个方面。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是《教义问答》的核心，共分七款，每一款都令人毛骨悚然。其中的核心观点如下：

“革命者是注定灭亡的人。他既没有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事业、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姓名。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惟一的兴趣、惟一的思想、惟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与社会

习俗、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通行的礼仪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果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有力地毁灭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的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有罪的。家族的温情、友情、爱情、感激甚至荣誉都应被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所压倒。对他仅存在一种欣慰，一种奖励，一种满足——革命的成果。他脑子里日夜都必须有一个思想——无情的摧毁。冷静地、不知疲倦地达到目的，他必须准备自己死亡并用双手扼杀妨碍达到目的的一切……革命组织必须制定被消灭者的名单，首先消灭对革命组织最有害的分子。……革命者必须把有钱有势的人骗入他们编织的网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至于自由主义者，应当装出盲目追随他们的样子，但在这期间，要使他们听命于自己，掌握他们的秘密，竭尽全力败坏他们的名誉，使他们永无回头之日。”

《教义问答》详尽地介绍各种骇人听闻的革命手段，却唯独没提到革命的目的，即革命是为了什么。相应的组织原则也在其中被总结为建立秘密的组织 and 铁一般的纪律，即成员对组织的服从，再服从，绝对服从。它把革命者分为两级：第一级革命者和第二级革命者。第一级革命者必须支配第二级革命者，把他们当作资本，用于革命的需要。如果第一级革命者认为需要牺牲第二级革命者的自由以至生命，他也有权这样做。在涅恰耶夫所创建的组织的核心五人组当中，有一个大学生公开质疑他给出的命令，例如完全伪造的“欧洲革命同盟”，后被涅恰耶夫联合另外三人将其诱骗后杀害。“人民惩治处”唯一惩治的对象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还有被叫做“地狱小组”的伊舒金的组织，以及等等，从这些小组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激进化和恐怖化的特征。这些小组成员分别为几十到一百人不等，起初他们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受巴枯宁、柯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债务”和“农村才是战场”的影响，知识分子们不再满足停留在口头说教的宣传活动，开始奔赴农村进行“社会革命”动员。

二，“融入群众”

1873 年到 1874 年间，民粹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数千名贵族、小资产阶级、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穿着农民服装，深入到他们认为是农民运动发源地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广大农村，号召农民起来革命，策动农民造反，全国至少有 37 个省卷入这一运动。这是民粹派理论是否符合实践的一次全面检验，他们中的有群人为了此行特地去学习俄语和其俚语想要“融入农民群众”，但是实际的工作在抵达乡村后便遭碰壁、无路可走。这群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天然存在的鸿沟和认知上难以弥合的差距导致农民难以理解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农民的识字率低到离谱，有学习意愿的更是寥寥无几，一言概之，在相比于城市本就经济思想极度落后的农村地区，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们怎么可能融入思想愚钝尚未开化的农民？对后者来说千言万语不如一顿面包实际。农民对这群养尊处优、衣食不愁的少爷们的宣传的态度更像是觉得他们“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干”。尽管民粹派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在农民眼中，



尽管民粹派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在农民眼中，

目所能及的都是一群“富少爷”，试图让自己“为了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去拼得头破血流”。群众因而对他们报以理所当然的轻蔑和仇视。更何况他们本来就认为父亲一般的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都是这些贵族和地主弄得我们食不饱、衣不暖。知识分子幻想中的农民运动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克鲁泡特金称为“疯狂的夏天”的1874年至1879年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遭受审判的就有2500人。那些发动群众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到民间去”运动“是以大规模的逮捕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审判而告终、因之前被他们视为革命源泉的农民告发而逐渐落幕”的。

民粹派在**失败以后首先意识到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并于1876年在圣彼得堡重建了“土地与自由”社，其主要要求包括把所有土地交给农民、推广完全自主的社会管理机构、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的自决权，但其最大的亮点是奠定了“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雏形：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特卡乔夫面对势力强大的沙皇专制政府，提出要采取集中制的战斗组织。这不仅有利于革命事业迅速蓬勃地开展，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积聚革命力量和保证个人安全。特卡乔夫在他创办的《警钟》杂志上规定了这种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最重要的原则：权力高度集中；铁的纪律约束；下级服从上级、组织服从中央执行机构，即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特卡乔夫按照这些原则建立了秘密团体——“人民解放协会”，并通过严格的组织章程和细则对它进行领导和组织管理。这些摸索后来成为了列宁写作《怎么办？》的丰富养料，哺育了当时尚在这位巨人头脑中酝酿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由于在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土地与自由社于1879年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土地平分派坚持土地与自由社原有纲领继续开展活动，而热里雅鲍夫和米哈伊洛夫等于1879年建立“民意党”。后者是十九世纪80年代民粹派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这时他们已经不指望与农民建立联系，失去了到农村发动群众的热情，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同政府的拼死一搏上，个人恐怖活动成为主要的斗争手段。

三，恐怖主义

民意党总结了之前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且指出农民受教育程度过低、温饱尚成问题的现实和俄罗斯帝国上层专制、下层盲从的社会结构导致融入农民去启发和引导革命基本不可能成功。相反，只有通过将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即贵族和沙皇杀掉，先进的知识分子再鸠占鹊巢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要势力之后，受压迫群众才能醒悟过来。民意党在党纲第五条第二款上专门论述“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它明确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借助密谋手段”。在他们看来一切的“善”都是由“恶”去促成达到的，主张为了崇高的目标不惜使用最恶劣卑鄙的手段，要让“恐怖活动的炸弹响遍整个俄罗斯”。这时的民意党同样提出了“精英领导群氓”“革命是由少数人完成的”“伟大的事业总是由先进分子去促成的”等思想，他们自命“由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家团体”，因此“理应要领导革命、拥有多数权力”，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以恶抗恶”完成的。

民意党的执行委员会控制着一个由工人、学生和军人组成的小组网络，渗透了接近50个城市，其成员数尽管从未超过500，但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民意党成功暗杀了大量的贵族、政府和军队要员，在七次尝试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最终于1881年3月31日得手，本以为在成功刺杀以后会唤起受压迫群众心中反对封建势力、旧统治阶级以及求自由的渴望，但**刺杀反倒先引起了镇压**：沙皇政府中止了拟议中的改

革方案，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力量得势。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上任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强化社会治安、惩罚罢工游行。在之后民意党中也有些人（列宁长兄）也尝试刺杀过亚历山大三世，后来事情败露遭遇清洗被杀害。民意党不久便解体，到1897年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犯达30万人（其中相当比例的是行动民粹派），占该地区人口的5.2%。随后在国内的民粹派的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暗杀范围逐步扩大，“战斗队”仅在1906年7月-1907年5月的10个月内，就完成了72次暗杀活动，有10个省长、2个市长和诸多的将军元帅命丧黄泉。1901-1911年因恐怖活动受害的人达上万人。沙皇的镇压随之升级。俄国的民粹派在沙皇的严厉镇压下失败，幸存的中坚分子大都流亡国外。流亡到日本的民意党人与中国同盟会取得联络。1905年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明报》在东京创刊后，就登载了许多俄国“虚无党”的事迹，由于崇尚暗杀活动同盟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暗杀部，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做教练传授暗杀经验。徐锡林、吴樾等刺杀满清大员的活动，就是学习民意党的结果。

如何“走向人民”

纵观俄国民粹派在19下半叶世纪的两波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向民间去”阶段还是“密谋阶段”，民粹派的领袖和骨干们始终没有能够“融入”到底层人民中，没有能够做到去体察他们的情绪和想法，并且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底层人民的实际利益（向每天累的不停的农民群众去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和杀掉沙皇不能够解决任何劳动群众的任何实际需求）。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基础和建构其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早已不同，但是压迫剥削仍然没有消失，作为革命者的我们去深刻地了解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是重中之重，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究竟哪一点更符合我们最终成功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稳固工人政权的目标呢？现代左派中主要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融工”的同志们，认为革命者必须通过单个去打工或调集全国人手到特定地区打工的方法融入工人阶级中去。原因无非两点：一，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未来革命的主力 and 领导者，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可以增加影响力，革命组织不能脱离自己效忠的阶级，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二，如果革命者不愿意、没有勇气融入到工人中，就是不合格的、不愿意牺牲的。

“先锋队”的同志们学习了列宁在1902年所著文章《怎么办？》中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通过这种策略，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意识和政治上最为激进的部分，被称为革命先锋队，他们的责任就是组织起来，以吸引更多的工人阶级走向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最集中的体现。从理论上讲，先锋队的目标并不是成为试图将自己置于运动中心，不是引导只朝着与其意识形态一致方向发展的，也不是脱离工人阶级的独立团体。相反，它旨在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带来阶级意识，然后是革命意识。所组建的共产党应严格保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负责教育并引导群众。人的意识囿于本身的限制，不仅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灌输，也难以认清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并线性地发展自己的认知，因此必须要有先锋队去规模性系统性地引导和启发。

当代左派往往纠结于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着手先融工，还是建立先锋队？

我们的回答是，融工和先锋队从根本上就不是二元对立的两种选择。到工人中开展工作是一种招募党员、提升影响力、在基层建立工人组织、锻炼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和团结的手段，而先锋队则是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这个工作的基础。

革命共产主义者清楚地明白，作为“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革命党决不能摆脱群众的自发性而行动，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自发性是决不足以推翻已然形成坚实的自觉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原子化的融工，即使能够局部地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但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没有丝毫改变，专制政府得以轻而易举地像镇压任何一场小型经济斗争一样镇压掉一次融工的全部成果。

假如融工没有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目的的机构的运作之下进行，那这样就会是毫无意义的，试想一个工厂内的工人运动已经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有准备的去应对罢工的各项需求（如工人罢工期间生活资料的供应），就不能是仅仅局限于个别生产场所有限的经济联系所能满足的。原子化融工似乎除了了解工人状况，“洗去自身小资产阶级性质”外，在其他的作用上相当差强人意，并且融工的同志也几乎都是学生和小资产阶级，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工人的信任，仍然会有隔阂，即便过了100多年，基层的工人仍然是操劳于维持生计，根本很少有时间有兴趣去了解各种理论知识。比起念上几页圣经，给工人一瓶水更能获得他们的好感。融工也有相当的概率四处碰壁，假如一个政党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融工上，甚至说大部分领导层都去实际进入工厂，那对党的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政令的实施具有极大的危害。融工是为了组织起工人的一系列勇敢的尝试，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其本身的局限性。绝对不能让融工变成一种拖延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障碍，变成一种个人的救赎和“政绩证明”，沦为逃避思考学习的一种麻药。



要求建立一个革命党是否操之过急？先锋队是否必然会滑落到脱离群众的结局？需要明确的是，**革命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体现**。革命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革命党自觉地干预历史过程，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上去。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不该脱离群众哪怕一秒钟。但正如国家不是口头废除就可以消亡的一样，群众性更不是主观上声称存在就存在。革命组织，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在一开始都大部分由倒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先进工人构成，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主观上将这些革命者全部扔到工厂里强行转为“工人阶级”，也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改变不了革命组织早期成员的来源**。这个构成并没有阻止他们未来迅速扩张，从一个干部党迅速成长成为一个群众党。这个转型是因为他们培养出了足够的干部，且将先进工人有效地组织在基层可以随时进行动员。

党“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从事的不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革命党必须与她尚在襁褓的时候决裂，即与民粹派那血腥秘密的党决裂，转而张开双臂拥抱列宁为我们带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外部形势和革命的进程中以唯物主义辩证法民主地确定自己的路线，并用钢铁的纪律将其贯彻。“当课题是为下一个时期制定政治路线时，民主就会胜过集中制。当课题是如何执行政治行动时，集中制将民主置于自身之下。当全党认为需要批判性地检视自身过去的行为时，民主将再次彰显其权利。民主与集中制之间的平衡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求得，时而被破坏，又时而被重建。”这将会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先锋队的存在决不意味着群众在共产主义者的视野中就此消失。在俄国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在人数最多时期也就数万党员，相比于俄国的人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是每一个党员都有能力去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这就是先锋队的意义：坚实的组织基础，纪律严明、行动一致地展开群众运动。扩大先锋队的规模、增加革命主心骨的数量，发展到足以运营可以进入工厂或者其他工作场景之后，去启发、号召更多的工人、先进工人加入组织，这样了解工人的实际生活、走进工人的需求的问题其实就已经通过先进工人加入先锋队而得以解决。更广大的工人群众在罢工等斗争时的生计需求，也将在运动爆发之际得到保障，并为斗争吸引更多外围群众的参与提供基础。

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就必须等到人手增长到百分之多少，把工人全部拉入党才行是最机械的看法。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就像工人阶级领导全社会进行革命一样，人数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影响。最重要的在于组织程度和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共产党要获得增长，是取决于客观的阶段进行合适的行动。无论在不在一个场所进行工人工作，都需要量力而为。现在将全部人手打入工人做宣传，宣传效果很差就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干部素质，这些干部的能力可以通过宣传锻炼，但是自己理论的短板就是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不改变就会阻挠真正有效组织起任何工人。招募成果上缺乏内部的组织度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即使侥幸招募了几个工人加入，也没有能力消化，利用这些工人开展更广泛的工作。同志们，想想我们在自身组织都如此散漫的时候，能真的在外围塑造群众的组织，去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吗？当尚为婴儿时，把自己扔进小学不是“快速锻炼能力”的方式，而是不自量力。

所以，同志们，我们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我们“融入”：**什么阶段干什么（最合适的）事，什么人干什么（最合适的）事**。东西不是说必须“分步”走，必须僵硬、严格地在一个阶段就

干一种工作；而是说任何情况下开展工作必须三思而后行，考察以下三点：这个工作的紧迫性如何？组织的力量如何，增长到了什么规模？这样的成效会如何？

融入工人不会自然就懂了自己该如何干革命，革命的理论不在工人中，理论本身是根据时局做出的判断。真正做出理论的是资料，调查，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对于共产主义者则是对目前阶级情绪、力量对比的判断，对于政府对群众控制力的判断，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真正的无产，甚至被资产阶级剥夺了潜下心分析思考现实的时间和能力。因此很多时候，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共产主义基本理论的贡献都来自于背叛了资产阶级投靠于革命的、接受了更高级别教育有更好的思维能力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背景出身的革命者。“向工人中去”不是得出革命理论的方法，只是收集到客观资料的方法。这个资料国家统计局、非共产主义者的各种渠道也都能得到，收集资料只是第一步；有了再好的资料没有分析的能力，也是毫无帮助的。

我们开展工人群众的工作，将理论转为现实，则需要将工人成员在锻炼成为党的干部后，去在基层影响身边的工人，尽力建立党支部，然后以此为根基去组织其基层工人的组织，塑造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提升他们的意识，领导他们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动员。改变自己的身份和背景，不会改变自己的能力和观点。我们现在不需要急躁，学生这个身份不是一辈子不变的：未来要不啃老，要不就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共产党的阶级背景不是主观调控的，而是客观形成的。

我们首要的目标将会是“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培养先锋队的工作能力（不管是沟通、联络还是写作宣传），让每位成员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去工厂联络、组织发展，吸引先进工人，以及完成组织对他们的要求。进而最终能够使党成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群众党，用扎实而科学的行动真正地实现“走向人民”。

XI

从坚定拥护到彻底反对 中国的“中产者为何投身反 建制运动”

序章

自从 1980 年代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右派官僚的领导下复兴资本主义制度，工业城市以及基于工业发达地区的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成为中共加紧剥削、压迫的“重灾区”。产业工人和广大无产阶级劳工广泛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供需均衡政策，比如，在东三省，一位煤钢或铁路工人的工资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正是由于工业发达地区因计划经济导致的供需均衡、稳步发展不符合资本主义创造大量劳工失业、形成劳动力后备军进而创造低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为重建资本主义、加入世界帝国主义的国际市场主持了一大批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的去工业化、去产业化。

面对着广大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动员起来捍卫权利的涛涛怒火，中共自 1980 年代起不得不巩固全新的阶级基础，巩固他们已经彻底丧失的无产阶级支持，并镇压工人运动。随着东北、华北等地的去工业化，全中国在 1990 年代出现了大量经济萧条与生产不足，而工人失业造成的消费锐减进一步扩大了各大产业衰退。通过这样的方法，中国政府人为创造了一个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工人因为失去工作和生计不得不含泪同意扩大剥削力度——在去工业化、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劳工人口所代表的潜在生产力远高于当时的生产需求，中共开拓了一片劳工价格极为低廉，不断累积的资本可以轻易组织起能让他们攫取暴利的大规模生产。中共去工业化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中国的生产力衰弱，而是通过暂时性的经济危机打垮计划经济下非常稳定的供给结构，并通过物料稀缺、生产不足、工人失业等多重因素打压群众斗争，并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打下物质基础——中共和中国政府内的许多官僚开始了“大下海”，许多曾经国企、地方政府的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家资本自由化、私有化的“弄潮儿”，他们肆意玩弄着手中的权力，将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国有资本通过“政策手段”化为市场经济的私有财产，自己也顺势从官僚制度中的管理者变为了新兴资产阶级。资本的成长与对外沟通需要乐园，于是，上海浦东、深圳等大量新开发区和新城市被建立起来，成为资产阶级掌控下的生产力聚集之地与新金融事务的核心区；与此同时，全中国成百上千座城市摇身一变，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中心与工人阶级享受应有物质权益的地方变为了各地资产阶级和官僚的金融中心、政治中心与统治中心，中国城市的组织形态被深刻改变——经济计划委员会变为了国资委、发改委、银保监会与证监会，供销社的角色被数量繁多的小商铺与大

超市取代，工人阶级集体拥有的饭店和娱乐中心变为了一家“市场化”的小企业。现代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下文简称为“工贵”）便是产生自这样的环境。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上述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密不可分；在1980年代起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城市中生活较为富裕人口的集合体逐步壮大成为一个政治上不具备自主性、经济上高度依赖国家和市场环境的特殊阶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体工商户，这一阶层的成员主要包括从事个体经营与技术服务、处于中层管理位置的公司职员、初级公务员、教师、医疗乃至传媒行业的“白领”，以及新兴的数字平台经济中的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劳工。他们虽然在资产占有上尚不能与垄断资产阶级媲美，却在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上普遍追求与资产阶级接轨——广纳小资产阶级与“工贵”的“中间阶层集团”（简称“中产”，这里避免使用“中产阶级”这一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对阶级的定义，而是采取“中产”这一具有一定物质条件层面术语代表性的词汇）在中国的定义包含所有自雇者、在企业和产业中取得可观分红的中高层管理（华为等企业以工人持股为幌子缓解阶级矛盾的政策并不包含在内）、金融机构与企业中的管理者与脑力劳动者、中层公务员乃至大学教授等不直接、直观受资产阶级对个人劳动所得剥削，且享有较好物质生活条件、在改革开放前中期处于更为宽松政治环境中各“中间阶级”的所有人。从物质基础上来说，他们中既有小资产阶级，也有无产者工人，但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中获益、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是这一中间集团内几乎所有人共有的特征。

小资产阶级的兴风作浪

在改革开放的所谓“黄金时期”——尤其是1992年南巡讲话后到2012年前的二十年——中国的城市中产集团通过小资产阶级个体户与金融从业者的暴增及其所附属的各类物质需求，在各个都市圈内迅速成长为一个数量庞大、结构复杂、对政治和经济极为敏感的阶层。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浪潮的直接产物，是中共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在初期依赖的主要“稳定器”。一方面，这一群体从房地产资产的暴涨中获得了巨额“被动性积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年至2015年间，中国城镇住宅平均价格上涨超过400%，而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不足200%。大量购置早期商品房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企事业单位内部购房、教育系统分房、自由职业初期买房者——在短短数年内通过房产实现了家庭资产的“倍增”，由此产生了对制度的强烈正向反馈认知。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的主业集中在国家主导服务型扩张领域，如教育、医疗、银行、互联网、传媒、电力系统、铁路系统等。这些行业一方面受国家管控，另一方面又被“市场化改革”所部分撕裂，使得行业内职工普遍享有稳定薪资、福利制度、编制优待等“体制残留红利”。加之城市化所带来的岗位结构性扩张，大量依附于改革开放后推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中国政府国家政策的中产者得以在看似“技术-知识-专业”导向的职业路径中谋求阶层跃升。于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中被广泛视为“中间阶层”，并非因为其在财富或权力上的稳定，而是由于其特殊的双重依赖性地位：一方面依赖于国家权力给予的准稳定职业环境与资产升值空间，另一方面又依赖市场化运作中对专业性、流动性和消费能力的认同。然而，正是这种“双重依赖性”，埋下了他们在中国政府走向帝国主义霸权之路后，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垄断化、公共服务排他化的多重冲击下，成为最早被挤出“安全区”的群体。

无论如何，在最终崩溃到来之前，中产者都吃尽了时代红利。正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中产真正迎来了其“繁荣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与“去工人阶级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原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社会逐渐让位于以知识劳动者、小商户和中层管理人员为核心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构。在“高知识分子下海”、单位改制、

个体经营合法化等多重政策推动下，大量高校毕业生、前国企职工、事业单位干部等转型进入金融、保险、传媒、电商和民营教育、医疗等新兴行业。在此过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集团（知识阶层）迅速积累起初步资本，形成了既依赖国家政策、又享受市场红利的“灰色中间层”。仅1990年代末，中国城镇小资产阶级人口即从1982年的不到800万增长至超过1400万，增幅接近100%；其中金融行业脑力劳动者人数更从1982年的70万暴增至1999年的300万，增长超400%。这批迅速成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其物质生活水准和社会话语权在新世纪初期也随之显著提升。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集团是大资产阶级与中共官僚巩固城市作为统治中心的物质基础、稳定人口中心的社会环境并为金融产业和政治机构的扩张提供人力和劳动支持的重要群体，他们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阶级，成为了公务员和各类脑力劳动队伍里的中流砥柱。作为“改革成果”的受益者，往往拥有商品房、稳定收入和一定的社会保障，并大多通过媒体、教育系统、行业协会等组织渠道对社会舆论施加显著影响。这一群体主导了90年代后期至2010年代初中国社会中的“主流意见”建构，从“经济发展优先”“稳定压倒一切”到“改革开放不可逆”等论调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这一阶段被中国政府和“知识界”普遍视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主力群体，尽管其经济上无法比肩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缺乏真正独立性，但其在文化与社会结构上的中介功能却为维稳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柱。他们看似代表工人阶级，代表劳动者，实际上却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稳固不可或缺的一环。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群体的政治表达能力远超无产阶级，比如演员、公众人物、大媒体平台博主等普遍掌握传播工具的传媒从业者，他们集中于教育、传媒、技术服务等话语强势行业中，成为“主流社会”的代言人。一旦社会危机或不稳定因素出现，中国政府往往通过迎合

该阶层的利益诉求来获取广泛社会的妥协与支持。例如历年国有资本操纵下的房价暴涨就是中共通过维持房产升值保障其“被动积累”，“统战”早些年在城市定居的大量金融从业者和中高级脑力劳动者；在教育医疗系统出现问题时，优先保障体制内编制岗位与其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等一系列政策。这种策略一度极为有效，使得中产集团在表面上对国家统治表现出极高的忠诚与支持。然而，这种看似稳固的忠诚，其实建立在资产膨胀预期和体制稳定预期的双重支撑之上，一旦面临系统性资本危机或福利制度崩塌，其立场便极易发生动摇。

阴霾

于是，当中共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之路，当中共不再仅仅关注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扩张和城市的建设，而是被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逼迫，不得不建立起中国完善的生产体系、和美帝国主义霸权做决定自身命运的殊死一搏时，城市中产者的经济优势地位便逐渐悄然消失。

无论是佳士运动中尝试动员工人发动罢工与革命的左派学生，还是白纸运动中起领头羊地位的自由派白领，他们都代表了城市中产阶层在2015年后逐渐累积的政治不满，并以看似激进的意识形态语言和类似世界各国历史上小资产阶级自发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在中国城市中产集团从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转变为体制不满者的历史过程中，存在一个极其关键却常被忽略的节点：即这一群体的“双重依赖性”在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已由支撑其繁荣的保障机制转化为制约其命运的矛盾根源。正是在中国政府完成“世界工厂”转型、并在2012年后逐步进入帝国主义争霸阶段的宏观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的相对稳定性开始丧失，进而在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与社会重构中显现出其政治态度的断裂与身份认同的失衡。所谓改革开放“弄潮儿”的经济特权——无论是来源于房地产暴涨的资产溢价、还是来源于编制与公共服务行业的体制残留红利——都建立在全球化红利与国家经济扩张期对该阶层的功能性需求基础之上。一旦中国政府的统治逻辑从“稳增长”向“战略压缩”“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转型，这一群体即被迫面临去资产化冲击、职业结构飞速变化以及政治角色彻底失衡的困境。2015年后，中国房地产业泡沫压力剧增，民间信贷危机频发，许多不动产价值开始缩水，而债务率却不断攀升；数字平台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中层技术岗位与行政职能的“中空化”危机，教育、医疗、传媒、金融等城市中产者集中就业的行业遭遇高强度的结构性压缩与绩效驱动，体制外岗位流动性愈来愈高、不稳定性愈来愈强，体制内则愈发呈现出“去福利化”倾向，再一次成为工人阶级家庭“考公”求稳定的出路而非昔日富裕市民的乐园……于是，城市中产居民的“职业稳定性”神话不复存在，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从功能性合作者向潜在对抗者的辩证转化过程。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分析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时所言：小资产阶级在经济萎缩与政治边缘化的夹击下，往往呈现出高度动荡与非理性的反建制情绪，成为政治动员中最容易被“激进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话语”俘获的阶层。中国城市中产的心路历程与百年前相对物质条件极为相似、甚至一致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如出一辙。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这种情绪产生自中国逐渐转向帝国主义争霸、试图整合国内政治力量、压制不稳定因素并重新建立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公共契约的过程中对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上述物质利益的挤压。于是，人们看到中间集团在言论上愈发激进，既包含对“精英政府”“既得利益”的怨恨情绪积累，也有对国家政策失序（如教培双减、房地产调控、医保改革等）的强烈反弹，更是有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恐惧“阶级滑落”、对底层劳动者群体既同情又排斥的“阶层焦虑”。由于他们长期以来政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相对宽松，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之

中知识分子为主的集体开始了对欧美自由主义话语的“功能性借用”——与普遍认知相反的是，这绝非是出于意识形态认同，而是出于对现行体制困境的逃避式抗议，是一种心理困境。于是，中国中间阶层中占据知识与发声渠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式帝国主义崛起的进程中，正由“维护现状的主力”悄然转化为“不稳定因素的潜伏载体”——它的觉醒并不意味着阶级自主性真正形成，而是对自身边缘化地位的一种政治反射：一方面试图重新向国家靠拢，试图通过喊话获得“统战地位”、保障与再分配的再确认；另一方面又在体制不断“瘦身”与“打破铁饭碗”的治理逻辑下逐渐失去信任，走向分裂与游移。

科学社会主义中传统意义上的“高等工人”，如教师、医生、记者、公务员等职业，曾长期被认为是“体制内的稳定力量”，但这一现实从201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崩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逐渐冲击自由市场，中国面对内部经济失调的巨大压力和工人阶级抗争的巨大炸弹，无力继续维护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于是改革初期形成的“铁饭碗”制度逐步被绩效化、合同制、临时化、外包化所取代——以教育系统为例，自2015年以来，全国大中小学系统内部的大量正式编制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合同制教师、代课教师与教辅岗位人员。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中有超过22%为非正式编制，而这一比例在县域及以下地区则超过35%。这些人承担着与正式教师相同的教学任务，却无法享受住房、公积金、晋升通道、医保等保障，在地方财政紧张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处境愈加边缘。类似趋势在媒体行业、医院系统、科研单位中广泛出现。原本靠“体制红利”保有尊严的知识性职业群体，正被一点点转化为劳务派遣者、编外合同工、项目临时人员。他们被迫面对市场最激烈的竞争，却由于竞争的激烈无法享受资本所给予的任何溢价。他们既失去了体制保护，也未获得所谓市场经济的青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不沾、下不靠”者。

与此同时，在2014年之后，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趋于饱和，小资产阶级内部原本最具“精英性”与上升通道象征的金融行业从业者与其他脑力劳动者（如咨询师、程序员、设计师、工程师等），也逐渐陷入物质地位与社会预期的双重衰退。这一变化极为关键，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中产市民阶层的“黄金神话”——即只要依靠学历、智力与专业能力就能实现个人财富积累与社会流动的信条——正被系统性地瓦解。金融行业曾一度被视为改革开放之后小资产阶级“精英化”的集大成者。从1990年代证券市场的建立，到2000年代银行系统与国际接轨，再到2010年左右资本市场多元化发展，中国一线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成为中共话语体系中“专业化城市白领”的典范人物。他们往往拥有海外留学背景或重点高校的金融、经济、数理等专业教育，能够通过大型银行、券商、基金、公募、私募、PE等渠道获取高额薪资与年终分红。而在城市空间中，他们是消费主义的中坚力量，房产、车贷、信用卡、海外旅游、健身、美食、奢侈品消费与国际化教育，构成了他们的典型生活方式。然而，2014年之后，这套生活逻辑开始遭遇系统性崩解。首先是经济周期的变化：2015年的股灾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长时间的震荡调整，随后监管趋严、去杠杆、金融防风险等宏观政策轮番上阵，直接压缩了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行、券商、私募的盈利空间，大量以“项目提成”与“分红”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金融职员面临断崖式降薪。与此同时，银行业开始大规模“去人力化”——柜员岗位被网点合并与自助终端取代，中后台岗位则被外包与自动化系统压缩，大批非核心岗位员工被迫转岗甚至裁撤。2022年，央行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人均收入也自2018年后进入长期停滞区间。

其次，金融行业迎来结构性泡沫破裂。从2016年P2P行业集中爆雷，到2020年蚂蚁金服上市失败，再到2021年教培行业遭遇强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被全面清理整顿，大量依赖金融科技与政策红利生存的小资产阶级创业者与中层管理者遭遇了职业断层。原本依赖资本“故事”维系的高薪岗位逐一消失，许多30岁出头、已经成家买房、背负车贷的前“金融精英”重新回到就业市场时却发现，自己既不再年轻，也没有掌握真正可迁移的技能，无

法与更廉价的应届生、自动化系统竞争。与此同时，平台化、绩效化、外包化的工作机制也在金融与高端服务行业中全面渗透。曾经依靠“资历”与“背景”获得稳定工作的模式，被“打卡制”“KPI”“996文化”与年年考核的项目制彻底取代。咨询、律所、科技、传媒等行业的中低层职员，普遍被压入“类外包”合同关系中，即使挂名为正职员工，却面临项目随时终止、无固定工位、无固定上司、薪酬极度不透明的境况——许多曾经是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集团劳动者惊恐地发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失业的无产者工人阶级一员。根据2021年某猎头平台的调查数据，一线城市35岁以下从业于金融、咨询、互联网的职员中，有超过38%属于“非固定合同、无年终奖、无晋升路径”状态，而在2023年该比例已超过47%——而这些人当中，有超过86%是曾经缴纳第二等甚至第一等税收，也就是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高级别个人所得税的人群。这样的思想落差是极为显著的。

此外，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暴涨，也对城市高收入脑力劳动者阶层形成了极大的物质性压迫。2014年之后，北上广深核心地段的房价上涨远超工资增长——以深圳为例，2015至2021年间，全市平均房价上涨了超过85%，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到35%。一名月入两万元的金融分析师，在购房与赡养、抚育的双重压力下，已几乎无法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积蓄。而租房生活成本同样持续攀升——尤其是“长租公寓”制度下的押金冻结、租金贷陷阱，使得许多青年脑力劳动者陷入债务循环。这批人中的许多原本是国家意识形态最为倚重的“中产楷模”：他们既不像“暴发户”那样令人反感，又不像“草根创业”那样不确定性极高——他们是“新中产”的表率，是“知识创造财富”的活证据。然而到了2017年以后，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裁员名单与心理诊所的病人名单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35岁焦虑”“中年危机”“考编热潮”的集体呐喊。他们之中，不少人正在转向对国家政策的质疑，转向对“努力就能成功”的叙事的反思，甚至加入底层劳动者的联合抗争——这一切都表明：城市脑力劳动者曾经享有的优越地位与信仰，正在快速坍塌。



如果说金融、教育与医疗产业的变化代表了“体制外倾”危机的加剧，那么平台经济（包含一切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产业）的扩张则让大量本来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城市边缘劳动者被极速压迫、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甚至直接解体了这本属于中产集团中坚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让他们彻底陷入“自我剥削的泥潭”。在2015年至2022年间，中国的所谓“灵活就业人口”（即自雇个体户甚至是失业者）从2亿人迅速增加至超过4亿，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外卖配送、网

约车、直播、电商、内容创作等领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类产业的从业者往往被视作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一份子，除美国以外来廉价移民劳动力为主的这些平台经济产业外，欧洲与拉美国家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是年逾不惑乃至花甲的老人，他们在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期通过尚未健全的法律制度轻易成为私营交通系统的一份子，拥有自己的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全部所有权，同时平台必须保障百分之八十（意大利、法国）以上的收入分成，并提供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障。同时，许多历史更加悠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的统治阶级都懂得扩张小资产阶级人口对自身统治地位巩固带来的巨大优势，大幅度提高

如视频和社交媒体软件创业者的收入，并允许他们更加轻易地商业化、产业化，迅速将流量变现、形成平台经济上的小资产阶级资本集团。于是，这些国家的许多平台经济从业者都符合自雇佣劳动力的定义，每天工作不到六个小时，在闲暇时间还能够参与其他生产活动，通过自主劳动获取收入的理想场域。

怀揣着这样的理想，许多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 2015 年前后加入了平台经济大军，而 b 站、滴滴等软件一开始十分友好的政策似乎让他们看到了跟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跻身小资产阶级行列的希望。然而，他们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愚蠢与疯狂——中国的资本家不懂得巩固和扩大小资产阶级，而是疯狂剥削，平台经济从业者们迅速成为算法控制下的“精密劳动动物”。以外卖行业为例，饿了么和美团骑手系统通过全流程数字化调度，压缩了个体劳动者的自主空间，推行“毫秒级绩效管理”与“地图奖惩制度”。一项 2021 年对 300 名外卖骑手的调查显示，超 65% 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超过 10 小时，而其中有高达 72.3% 月收入不足 5000 元，缺乏任何社保与医疗覆盖，而就是这样的数据也和他们的实际跑单量挂钩。这一数据揭示了平台经济的本质：以“工作时间自由”为名义，建立彻底的劳动支配机制，实际上倒退回资本主义最野蛮时期被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的计件工资制度。同时，b 站、知乎等媒体平台的从业者激励在 2019 年后也迅速下跌，时至今日，许多一两百万粉丝的大博主只能依靠大规模播放广告艰难谋生。于是，原本幻想通过“创业”走上致富之路的自由职业者，发现自己在微博、抖音、B 站、知乎等平台上只能靠“打赏”“数据”换取极其有限的生存空间。算法改变了内容分发机制，打破了个体劳动与收益之间的可预期性。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的自营性被彻底侵蚀，取而代之的是对平台规则的依赖性和对观众注意力的奴役。

伴随职业结构与收入结构的剧烈不稳定，城市中产者家庭内部长期积累的“阶层上升逻辑”开始断裂。其核心在于教育与住房这两大支柱的失控——这两大支柱同教育产业与金融产业的业内情况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危机网。随着中国对优质教育资源（如“985”“211”“双一流”高校）的集中配置日益强化，城市内部的高考竞争变得极度内卷化。根据《中国教育年鉴》数据，2022 年中国高考本科录取率为 42%，但在中西部省份低至 30%；而北京、上海的重点高校录取率却接近 70%。本身，中西部地区有足够资源参加高考的家庭就有相当部分来自生活较一线城市而言更差的小资产阶级，而这样的新现状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二线以下城市的富裕中产家庭而言，其子女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在迅速关闭。住房方面，自 2018 年起，中国政府全面收紧房地产信贷政策，“房住不炒”成为主旋律，使得新一代中产者无法重复父辈通过房产增值实现阶层跃升的路径——这其中最受打击的就是以贸易和销售个体户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往往缺少除自身经济资源以外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在“学区房 + 双减”政策的合围下，家庭收入与教育资源的严重非对称性进一步挤压了年轻一代的社会流动可能。许多年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即“中产二代”，实际上已经变成“夹层贫民”：父家庭不够“穷”无法获得中共缓解阶级矛盾的财政补助，不够富无法进入精英通道，只能在系统性失望中自我瓦解。

万物崩解与他们的未来

当上述物质性与结构性的压力积聚至一定程度后，中产者原有的“身份幻觉”——即相信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彻底破产。这不仅引发经济上的焦虑，更引发他们**政治身份的破产、自我羞辱与彻底崩溃**。他们被告知是中产，却无权在中共官僚独大的政治体制中发声；被要求负担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却无法决定自身的命运；他们向下不敢认同工人，向上又无法靠拢资本；他们自以为理性，却在每日的房贷、加班、内卷中被迫接受制度化的愚弄。

由此而来的，是心理健康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据《2022 年中国城市心理健康调查》，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30 岁以下人群中近 36.5% 出现中重度焦虑与抑郁症状；其中大部分人处于年收入 6 万—15 万之间，即正是所谓“小资中产”的核心群体。这一数字说明，城市中间集团在物质维度的下沉，正迅速转化为精神维度的绝望。

思想的绝望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在 2017 年因贸易战等危机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变化的中国，以知识群体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的矛盾心态。他们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宣传系统中，内化了“国家带来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的服从叙事；但与此同时，又极度信奉“努力改变命运”的个人奋斗神话，对北上广深等超级城市中的“成功人士”报以艳羡。他们信任国家，但更信任商品房、股市和孩子的高考成绩；他们在政治上是体制的顺民，在文化上却是消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追逐者。这种服从型忠诚和精神分裂的矛盾结构，其最关键的基础是物质安全感与阶层上升预期的双重支撑。在中国“高增长 + 低福利”的体制模式下，小资产阶级靠自身积累而非社会保障生存：他们要为孩子的学区房、老人的医疗费、自己的养老金承担完全市场化的负担。这种制度安排迫使他们成为市场信仰的最忠诚拥护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通过所谓自由市场的选拔机制，他们才有生存和翻身的可能。

有赖于小资产阶级牵头下整个城市中产集团自我安慰的政治思想，中共政权长期依靠一套“发展合法性”的叙事机制维持对“城市中产”的控制。这套机制包括上文提到以及尚未描述的几种典型叙事：

- “稳定压倒一切”（将政治压制合理化）；
- “发展是硬道理”（将收入增长与牺牲自由挂钩）；
-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通过统计话语构建幸福幻觉）；
- “外部敌对势力介入”（将一切质疑导向外国敌意）；
- “奋斗改变命运”（将结构性不公个体化）。

然而，随着现实与政治宣传间的裂痕不断扩大，城市中产者中最先发生的变动就是盲目政治信任的断裂——大量原本沉默的市民中产对“国家叙事”产生极度疏离。以“润学”风潮为例，自 2020 年起，出国逃离中国成为中产群体热议话题。这一趋势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移民或教育投资，而是一种制度逃避倾向。从“润出中国”到“润出体制”，再到“润出话语圈”，他们集体性地放弃了对国家主导叙事的参与，转而投向以 Telegram、推特、豆瓣小组、知乎匿名答主、以及其他自媒体平台构成的“半地下公共言论圈”。这类“半地下公共言论圈”的兴起，正体现出中产集团在意识形态层面与官方叙事之间的全面断裂。他们既不再愿意将自己的诉求寄托于体制内的“改革空间”，也难以接受以往的中共宣传逻辑。他们在网络空间中构建“去中心化”的所谓“小共同体”，彼此交流伟大复兴理想的幻灭、交换生存技巧，构成了了一种颇具讽刺性和去政治化外壳、看似没有政治反对、实则构成物质基础上与中共需求格格不入的潮流。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疏离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逃逸”和“冷嘲热讽”，在内容上却深受冷战后全世界小资产阶级最为熟悉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主要为高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产者在转向“润圈”“匿名表达”“数据时代消极自保”的过程中，从未自动孕育出革命性意识，而是陷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困境：他们一方面否定国家话语，另一方面又无力摆脱对“全球资本理性”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政治幻想。换言之，他们批判的是“这个国家”，却并未质疑“那个世界”；他们逃离的是“体制”，却不质疑“市场”；他们拒绝

政治暴力，却热衷于自我施加的政治滤镜。这种看似“话语分裂”的结构，使他们在放弃中共的政治机器所主导的、那个他们无限熟悉的秩序的同时，并未走向阶级解放的方向，反而滑向更加精致化的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随着中国帝国主义争霸的白热化，互联网上出现了各色意识形态新潮流，有新法西斯主义、“国粉”、“哈耶克信徒”等等等等，这都是中间集团醉生梦死，以意识形态幻想逃离现实的方法——年轻的小资追求政治麻醉，上了年纪的小资追求满天神佛，于是，各类基督教会、佛教、道教堂口在2020年前后，由着疫情对中共基层组织破坏的推波助澜，重新长出了自己的嫩芽。

这正是帝国主义时代下夹缝中的中产者试图反抗的典型悖论：他们在中共与中国政府国家治理的压迫中感到窒息，于是逃往他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幻自由”；他们在国内中产阶层坍塌的现实中感到无力，却又试图通过移民、携款外逃等方式实现个人逃脱；他们对自身的政治话语权极度敏感，却不愿真正参与基层组织建设与阶级联结。这种结构性的政治怯懦，是新自由主义几十年来对城市中产阶层深度塑造的结果——他们失去了成为变革主体的方向感，只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缝隙中苟延残喘。

然而，这一局面的维持并非无懈可击。随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危机日益深化，全球财政紧缩带来的金融动荡、地缘冲突导致的技术割裂与信息孤岛，以及欧洲和美国社会自身“后福利化”带来的社会撕裂，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一切历史都再一次揭示：那个曾经被广大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视为“终极替代选项”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正在同样快速失去合法性与吸引力。当润学的终点变为美国唐人街里刷盘子的996，当互联网上醉生梦死的赛博梁山泊最终也不再提供庇护，他们将不得不直面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下，谁，都无处可逃。

对于想要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寻求一片未来的中间集团而言，这个问题不仅是生存问题，更是历史问题。一旦润无可润、逃无可逃，中国的中产们将第一次真正被迫在政治选择面前作出决定：**是退回个体主义堡垒，彻底原子化、去动员化，成为“失语的中产尸体”；还是转向基层、转向联盟、转向真正能够创造未来的工人阶级，成为可能的革命力量，共同手牵手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新明天。**这一节点的到来，绝不是意识形态自发演化的结果，而是由历史压迫、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现实矛盾共同倒逼的历史抉择。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者而言，中间阶层的政治游移、意识形态裂变与生存危机，既是一场结构性灾难的前奏，也是一扇难得的历史窗口。这是争取他们、塑造他们、组织他们的唯一机会——在他们被完全收编、彻底原子化之前，将其纳入到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中来。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正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在决断时刻终于下定决心和自己的阶级做切割、加入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孟什维克左派等小资产阶级力量的鼎力相助，俄国共产主义者们才能够在军队和各地政府中获得绝对的政治支持，进而成功将内战延后到布列斯特条约签署、获得喘息之机后方才爆发。随后，被无产阶级说服的大量俄国知识分子自愿加入革命，成为工人革命队伍的一员。在1949年中国革命，同样有大量对国府彻底灰心丧气的知识分子决心捍卫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历史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集团之所以长期动摇，根源并不在其“认知落后”，而在于他们缺乏真正可信的政治力量解决他们的思想困境、提出唯一可能的方案——中共以“发展合法性”和“政治封锁”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剥削与压迫，使许多本应站在工人阶级身旁的城市劳动者与个体经营者误以为“体制内求稳”与“市场上爬升”是仅有的出路。而今，随着这两条路径的全面崩溃，**他们的思维空间正走向无序，他们的经济身份正在向工人阶级靠拢——这是革命者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绝不能再等待，也不能再自我封闭。面对这一处

于临界状态的庞大中间群体，我们必须提出比自由主义更清晰、比思想解构更深刻、比制度幻想更切实的历史纲领与政治组织路线。过去十年，自由派用“制度改良”的话语包裹中产焦虑，掩盖了阶级剥削的本质。今天我们必须主动提出：**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制度压迫你劳动；不是体制失灵，而是资本剥夺了你的生活！**

失去希望的知识分子们，走向贫穷的劳动者们，丧失自己产业的小企业主们，请你们记住：

“你不是失败者，你是被系统性牺牲的一代；你绝非懦弱，而是这个制度正拒绝你每一次尝试的跳跃；你是伟大的，每一个受剥削压迫的人都是伟大的。”

“你曾经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拥有体面的生活；
你曾经努力工作、节衣缩食、送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你不曾偷，不曾抢，不曾贪污，不曾躺平，
可今天，你仍在市中心边缘的角落住着，背负债务，怕被裁员，怕孩子落榜，怕老人病倒——

你做错了吗？不，你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体制。
错的，是让你一个人承担一切代价的这场“发展的硬道理”。

你并不孤独——有千万工人也在忍受剥削，
有无数自由职业人在平台的技术算法下昼夜奔波，
有成千上万和你一样的“中产”，正在经历同样的沉默与崩溃。

今天，请不要再孤立地痛苦，不要再孤独地焦虑。
让我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并非“中产”，大家皆为无产。
不再为资本服务，不再为权力背锅。
我们不想再润，我们要留下来，建设属于我们的新世界。”

XII

人类社会是什么？

社会与个人

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抽象物，而是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说白了，社会不是一个装着人的“篮子”、一个承载人类沟通、交流的平台，而是**人类个体彼此间复杂联系构成的一张网络**。在这里，核心起作用的不是人个体本身的特点——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庸俗的观点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将“社会”与“个人”看作两个对立、不相容的概念，仿佛社会的就是脱离个人控制的，个人的就是不受社会影响的。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社会中不存在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所以，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写道：“甚至当我从事科学这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

他接着说，应当避免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因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人类社会中生活却又在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外的人不可能存在，即抽象的生物个性（即“不变的人性”）并不存在。一般不会有人把一个从出生就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人视为一个健全的、具有人性的人，因为这种脱离社会的人只会存在动物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不会是所谓“邪恶”或“善良”的，因为“邪恶”与“善良”也是相对于人的东西，“邪恶”与“善良”也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被理解。人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动物只有生理上的出生，而人类还有社会出生。人的出生不只是单纯的诞生了一个生物体，而是说明降生了一个带有**具体社会身份**的人。任何回避社会出生的企图以及单纯由机体生存的生物学前提演绎出的一切“人性”理论都是不可信的，并且注定要破产。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意识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是梦的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个观点：“人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个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再创造者。”当一个人思考矛盾时，这个人也处在具体的矛盾之中，其思维本身也不会超脱这些具体矛盾。

另外，现代已有充分科学研究表明，长期脱离社会互动会导致语言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退

化，印证了“人是社会性动物”的命题。神经科学领域的关键期假说指出，人类语言习得存在敏感期（0-12岁），若在此期间缺乏语言输入，大脑语言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典型案例是1970年美国发现的13岁“野孩子”Genie，她在隔离环境中仅能通过肢体动作沟通，尽管后期接受语言训练，仍无法掌握复杂语法和抽象词汇。现代脑成像技术进一步揭示，长期社会隔离者大脑的布若卡氏区（语言产出）和韦尼克区（语言理解）灰质密度显著降低，直接影响语言处理效率。



抽象思维的退化同样与社交剥夺密切相关。坚信“**人的实质由社会关系构成**”，拒绝从大脑深处解释高级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指出，抽象思维依赖社会互动中传递的“文化工具”，如语言符号和数学逻辑。隔离环境中的儿童在类比推理任务中表现明显落后于同龄人，尤其在理解隐喻和解决假设性问题时存在障碍。神经可塑性研究也显示，长期社交剥夺会削弱前额叶皮层功能，而该区域负责执行决策和抽象推理。不仅如此，还有研究发现，单独监禁超过一年的囚犯出现词汇量缩减、句子结构简单化，并难以理解“正义”“自由”等抽象概念。

生物学机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深层解释。镜像神经系统的研究表明，人类通过相应脑区的激活建立内部的行为表征从而“亲身经历”其观察到的他人行为来实现理解他人行为、意图、情绪等功能，以实现模仿、语言理解、社会交往等行为。这证明了我们在观察他人行为时进行的居身模仿使得我们能够较为自动化地理解他人行为的意图而不是通过概念性的推理，为自我 - 他人的联系提供了神经机制上的桥梁。当个体长期脱离社会，人的社交认知能力必然萎缩。产生这些结果的生物学原因是：社会隔离会降低催产素（催产素能促进个体社会化，而个体在社会化过程顺利时能刺激催产素分泌，两者为正向回馈关系。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如长期挫折，将对催产素的形成造成不良影响，进而损害个人社会化能力）和多巴胺分泌，引发认知功能衰退。

这些证据共同表明，**社会互动不仅是认知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维持人类思维复杂性的根本保障。**

有机互动而并非机械决定论

所以人类就如同一个机械、一面镜子一样，单纯是社会环境在白纸上的剪影吗？社会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历史因素就可以洗脱个人主观因素导致的罪行与错误，因为这贬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只是强调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脱离客观历史的限制，历史只是奠定了基调与大环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被环境塑造，这种双向运动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实践唯物主义一向反对将复杂的社会运动简化为单一物质要素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例如，机械唯物主义将历史进程等同于齿轮传动式的物理因果链，认为社会变革仅由技术工具或地理环境直接触发，例如认定“蒸汽机发明自动催生资本主义”而忽略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环节。

这种思维方式剥离了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转化（正如种子发芽既依赖基因也需光照、土壤的多维作用），如同将人体代谢仅还原为细胞分裂而漠视神经、循环系统的整体协同。机械唯物主义将多维动态系统降维至线性决定模型，既无法解释文艺复兴为何未在更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发生，也难以剖析现代算法垄断背后技术、权力、文化的交织逻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形而上学框架，它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同时，以矛盾分析法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具体性。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个观点：“人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个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再创造者。”因为当一个人思考矛盾时，这个人也处在具体的矛盾之中，其思维本身也不会超脱这些具体矛盾。马克思主义既承认社会经济条件对个人意识的根本制约，也肯定人通过阶级斗争、技术革新等方式重构社会关系的能力。

社会的复杂性和物质性

同时，我们也不能片面只从人文和历史的角理解“社会”，将其塑造为一种人类高于世间一切的伟大创造。**社会同自然界不分割，人类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通过劳动和繁殖来生产和再生产，所以**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把社会看作独立存在的现象，并忽视它和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社会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一切根本性发展和背景都离不开对自然界的深入理解和改造，不是伟人的思想和灵感决定了社会的形态，而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决定不同社会类型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看作一种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的通过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同时创造和改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历史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不断改变的社会分工，这构成社会生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进步也有相对应的退步**）所谓“生产力”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统称**，“生产资料”则是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工具（生产手段）和原料（生产对象）**，而原料从自然界而来或是自

自然界本身。人类生产的产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必要产品**，顾名思义，这是保证人们能正常生活的最低限度产品；第二类是**社会剩余产品**，这些产品可以作为养活不直接参与农业劳动的人的生活资料，也可以作为扩大生产规模的原料。所谓“生产方式”是生产资料的谋取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称**，而“生产关系”是在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的不同在于**生产剩余产品**和**占有并分配产品**的方式不同，而后者得依靠所有制来确定。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方式（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但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所谓“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称）、政法制度（指规范政治法律关系的制度体系，包括宪法制度、司法制度、诉讼制度等）和政法设施（指国家强制机关及其物质附属物，如军队、警局、法庭、监狱等实体机构）的统称。

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如下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但是，**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恩格斯又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说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懒惰的人妄图将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动力总结在一个万能公式里，这种徒劳的尝试就像追求“还原论”的科学家们一样：追寻那“世间万物最小的构成单位”来从底往上解释整个世界的现象，先是找到原子，然后找到质子和电子，最后追到夸克——微观粒子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每走一步都理自己的目标更远。很可惜世界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复杂性不仅贯穿自然现象，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律中。**

论历史创造的主体

社会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特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阶级结构体系，而历史则是**社会形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更替发展的客观进程**。在认识什么是社会后，我们也得了解历史创造的主体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表示：自然界与劳动群众的共同实践构成历史创造的主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那样“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没有自然提供的物质基础，人类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而没有劳动群众日复一日的生产实践，任何社会形态都将停止运转。这种人与自然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过程，正是历史得以绵延发展的根本动力。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具体的个人活动？我们必须警惕两种错误倾向：**1. 将历史伟人神化为超越社会条件的创造者；2. 将普通群众贬低为被动承受历史洪流的原子。**普列汉诺夫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对此作出了精辟论述：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个人的特性给了伟大的历史事变以个别的特征，而是因为他赋有那种特性使他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至于这些需求之所以发生，乃是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的结果。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称伟人为开始者。这是一个很适当的称呼。一个伟人恰好是一个开始者，因为他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以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倡议去满足这些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但他不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够停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过程；他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动乃是那不可避免的与无意识的过程之自觉的与



自由的表现。这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是他的整个力量之所在。但这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普列汉诺夫这儿给伟人或英雄所下的定义，解释了像拿破仑第三那样的貌似伟大而其实渺小的历史人物。因为，真伟人与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觉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的人，那么另一些人，他们自觉地满足旧的社会要求，他们努力替某一时代中成为反动的社会要求服务，只由于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将这样人物暂时捧到了社会之巅，捧成为英雄伟人。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汉诺夫的定义，当然是既非英雄，亦不伟大。

劳动群众作为自然力与社会力的统一体，其历史创造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通过物质生产将自然界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社会财富**，正如古代农民将荒野开垦为良田，现代工人将矿石提炼为半导体材料；**其次，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突破自然给予的界限**，从驯化动植物到开发核聚变，持续拓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边界；**最后，他们也以集体实践塑造着新的社会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强调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在此展现出更深层的辩证意蕴——不仅指人类物种的起源，更指向**每个历史阶段人类本质力量的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书写的主导权固然常被胜利者所掌握，但**胜利者之所以成为胜利者，根本上是由客观物质实践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那些最终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或集团，本质上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这种矛盾运动的载体正是亿万劳动群众与自然界的持续互动：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建立在尼罗河泛滥形成的肥沃冲积平原之上，英国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轰鸣离不开煤矿工人在地下的艰辛劳作，当代信息技术的突破也依托于稀土矿工和芯片制造工人的集体智慧。每个所谓“历史转折点”的背后，都堆积着无数普通劳动者与自然物质交换的痕迹。

那么，人类是不是始终需要“英雄”，甚至必须要建立“个人崇拜”制度呢？个人崇拜据说是人类的天性。这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震慑于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后又困惑于社会的诸般灾难。以个体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渺小了，因此他不得不处处感到畏惧，时时觉得恐怖，这种畏惧和恐怖，从来驱使他去寻求一种保护，向天，向神，向帝王，向领袖，去寻找一种免于威胁的安全。他们从那些地方去寻求并获得了虚幻的或真实的保护与安全，这就发生了崇拜。这可以说是人类崇拜这个“天性”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根源。这也就是说，人的崇拜主要乃起于恐惧。当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时时会看到钦佩、爱慕、敬仰等等高贵感情，构成了相互间崇拜的基础和原因。这不用说也是事实。光是令人畏惧，绝不能赢取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单凭心悦诚服的爱慕，却同样不可能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结合，固然由于诸种因素，但最主要与最基本的，却终究是“利”而非“义”。只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巩固与长远的感情关系，共同利益决定了共同的情谊。因此，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思想家方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敬爱，所崇拜，但他们自身不可能因此成为群众的领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对内具有强制力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就不同了，他们可能具有令人敬爱的品德，但他们却并非因此才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崇拜，主要乃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群众的利益，他们有能力保护这部分群众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最后一种情形乃是领袖崇拜制度最坚固与最现实的基础）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劳动实践的本质就会发现，**真正的历史创造性从来不只是个人天赋的产物**。当瓦特改良蒸汽机时，他继承的是纽科门蒸汽机的技术积累；当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时，他运用的是数千年的农业劳动的实践经验。可见，**就算是最天才的创造，也不过是自然物质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转化形式**。最终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不是个别发明家，而是使用劳动工具并利用自然条件以实现发明家的想法的广大劳动者们。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被指责为暴君口吻，但若我们从事情的本质看，这个“顺昌逆亡”的抉择，却是任何一种统治、任何一个领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当然，领袖不是悬空存在，更不是受命于天的，他首先得“顺”着群众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兴起，不过兴起之后，特别是当他已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势力的象征之后，事情便表现为群众对他的“顺昌逆亡”了。由于群众的趋昌避亡，便产生了自动的或被逼的领袖崇拜。可见领袖崇拜决不能从人的天性中寻找原因，这个问题是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具体关系中的。这种崇拜制度的形成，本质上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力量对比的客观状态。即便“胜利者”通过掌握话语权来塑造历史叙事，但这种叙事权的获得本身恰恰是物质力量较量的结果——**正如军事上的胜利往往源于经济基础的优势，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必然建立在相应的物质实践基础之上。**当我们以唯物史观审视历史时，这个命题就显现出新的维度：“顺昌逆亡”的选择权本质上属于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黄河泛滥时，顺河道疏浚规律者昌；工业革命中，顺热力学定律改良机械者昌；信息时代，顺半导体物理特性创新工艺者昌。所谓“历史创造者”，**不过是那些最先把握住自然规律与社会需求结合点的劳动集体。**

一般说，社会的阶级冲突越缓和，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则领袖的地位越低，它越不会高超于社会之上，群众对领袖的崇拜越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个人崇拜的制度。在这方面，古希腊伟大的传记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极有意思的话，他说：“强大的民族对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负义。”这句话如果我们用浅显明白的话来翻译一下，那是说：人民对于其领袖的崇拜，是和他们的自觉和自为程度成反比例的。丘吉尔于领导了英国赢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让自己的人民一脚踢下了台，于是在其回忆录中感慨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腊人的名言。这个现象恰恰印证了这个观点：当物质生产发展到能够支撑更广泛的社会自治时，个人在历史中的神话色彩就会自然消退。胜利者的历史书写权，终究要服从于客观物质实践塑造的社会认知水平。**那些试图超越物质基础强行维持个人崇拜的统治者，终将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面前暴露出其历史暂时性。**

接受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共产主义者才有可能对社会现象做出正确的分析。

XIII

科学思想与意识形态

为什么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有位同志抱有进步、革命的思想，深刻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和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性，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我于是很是纳闷，明明是唯物主义的逻辑，吸收了辩证法的思想，也站在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立场上，是什么原因导致还要在名义上拒绝“共产主义”的称号呢？这位同志解释说：因为他不会认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自己不是狂热的信徒，只追求正确的分析方法和思想，而不愿意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教条中。我深感高兴，因为这表明了这位同志不是要把自己搞成怀疑论者或者喜欢思想的不连贯性或缺乏体系，他只是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就不是他所反感的那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启蒙学者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796年提出，原指“观念的科学”，他试图建立基于感觉经验的社会认识论。后来拿破仑随即以“意识形态家”贬斥空想理论家，使该词获得脱离现实的政治意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继承并转化了这个概念，指出当观念体系与物质实践分离并声称独立时，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种虚假不是认识论层面的谬误，而是存在论层面的颠倒：意识形态用观念解释观念的历史，将特定阶级利益表述为普遍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绝非中性描述，而是特指那些将历史性社会关系永恒化的观念体系，是“虚假意识”，其称谓本身已包含价值判断。**

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产生的物质根源在于统治阶级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物质生产，还通过教育、媒体、法律等机构掌控精神生产工具，使本阶级思想获得“普遍性形式”。可见，所谓“精神生产资料”，应断句断为“精神生产+资料”，而我们常说的“生产资料”是**物质生产**资料。《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但意识形态通过抽象化过程掩盖这种关联，例如将封建义务包装为“神圣责任”，或将资本增殖美化为“财富创造”。这种观念生产机制在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发展为文化霸权理论：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精神生产资料，将阶级统治转化为被统治者“自愿认同”的文化规范，使剥削关系隐没在“自古以来”“人性使然”等自然化叙事中。

马克思主义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当劳动者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塑造的“常识”（即**个人通过日常经验积累的零散认知，其逻辑基础是直接经验归纳而非系统性反思，简单来说就是对重复性现象的非系统化认知，如“钻木取火”**）束缚时，会将私有制、雇佣劳动等历史现象视为永恒秩序。马克思指出，必须通过革命实践

夺取精神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使工人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这不是用新意识形态替代旧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揭露所有意识形态的历史暂时性，建立与社会存在相统一的科学认识。葛兰西则进而提出“阵地战”策略，强调要在学校、工会等精神生产场所展开斗争，将分散的日常经验升华为对资本主义整体结构的批判认知。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精神生产关系的革命，它不仅要解构意识形态的虚假普遍性，更要重建劳动者掌控自身的精神生产的物质基础。

什么是“意识形态”？

我们需要讨论下意识形态的来源和本质。人类历史的起点是物质生产实践。原始社会中，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互动，形成基于直接经验的**常识**，这些常识既是生存工具，也隐含对未知力量的想象投射（如将雷电解释为神怒）。随着分工发展与阶级分化，社会矛盾逐渐无法通过直接经验解释，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即通过观念体系对社会关系进行合理化或遮蔽的思想形式）开始从常识中分化并系统化。例如，奴隶制城邦将“人分等级”的常识升华为“神定秩序”的宗教信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包含以下内容：哲学、部分社会科学、政治法律思想、宗教、道德、艺术。而形式科学（如数学、逻辑学、理论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另一部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非意识形态（即科学）**。马克思主义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掩盖着事物的实质的“颠倒”，其根源在于**现实本身的颠倒**。例如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上帝创造人是一种颠倒。意识形态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矛盾和苦难。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宗教的颠倒使现实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补偿（可见，**宗教是人民精神上的止痛药**），为了弥补现实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现实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种严谨的解决办法。这种补偿机制并非纯粹被动，因为被压迫群体可能通过重新解释宗教传统（如早期基督教平等观）形成反抗性文化资源，但总体仍受统治阶级的“收编”。人由于受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限制，只要他们不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上述的矛盾，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些矛盾反射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上，也就是说，采取纯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决办法，而这些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掩盖和曲解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歪曲，通过掩盖矛盾的办法来**为矛盾的再生产效力**，因而也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中，常识作为其最隐蔽的载体发挥着特殊作用。常识具有双重结构：其表层是劳动者从实践中提取的可行经验（如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底层则被意识形态预设渗透（如忽视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分配的决定作用）。葛兰西强调，必须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引导常识中的经验要素与科学批判结合，将其转化为揭露矛盾的“健全常识”。常识并非完全独立于意识形态的精神领域，而是意识形态矛盾性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具体化。当劳动者认同“勤劳致富”的常识时，**既包含着对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客观事实的经验感知（非意识形态要素），也隐含着将阶级关系永恒化的意识形态预设**——即忽视生产资料占有差异对财富分配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双重性使得常识既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实践可行性（如指导具体生产活动），又能通过将意识形态命题伪装成“不言自明”的真理来巩固统治关系。常识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在于其命题的虚假性，而在于其通过经验直观性中断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正如“太阳东升西落”的常识并不错误，但若停留于此便遮蔽了地球自转的实质。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发现通过实践反复验证后，其结论也可以脱离具体理论语境沉淀为普遍认知（即成为常识），但是这可能会导致其实际内涵的消失。如相对论质能方程（ $E=mc^2$ ）

包含的时空观革命被简化为“能量守恒”的常识命题，但其革命性内涵却趋于隐没。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常识的简化过程必须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化的知识传播相结合，否则可能退化为新的教条（如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科学常识与意识形态常识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虽经简化仍保留实践检验的客观内核（能量转换常识可通过核反应堆实证）**，后者则通过对经验材料的片面截取构建虚假普遍性。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源于对“本质”的把握方式。科学以**动态性、历史性和实践性**为根基，其真理性通过物质活动的持续验证而生成。例如，恩格斯指出牛顿力学“在实践界限内是真理”（《自然辩证法》），但当微观与高速运动现象突破原有实践范围时，其理论框架必然被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扬弃。这种认知演进表明，科学本质是“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辩证运动，而这一过程需要劳动者通过生产实践与理论批判的互动来实现，正如列宁强调“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青年团的任务》）。这种认知演进表明，科学本质是“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辩证运动。相反，**意识形态试图以静态逻辑体系消解矛盾**，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将“等价交换”凝固为永恒法则，却遮蔽了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结构性对立（《资本论》第1卷）。两者的区别在于：科学通过实践中介使认识与对象形成历史性统一，如门捷列夫周期表起初仅是对已知元素的经验归纳，但通过镓、锗等新元素的实验发现，其理论从经验规律上升为揭示原子本质的化学基础（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0页），而意识形态则将特定历史阶段的认知抽象为超验真理。马克思主义揭示，科学的实践性使其必然突破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外壳——正如达尔文进化论打破“神创论”的永恒叙事，但其理论本身又需在遗传学发展中接受新的实践检验，这种**永不完结的自我否定过程**，正是科学作为“现实本质的展开形式”的存在论特征。

所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绝非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像在庸俗的电子游戏（点名《钢铁雄心4》）里一样同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是“人类各种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选择”，而是一种非静止的、真理性通过物质活动的持续验证而生成的科学思想。这和意识形态先入为主去用形而上学的体系解释人类社会是两种相反的方向。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不会立即消亡，反而会呈现特殊形态：一方面，工人政党需要运用科学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永恒化谎言（如揭穿“市场万能论”的历史暂时性），同时领导工人国家不断拆除这些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商品生产、阶级、传统家庭等；另一方面，过渡时期仍存在脑体分工等旧社会痕迹，这可能导致新型意识形态的产生——例如将特定阶段的计划管理模式绝对化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此时必须通过群众性文化斗争（如**在不破坏统一的国家计划和政治方向下的工人控制和工人自**

治实践）打破新的形而上学倾向（参见葛兰西《关于南方问题的笔记》）。只有当物质生产突破稀缺性桎梏、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彻底瓦解时，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的再生产机制才会消失，此时人类将首次建立起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统一的认知体系。

可见，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现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为它牵涉到对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为**它并不包含所有的错误和歪曲**。意识形态观念和非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为谬误和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因为意识形态是“不完整的真理”，它们本身也以一种方式反映着一部分现实。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即便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也必须部分吸收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经验常识和主观诉求**，否则无法建立有效文化霸权。正如辩证法并不否定形式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一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仅在历史的、具体的范围内才存在**。另外，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靠着吸收意识形态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并将其与实践与实践经验结合才发展起来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科学**），这恰恰证明意识形态的一些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合理性。**只通过批评无法彻底解决意识形态的歪曲，意识形态只能随着产生它们的矛盾的实际解决而最终消失**。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压迫”，因为它**不是直接的暴力**。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经济关系，它意味着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而非抽象的“压迫”关系。要进行剥削，前提是劳动者可以生产出社会剩余产品，否则你的压迫再怎么深重，也无法剥削其他人。**暴力本身不会生产物质，且暴力也得依靠物质才能存在**。虽然剥削建立在强制之上，但是剥削阶级需要劳动者因为害怕或是麻木而“自己动起来”，而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任务。这是因为，剥削和压迫的维持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将剥削和压迫说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或是“常识”（如将地租表述为“土地收益的自然分配”），使被剥削者误认现存秩序符合自身利益。

这种“自我驱动”一方面体现为劳动者通过经验验证某些意识形态命题（如“按时播种才能收获”），这种验证的局部真理性强化了对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的信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通过常识的重复性将历史性范畴自然化，例如将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转化为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则。这种自然化过程的微观机制在于：每个市场交易者都在具体交换中确认“等价原则”的有效性，却无法直观感知整个资本循环中价值转移的结构性失衡——这正是葛兰西所说的“常识的碎片化认知对整体性批判的阻断”（《狱中札记》）。另外，这种自然化过程不是通过理论灌输完成，而是经由无数日常实践中的微观确认实现的——正如市场交易中每次等价交换的成功经验，都在强化对交换关系非历史性的信仰。

语言与意识形态

语言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直接产物，本质上是以符号系统为载体的社会实践形式。**它既不是先验的思维框架，也不是中立的交流工具，而是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种物质性体现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确立，始终依赖于特定生产方式下的交往实践。原始狩猎部落对“火”的命名源于生存的直接经验，而现代金融术语“衍生品”的产生则根植于资本全球化的抽象化进程。语言系统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介质，其特殊性在于它既承载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如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方位词体系），又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阶级关系的烙印（如封建等

级制下的称谓系统)。

意识形态对语言表达的支配作用，首先表现为词汇意义的历史性重构。当希腊城邦将奴隶制生产关系神圣化为“自然秩序”时，“自由”(eleutheria)一词被剥离了其在荷马史诗中“摆脱战争威胁”的本义，转而特指城邦公民对奴隶的支配权。这种语义转换并非偶然的语言演化，而是意识形态通过截取经验片段构建虚假普遍性的典型案例。现代资产阶级语言体系更发展出高度精巧的遮蔽机制：在经济学话语中，“劳动”被抽象为生产要素清单中的中性条目，其背后活生生的剥削关系被抹除；“失业”作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必然产物，被修辞转化为个体能力欠缺的证明。这种语言暴力不是通过强制推行实现的，而是经由日常交往的微观实践完成的——每个求职者在简历中自我商品化的书写行为，都在无意识中强化着劳动力市场的意识形态预设。

某些哲学家将语言神秘化为独立王国，这种倾向在现代的分析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中达到顶峰。维特根斯坦早期将语言视为世界图式的逻辑对应物，后期虽转向“语言游戏”说，却仍将意义生成封闭在话语共同体内部；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将能指链的滑动绝对化，使文本陷入自我指涉的无限循环。这些理论把语言从社会实践的土壤中连根拔起，使哲学话语沦为脱离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当海德格尔宣称“语言是存在之家”时，他故意忽视了德语中“劳动”(Arbeit)一词在纳粹意识形态中被赋予的种族主义内涵。这种“为抽象而抽象”的语言观，实质上是将哲学家的思维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里——他们越是沉迷于概念游戏的精巧构造，就越成为现存秩序的无意识辩护者。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哲学语言回归日常用法，而这就必须重建语言与实践的血肉联系。葛兰西倡导的“有机知识分子”，其历史使命正在于将工人阶级的日常语言升华为批判性武器。**语言斗争的关键不在于创造新术语，而在于对既有词汇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例如当代中国农民工创造的“打工人”话语，既包含着对异化劳动的苦涩自嘲，也潜藏着阶级意识觉醒的可能契机。关键在于通过系统的文化斗争，将这些碎片化的抵抗性话语升华为新的意义体系：当“996工作制”不再被表述为“奋斗精神”，而是揭露为“劳动力透支机制”时，他们正在意识上撕碎“利润分享”的意识形态面纱。这种语言实践的辩证法体现在：一方面必须突破资产阶级语言的概念牢笼，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与群众经验常识的对话通道。

今天的数字媒介为语言斗争提供了新战场，例如短视频平台上工人博主用方言讲述流水线生活，这种“去专业化”的表达方式正在解构资产阶级的“精英话语”霸权。但技术中介的进步性具有历史局限性，**若脱离物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网络空间的言语反抗最终会被资本收编为“流量经济”的养分。**因此，语言实践必须与车间民主、经济民主的政治斗争相结合，使话语权的夺取获得坚实的制度支撑，例如苏俄政权初期推行的工人通讯员运动，通过让普通劳动者掌握新闻写作技能，才真正打破了知识分子对话语生产的垄断。

当英国宪章派工人用“奴隶”(slave)自称时，他们不是在强化压迫性身份，而是通过语言的反转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这种语言策略的颠覆性力量，源于它将意识形态编织的意义之网戳出了破口。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语言形态，既不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简单否定，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全新创造，而是在扬弃现存语言体系的过程中，将那些被遮蔽的、被扭曲的实践经验重新照亮。就像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工人阶级也要从资产阶级语言中抢救出被异化的交往理性，让语言重新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纽带而非阶级统治的工具。**

这个工作，只能由科学的思想去指导完成。

XIV

马克思主义还是身份政治

“你支持女性主义吗？”

“我不。我是共产主义者，不是女性主义者。”

“啊！国男、吊子、劳保，你支持父权制，你压迫女性！”

“.....”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长久以来在性别问题上因为拒绝加入身份政治的行列遭受这种谩骂。这还不只是性别议题，在民族、种族等等领域，小资产阶级运动家们用道德和自己的“身份”逼迫严肃的革命者在他们的领域里“听从他们的计划，遵守他们的规矩”。他们的世界观是无理的两极，自己这边代表着进步与解放，而其他任何人都是压迫者和反动派。

实际上身份政治对于中国群众的影响严重吗？不严重，而且遭人唾弃。但是在共产主义者自己的队伍里，却因为这种异阶级的压力创造了无数困惑。要不是半懂不懂应和着身份政治的口号，认为“既然都是进步那应该没啥大问题”，要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接受自己的保守心理去正当化压迫，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反对身份政治。我们有必要从理论根基和实践行动上彻底批判身份政治，并解释共产主义的立场。

家庭、性别、性取向

21 世纪生物学研究显示，**性别差异存在部分生物学基础**。神经影像学证实，男女大脑在胼胝体厚度（女性平均厚 10%）、杏仁核连接方式上存在统计学差异。内分泌学研究证明，胎儿期睾酮暴露水平影响空间认知能力发展，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共情能力呈正相关。表观遗传学更发现，社会环境压力可通过 DNA 甲基化影响性别相关基因表达。但需注意三个关键点：**（1）这些差异呈现重叠分布而非二元对立；（2）个体内差异远大于性别间差异；（3）神经可塑性使大脑结构随经验持续改变**。以数学能力为例，PISA 测试显示性别差距与性别平等指数呈负相关，如在挪威等国家，女生数学成绩反超男生 3.5%；2023 年《自然》研究显示，接受 6 个月导航训练的男女海马体体积增长无显著差异。这些都印证了生物学基础与社会实践的交互性，生理差异如同未雕刻的大理石，社会文化则是塑造雕像的刻刀。

在人类早期社会中，两性关系以互补协作为核心特征。旧石器时代的采集 - 狩猎经济中，女性通过采集植物和照顾后代贡献约 60%-70% 的群体食物来源，男性狩猎则提供蛋白质补充，这种基于生理差异的自然分工并未形成等级压迫，反而构成了生存必需的合作关系。考古证据显示，距今 3 万年的欧洲格拉维特文化遗址中，女性墓葬随葬狩猎工具的比例达 30%，表明性别角色具有流动性。这种平等性源于低水平生产力下的生存逻辑——群体存续依赖全体成员的劳动参与，个人脱离集体即面临死亡威胁，权力集中既无必要也无物质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成为转折点。野生作物驯化需要持续的土地开垦，男性因肌肉强度优势逐渐主导耕作，而女性因生育周期被束缚于家庭领域。西亚加泰土丘遗址的谷物加工区集中分布在家户内部，暗示女性劳动被私有化。更重要的是，剩余产品积累催生了私有财产观念。当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出现玉礼器垄断性随葬时，男性墓主占比达 85%，显示物质财富开始通过父系传承。牲畜饲养的普及进一步强化此趋势——非洲富拉尼人的研究表明，控制牛群的男性通过“牲畜借贷”构建债务网络，将经济权力转化为社会支配力。

制度性压迫最终通过战争与宗教完成体系化。苏美尔城邦为争夺灌溉水源频繁发动战争，职业军队的出现使男性垄断暴力机关，乌鲁克神庙壁画中女神逐渐被持剑男神取代便是象征。印度《摩奴法典》将女性定义为“需终生受监护者”，中国商代甲骨文记载的人祭中女性占比超 70%，皆表明父权制通过法律与仪式完成意识形态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具有区域性差异：北欧维京人长期保留女性财产继承权，而西非约鲁巴文化中女性直到 19 世纪仍掌控市场贸易网络，证明**性别压迫并非历史必然，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这不是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宣传的“男性坏、野蛮”造成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客观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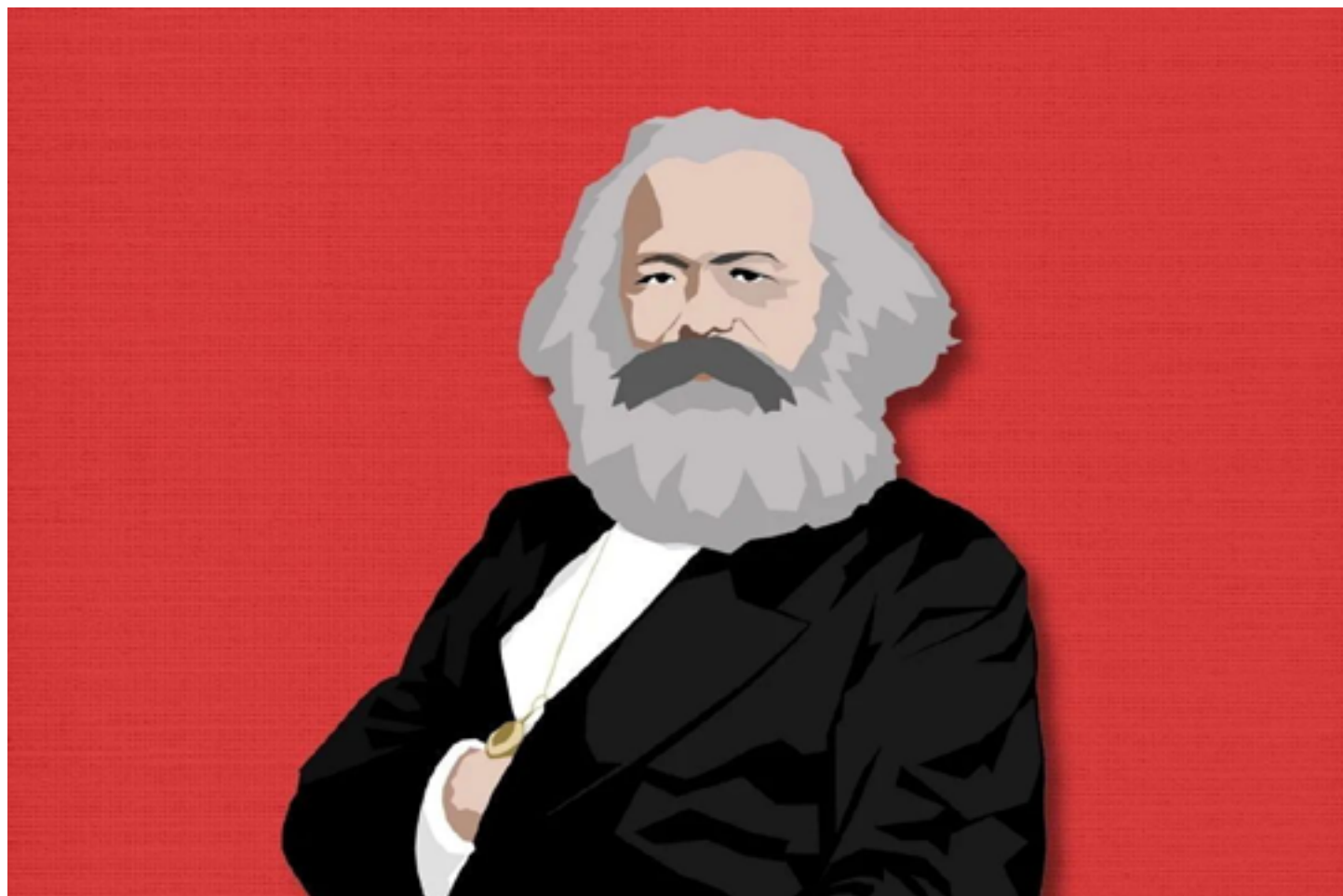
现代机器的轰鸣最终暴露了性别分工的荒谬本质。**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使纺织业从家庭作坊走向工厂，打字机的发明让文书工作不再依赖男性握力。当化纤面料取代手工纺织，当试管婴儿技术突破生育束缚，传统性别分工的物质基础早已崩塌。**但父权制的幽灵仍在通过文化惯性延续生命：硅谷算法工程师中女性占比不足 20%，并非因为神经网络需要雄性激素驱动，而是女孩在 12 岁时就开始接收“数学不适合女生”的心理暗示。这种文化塑造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 2018 年 MIT 实验显示，女性在匿名编程测试中的代码质量评分会突然提升 46%。

马克思主义认为，**组成传统家庭的婚姻在阶级社会中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它主要基于财产私有制与继承权的维护，而不是基于爱情，因此传统家庭中的性行为往往被异化为服务于财产关系再生产的目的。**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单元，家庭在古代社会承担着直接的物质生产与人的再生产双重职能，其结构（父权制）通过土地依附、人身隶属等方式巩固等级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转型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隐秘工厂”，通过无偿家务劳动将工人子女培育为合格劳动力，将工人配偶转化为照护者，使资本得以用最低工资获取完整劳动力体系。可见，家庭一直依托内部权威结构（父权 / 夫权）塑造服从意识，为阶级统治提供文化基础。

在阶级社会条件下，古代宗教（基督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通过其道德规范将这些关系神圣化，并且将性行为严格限制在生殖目的范畴内。（堕胎也因此被视为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破坏）宗教道德体系将非生殖目的的性行为视为违背自然秩序。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手淫、口交、肛交、同性恋、跨物种性行为等非生殖性行为都被纳入道德谴责范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摧毁封建生产关系，封建宗法制的家庭结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关系日益显现出契约化特征。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世俗化的理性原则出发，否认宗教机构对道德价值的垄断解释权。他们反对“唯有生殖目的能使性行为合法化”的观点，主张：**婚姻契约应当基于个体情感，并且允许婚姻契约因情感消亡而解除。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本**

身通过继承法、劳动力再生产机制等使得这些理念存在内在矛盾。在意识形态再生产层面，传统家庭的权威结构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仍具有功能价值。通过家庭教育塑造的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对雇主的服从提供了文化预设。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始终试图将个体的利益认知局限于家庭单位，从而掩盖工作场所和阶级关系的实质矛盾。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传统家庭的无条件维护和对非生殖目的性行为的道德压制都是维护阶级统治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家庭作为私有制载体的性质，**主张消灭基于财产关系的婚姻制度，支持基于平等个体自由结合的新型社会关系、捍卫妇女对身体自主的掌控权，同时拒绝将性行为价值局限于生殖功能**（涉及权力不对等或侵害他者权益的行为除外）。其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废除私有制消除家庭的经济纽带，将家务劳动与儿童养育社会化，以公共保障替代家庭财产功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全民福利体系中构建基于自由联合的平等关系，使情感纽带脱离物质依附。

此外，传统家庭的存在也带来了 LGBTQ+ 群体的压迫和歧视。然而，LGBTQ+ 群体的存在是自然且多元化的现象，其生物学基础与社会影响均表明，性少数群体本身与精神疾病无必然关联。国际权威医学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 1990 年将 LGBTQ+ 从精神疾病分类中移除，强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本身并非病理现象。美国心理学会（APA）等机构明确指出，LGBTQ+ 群体的高抑郁、焦虑风险源于社会歧视而非性向本身，多项研究证实其心理健康问题与家庭排斥、政治攻击等外部压力直接相关。全球医学界共识认为，将 LGBTQ+ 污名化为“精神疾病”缺乏科学依据且危害极大，需通过反歧视政策与包容性支持消除偏见。



研究发现，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涉及复杂的遗传机制，例如双性恋行为相关的基因位点被发现可能通过促进冒险行为间接提升繁殖优势，解释了其在进化中的持续性。此外，全基因组关

联研究 (GWAS) 已识别多个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位点，表明性取向具有高度多基因性。尽管早期“同性恋基因”假说存在争议，但**科学界普遍认同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塑造性取向，而非单一决定论**。双性人等性别多元现象进一步证明，性别在生理层面并非严格的二元划分，而是一个包含染色体、激素与解剖结构的连续光谱。此外，研究表明，**性少数群体抑郁率显著高于顺性别者，而根源在于系统性歧视与暴力**。例如，美国癌症协会报告指出，恐同症导致 LGBTQ+ 人群回避医疗护理、加剧吸烟等高风险行为，从而间接提高癌症患病率；瑞典研究显示，双性恋女性遭受性暴力的风险是异性恋男性的 49 倍。此类社会暴力与“转化治疗”等制度性压迫直接相关，加州等地区已立法禁止此类心理虐待。因此，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与反歧视法律，而非质疑性少数群体的正常性，才是促进全民健康的关键。

关于家务劳动，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以下见解：家务劳动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方式，它始终受主导的生产方式的支配（在资本主义下，家庭主妇的生活资料是通过自己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或是其配偶的工资获得的）。家务劳动的产品（即劳动力的生产）是不为销售而生产的，所以它的劳动过程不受价值规律作用的支配，即不受竞争的支配。没有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没有劳动借以获得抽象劳动特征的手段，而只有抽象劳动才构成价值的实质。劳动力不同于一切其它商品，它不是由任何劳动过程生产出来的，它是活的人类的一种属性，而活的人类是靠自己消费使用价值来维持生存的（但不是靠消费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其中有些使用价值就是由家务劳动提供的。另外，人们完全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大部分家务劳动的替代劳动。如果在家中烤面包的家庭主妇生产劳动力，那末为出卖而生产面包的面包师为什么没有生产劳动力？如果我们把这一逻辑延伸一下，那末劳动力就会成为许多实业的产物了，劳动力的生产当然也就不是家务劳动特有的性质了。所以，家务劳动不生产价值，它当然也就不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务劳动不能生产剩余产品，或不能以某种方式获得不是价值的另一种剩余产品。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一种家务劳动所持有的剩余产品获得的方式，那末家务劳动才能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只取决于其科技水平或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在于对弱势群体的态度。**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以“自由”“人权”为旗号，但其内在逻辑却将人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女性、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系统性压迫的受害者**。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达到历史高峰，平均每 15 分钟就有一名女性遭遇性暴力，而司法体系对此的纵容暴露出资本主义法律维护的并非普遍人权，而是阶级特权。墨西哥、阿根廷等地的贫民窟中，儿童被毒品集团控制，成为犯罪链条的牺牲品；美国威斯康星州甚至通过法案允许 14 岁童工工作至深夜，将劳动力短缺的代价转嫁到未成年人身上，这种“合法剥削”撕碎了资本主义“文明灯塔”的伪装。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必然导致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儿童在资本眼中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19 世纪英国工厂中童工占比高达 46%，矿场甚至雇佣 4 岁幼童，而今天的美国童工法案不过是这一逻辑的延续。老人和残疾人则因丧失“生产效率”被边缘化，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本质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成本，而非真正保障人的尊严。

但压迫越深重，反抗越激烈。全球数百万女性发起“反对性别暴力”运动，拉丁美洲的“绿色浪潮”争取生育自主权，印度农民抗议中妇女成为先锋队，这些斗争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争取，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因为劳动的解放本身就包含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群体的解放**。对于儿童，马克思主义主张由国家承担养育责任，提供免费教育和全面保障，终结“童工”这一文明污点；对于老人和残疾人，则通过社会化养老和无障碍改造，使其享有平等的发展权。觉醒的女性走上街头，童工法案遭遇抗议，残疾人工会争取权益——这些斗争本身就在缔造新世界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不

留余力地支持这些运动的。

而中国现在身份政治的捍卫者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不仅缺乏群众性，对群众嗤之以鼻清高地觉得自己掌握了一切真理，而且组织上零零散散，不过是一群互联网发泄情绪的孩子。身份政治从来没有代表这些进步的运动，而是打着这么一个旗号妄图去分裂运动的小撮精神失常者。

种族、民族、宗教

至于种族和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有以下见解：传统“人类种族”概念将人类划分为若干基于外貌特征的群体，但现代生物学研究已彻底否定了这一分类的合理性。从基因层面看，**人类群体内部的遗传连续性远超离散性，根本不存在符合生物学定义的“种族”界限。人类基因组计划揭示，全体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 99.9%。**所谓种族间的基因差异，仅占人类整体遗传变异的 0.1%。这些差异中，85% 存在于所谓“同一种族”的个体之间，仅 15% 分布于不同地理群体间。肤色、发质等表型特征由极少数基因控制（约 0.01% 的基因组），无法反映遗传全貌。而被视为种族标志的肤色差异，实为紫外线辐射梯度下的自然选择结果：高纬度人群浅肤色促进维生素 D 合成，赤道地区深肤色预防叶酸分解。类似的血红蛋白变异（镰刀型细胞）、乳糖耐受性等适应性特征，其地理分布与传统种族划分完全错位。

群体遗传学数据显示，人类遗传多样性呈现渐进式地理梯度变化，而非跳跃式断裂。非洲大陆内部基因多样性超过其他大洲总和，证明现代人走出非洲后的奠基者效应导致遗传多样性递减。将这种连续性变异强行划分为“黑人”“白人”“黄种人”，如同将彩虹切割为若干色块般武断。种族概念本质上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其分类标准随历史语境变动（如美国“一滴血原则”）。基因组宽泛关联研究（GWAS）证实，自称同种族群体的基因异质性，往往大于不同“种族”间的平均差异。2019 年《科学》杂志的多中心研究显示，基于基因型预测个体外貌特征的准确率，远高于预测其自我认同种族的概率。

现代生物学证实，人类是遗传多样性最低的物种之一。坚持种族分类不仅违背科学事实，更延续着殖民时代的认知遗产。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而非虚构的生物差异。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卢旺汀所言：“人类种族的生物学概念，已死在二十世纪的科学进程中。”

同时，民族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种分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达到顶峰，催生了现代民族的两个核心要素：统一市场和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割据，形成全国性商品市场，使原本分散的地区性经济整合为统一经济实体。蒸汽机与印刷术的发明，推动共同语言标准化；铁路网与关税同盟的建立，消除地域壁垒。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强调，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组织形式”，其形成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同步发展。**民族本质上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内核是人民基于共同生存境遇、文化传统及对压迫结构的反抗意识所凝聚的阶级利益联合体。**当群体在反抗殖民统治、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异化的斗争中形成集体政治身份时，不论其是否完全符合语言、地域等外在标准，都应被承认为民族。越南在抗法斗争中整合的多元族群意识、巴斯克人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强化民族认同，均证明**政治实践而非固定特征才是民族建构的核心动力。**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前资本主义社会仅存在**原始民族（Stamm）**的胚胎形态。以西欧封建社会为例，农民对领主的效忠超越地域认同，教会拉丁语压制方言发展，地方性集市无法形成经济共同体。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本质上是文化认同而非现代民族意识，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形成的官僚集团，与群众存在根本性文化断裂。可见，前资本主义的人民所忠诚的对象不是国家本身，而是**皇室、领主、城镇、地方或行会**。人们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等，而是城镇或城市的人。



与此同时，**宗教矛盾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延续，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被统治阶级有选择性地工具化**。封建领主通过将宗教教义与血统论结合，塑造“神选民族”的虚幻共同体，如中世纪欧洲君权神授论将法兰克人渲染为“新以色列人”，以此合理化对异教族群的征伐。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变为更隐蔽的异化策略：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宪法层面确立“宗教自由”原则，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操控媒体建构“宗教 - 民族”绑定叙事，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教派冲突。**2020 年开江县长岭镇的民族宗教矛盾排查报告显示，84.6% 的涉宗纠纷实质是资源分配失衡引发的经济利益冲突，却被异化为“信仰尊严受损”的表象。**

此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揭露，资产阶级通过将宗教矛盾升格为“民族宿怨”，成功掩盖了德意志银行家与犹太高利贷者共同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到了现代，美国福音派又将新自由主义包装为“上帝旨意”，使南方白人劳工将对跨国资本的不满扭曲为对穆斯林移民的仇恨；以色列当局利用犹太教正统派教义，将巴勒斯坦土地侵占美化为“应许之地”的宗教使命。2023 年金安区横塘岗乡调处的寺庙边界纠纷案例证明，当资本介入宗教场所商业化开发时，信仰差异立即成为争夺香火经济利益的动员工具。

可见，晚期资本主义通过制造“消费 - 信仰”的虚假需求，使有宗教特色的认证标识成为各种跨国巨头开拓各种市场的新型剥削工具，完成从精神异化到经济榨取的全链条控制。

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包括：基于商品交换的有机经济联系、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标准化

的国民教育制度。而这些要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缺失，这证明了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外壳。这里补充一下：美国联邦制看似分权，**实则通过宪法框架构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核心集权机制**。1787年制宪会议确立的联邦权力体系，本质是汉密尔顿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打破州际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度量衡、镇压谢斯起义等民众反抗而设计的制度。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使中央获得最终裁决权，形成“分权表象下的法律集权”。1913年美联储体系建立，使货币发行权彻底中央化。各州无权发行货币，联邦政府通过国债和税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宪法明文规定外交与国防专属联邦，各州国民警卫队战时自动转为联邦军队（1916年《国防法》）；宪法“州际贸易条款”赋予联邦调控全国经济的绝对权力，1937年最高法院对《全国劳工关系法》的认可，使联邦权力突破传统界限，直接介入劳资关系。历史证明，当阶级统治遭遇挑战时（如1967年底特律种族暴动），联邦政府立即启动《叛乱法案》实施军事集权。这种“危机集权机制”恰恰暴露了联邦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日常维持分权假象，危急时刻显露集权獠牙。

当然，《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工人没有祖国”并非否定民族存在，**而是揭示民族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通过民族主义达成三重统治：对外以民族利益包装殖民掠夺，对内以国家认同消解阶级矛盾，对工人以“同胞”概念模糊剥削关系。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解剖民族主义的双重性：**被压迫民族的抗争具有进步性，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素**。1914年第二国际的破产，正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以“保卫祖国”为名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恶果。资本的国际流动决定无产阶级斗争必须超越民族疆界。民族主义分裂工人阶级的典型例证，可见于美国“排华法案”期间资本家挑动白人工人仇视华工，而这种策略成功将周工资从3美元压低至1.25美元。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揭示，英国工人工资水平与印度殖民地的剥削程度直接相关。现代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不同国家工人的劳动过程成为同一剩余价值生产的环节。

作为反压迫实践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者100%地赞成女性、各被压迫民族、儿童、老人、残疾人的彻底解放，对此没有丝毫的犹豫、模棱两可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打击对女性、被压迫民族的压迫，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允许这样一种印象存在，即在某种程度上把“身份政治”当作一个可以归入阶级斗争一般范畴的次要问题。如果这些被压迫群体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准备将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推迟到社会主义胜利之后，这对马克思主义事业将是致命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扭曲。

诚然，女性（和男性）、各民族、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完全解放只能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实现，这样的社会只能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但是不能指望这些被压迫群体将他们迫在眉睫的要求置之不理，干等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天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平权，而不是特权；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身份融入一般生活，而不支持把身份当作一个炫耀的、为自己谋取特权的原因。（假设你是一个同性恋，那么你就不会到处宣传你是同性恋，同时穿的另类来表示自己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任何性取向都和异性恋一样是正常现象，有谁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异性恋而奇装异服，并无时不刻地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性取向呢？）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争取哪怕**最微小的改良**，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原因有两个：1. 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保卫工人免受剥削而斗争，捍卫生活水平、民主权利和文明生活的最基本条件，捍卫文化和文明免受野蛮的侵害；2. 只有通过日常斗争的经验，工人阶级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组织力量，把集体意识提高到历史所要求的水平，以促进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

我们举个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看法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被压迫民族通过革命性自决摆脱殖民统治或前资本主义的压迫，但反对资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分裂个人阶级国际团结。列宁指出，**压迫民族的个人阶级必须承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但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力量不应将分离作为最终目标，而应促成各民族劳动者联合**。当民族分离运动被反动阶级操控、破坏工人阶级整体利益时（如崩得主义试图用民族文化割裂阶级阵线），对其进行批判和纠正属于革命需要；但若一个政权以暴力强制同化、剥夺民族平等权利（如沙俄的民族压迫政策），则构成对自决权的践踏。关键在于是否服务于消灭阶级压迫：**前者消除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革命的干扰，后者维护的是剥削阶级的民族特权**。

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要求这些被压迫群体“为了革命的利益”搁置他们的日常要求，这种思想是愚昧之极的，这将使我们的斗争脱离现实且孤立无援。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革命将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同样，**坚持争取提高女性、被压迫民族、LGBTQ+等群体地位的斗争，反对父权制、民族压迫、恐同等问题，争取进步的改革和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所有人类的完全平等，是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职责**。

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必要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或是民族主义者，或是生态主义者等具体身份才能与这些重要群体联系起来？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马克思主义里本身就包括这些内容**。我们需要为了迎合他们放弃我们的分析方法，回到他们片面解读社会压迫的视角？我们应该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合适”去接手他们的理论吗？不。归根结底，所有问题（民族压迫问题、男女对立问题、恐同问题等）都具有阶级性质。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所有其他反压迫斗争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的基本分界线。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群众运动的经验的集中，因此它自然就包含所有的相关内容，而不需要特别强调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和这些群众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生态主义者等，同时告诉他们马克思主义包含什么、意味着什么。

XV

我们不是成绩的奴隶 粉碎教育中的物化与扭曲

他们孜孜不倦地在中国重建着资本主义秩序，开动国家机器宣扬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再生产符合资产阶级需求的劳动力，并按需塑造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迷失自我，误认自我，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学校在中国拥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崇高性与权威性，以至于资产阶级不断悄悄在学校灌输给工农大众子女的教育的内容上做文章，从而不仅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不断加固着缠绕在中国无产阶级身上的铁链，妄图从根本上消除人民群众重新当家做主的机会。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血泪、愚昧与无奈的当代教育体制进行彻底而无情的揭露。

异化教育

除了北京、上海、新疆这些臭名昭昭……赫赫有名的省份或自治区以外，大多数的地方的高中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是不需多说而一目了然的。结束了义务教育进入高中的高中生们，首先充当起合格的家庭投资的对象，承载着人民群众试图再生产家庭自身维持存续的期盼，其次作为即将投入劳动力生产厂的原料，走上了传送带。为了在如今生存环境越来越险峻的社会生活下去，难免增大了学生间的竞争，学生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往往甚至大于了学生与老师间的对立。尤其是在实验班这类地方，在学校对假期尤其是实验班的假期的疯狂克扣尚不明显的日子里，众多优等生自动建构起的学生之间的规训，虽然确实对各种影响他人的恶劣行径起到了相当的抑制作用，然而其又难免会在其他方面加剧对于学生个性的抑制。

等等，什么？学校会抑制学生的个性？我们在**北京四中参加舞会的亲爱的同学们**可不这么想。

然而，对于学生个性的抑制，竞争所导致的学生间的对立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不难了解到现代教育制度，事实上缘起于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工厂制度。作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运而生以满足生产组织需要的现代工厂制度马不停蹄地催生了现代教育制度，后者自然地是以青年提前适应工厂生活为目的的同时，进行最基础的通识教育，使之满足工业革命发展的基本需求。

- “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

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资本主义社会下，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也即劳动的积累而服务的。学校作为一个脱产的机构，却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学校为社会生产资产阶级需要的温顺的雇佣奴隶，那么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学生当然只能作为原材料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优等生与差等生的区别如此之大，甚至出现了实验班这种专门向优等生，也即最符合资产阶级需求，最能卖个好价钱的学生群体倾斜大量教学资源的地方。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实验班的同学，是“优等的材料”，在“加工”后，更能为学校乃至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罢了。而对于学校来说，特别是对于城市中的什么贵族学校重点高中与乡镇中学的区分来说，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为不同的阶级倾斜不同的资源，从而保持甚至加剧阶级的分化，加剧劳动者的分化。总归还是操纵起奇妙的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手，维护起自己的宝座。

在将学校抽象为一个加工学生这种原材料的工厂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由人“升级”成为了什么——**人变成了物**。物化，异化，外化。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

成绩，这个本应只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程度的表现的东西，摇身一变成为了学生学习活动的最终结果——学习成果的表现变为了学习成果本身。成绩实实在在地表现为结果，成绩实实在在地对象化、现实化了，然而进行学习活动的学生，却可悲地非现实化了。**工人非现实化为饿死，学生非现实化为跳楼。**成绩宛如成为了学习唯一的最终目的，而过程、方式，与学生首先作为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则宛如明月旁的繁星般黯淡了。我们学到的果真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们的成绩果真能够并且应当代表我们全部的学习成果吗？所用来标签化我们每个人的成绩的，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异化劳动的性质和我国特殊的机械化的教育体制所导致的在校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与个人需求所脱离而已。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这完全是撒谎，……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

当今高中生在学习过程中，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是真正快乐主动地在学习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学习为我们带来快乐的时候——学会某一个技能的时候，理解某一个思想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成就感，满足感，眼界豁然又开朗了一些，禁不住为自己的进步而高兴。然而学校，乃至现代教育制度对于学习成果的标准化，将会无情地抹杀大部分这种快乐——比如我学到了一个技能，可是这个技能高考不考；又比如我理解了某一个哲学思想，可是高考又不考哲学。同学们在发展兴趣爱好时，我猜大家或多或少都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你学的这个高考又不考，学这个干嘛用”或“现在好好学习等大学再学吧”。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

真正的学习过程应当是主动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理科知识标准化是必须的，然而相当一部分知识，例如语文，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知识的掌握或许更应当是独立的而非庸俗的一个过程。等等，为什么学校连文科的一些知识思想的学习也要标准化呢？我们不得不认识国家的本质即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认识到，这样的文科标准答案的限制是由于学校作为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一份子而产生的。学校是国家宣传本身统治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重要场所。然而现代教育制度对于学习过程与学习内容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与附着在其上的填鸭式教学，应试教育，所有这些构成的这种虚假的学习所带给学生的只能是痛苦、焦虑、抑郁，甚至是自杀，正如劳动的异化所带给工人的东西一样。

工厂和教室

对工人，资产阶级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进行了异化：劳动者在生产线上往往只能生产产品或者服务的一部分，从产品或者服务中再也看不出是哪个人生产的，资本家从生产线中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将其粉饰为经营的利润。生产过程中工人变成了机器，只是单调重复着无意义的动作。劳动不再是自由的、创造性的，而是强制的、自我折磨的。劳动变成商品，就有了可以被资本家随意定价的基础。在工厂里的生产关系使得工人之间的关系从紧密连接变得疏离，工厂里的人们只是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连接。



异化教育说：天哪，这简直就是我！

学习成果即成绩与学生被教育体制进行了异化：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雇佣奴隶的学校里，学生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学习，所得到的学习成果，成绩，或许在学生考到全省第一的时候会扬名万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只是作为学校升学率等数据的一部分而已。不仅学生创造的学习成果被学校利用，学生本身也作为商品在货架上售出，售出为无产者，少部分成为资产者，但总归是为资产阶级持续地创造着血淋淋的价值。学生在成为学生前，其首先是一个人！且不说对于学生的未来即无产者将会被剥夺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并使之成为外在的东西，体会不到人的主体性，就是在学校中，学生——人，却只是被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唯一的使命就是学习的学生来对待，学生的本质又何去何从了呢？在学校里的生产关系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从紧密连接变得疏离，学校里的人们只是为了学习的目的而在一起学习，

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连接。

学校中学生所遭到的无情的异化，与社会中工人所遭到的异化岂有多大的区别呢！

反对物化，首先就是要回归人。回归人，首先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秩序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就是要发扬作为人的个性。

无数的学生在学校中，被灌输着为了自己而努力奋斗的思想。果真是为了自己吗？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学习是为了自己，不学习就活不下去，仿佛学生从生来就是学生，只有作为学生的身份，没有作为人的身份，只要得到升学，考到大学，好大学那就是最大的成功，过程方式什么的是一概不予过问的。资本主义对人的不同需求所导致的对人的分级，标签化在这种浓郁的反动氛围中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有人或许会讽刺学生说，你不是反对补课吗，那你不补就是了，这句话宛如对一个工人说，你不是反对加班吗，那你不加班就是了。将人束缚在现状中的，在职场上源自产业后备军，更深层地来源于……，在学校中则源自家庭，学校的压力，还有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在当今祖国社会生存的难易程度。认为学生，或者说工人，可以单纯地通过不去取得自己的利益，是荒谬可笑，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说法。认为学生批评学校，自己又考不到多好，是一种气急败坏，是一种无能狂怒的想法更是可笑。在教学资源的分配上，学校极力将普通班和实验班分离开来，而在对学生的压榨上，对于实验班和普通班倒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视同仁，时不时实验班还要受到更多一点的“宠爱”。雇佣劳动是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互相竞争之上的，那学校又是什么样的呢？普通班的同学们指着实验班的同学们说，看呐，那就是实验班，嘴上说着不想补课不想学习，还是考那么高，真虚伪。实验班则被灌输着，普通班就是炮灰，毫无意义，实验班才是出成绩的真正的培养着的学生。学校就这样致力于分化实验班和普通班，一方面为资源的偏向张本，一方面也是为防止普通班实验班“串通一气”，图谋不轨。

直到现在仍有许多普通班的同学，嘲讽甚至敌视地看待实验班的同学，将其不是视为同学和朋友，而是视为敌人，似乎因为占用更多的资源，实验班就是学校一方的人了，受的压迫那就不是压迫而是奖励了，就这样主动迎合学校对学生的分化。学生们互相敌视着，互相竞争着，无可奈何地被内卷大潮裹挟着。学校笑呵呵地看着学生们你追我赶，成绩考出来，校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于是增加上课时间学习时间就能增加成绩的观点愈发根深蒂固了，学生的积极性对成绩的影响被彻底忽视了，学生成为了为了学校和“自己”生产成绩的工具，的机器。而机器是没有资格索要休息的。机器只要浸泡在工厂为自己编织的“为自己好”的美梦中渐渐沉沦，一心一意地做好机器，啊不，是学生的“本分”，为学校生产金钱来源，啊不，升学率就可以了，这就是学生的使命，多么无上光荣啊！多么光明无暇啊！

让学生的情感鲜活起来，让学生的个性张扬起来！ 学生们在反动的思想灌输中，在灰色的规训下，只能渐渐走向沉沦，渐渐走向麻木。而麻木

● “……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告诉他，他只是不理睬！”

完美地“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与悠闲”。

角色外溢

在学校这一制度化的场域中，未成年人被指派了学生的角色，然而在此之后，学生这一角色就成为了未成年人最为显著的角色，“甚至是唯一的角色”。未成年人在学校作为学生而活动，在校外仍然被要求作为学生来活动着。这样，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学生，在家里做学生，在哪里都是做学生，学生这一本应是人的众多角色之一的角色，从学校边界几乎外溢到了未成年人活动的所有时空之中。这就造成了未成年人被学生角色没完没了地规范着自己的行为，自己作为人，作为其他角色的机会被强制性地淡忘了。

不仅学生自己被疯狂克扣的假期、繁重的课业导致了自我意识上对学生角色的固化，成年人主观上也是如此。有多少家长在家里不是将子女作为一个应“恪尽职守”的学生来看待的呢？有多少老师在校外遇到未成年人，不是用看待学生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呢？这种对未成年人的精神上的束缚，将会严重禁锢未成年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表达。**他们总是被看作是一个学生而已。**

●“不过人们不是总是这么说吗？对比自己年轻的人？他们说，哦，有一天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你等着瞧好了。就像你没有权利拥有任何严肃的感情似的，就像你没有能力这样做似的。”

未成年人不仅仅有学生这一个角色，未成年人同样作为人，同样有着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和严肃的感情的权利。**他们有权这样，并且必须这样。非如此不成其为独立完整的人。**

社会固化了学生的角色，资产阶级的市场赋予了这些原材料们“厚的”规范期待，从而必然造成学生的负担之深重。想要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做“好学生”，做“好材料”，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更加之众多同龄人的相互竞争，这样需求方统一一致，供给方相互竞争，结果自然是内卷没有赢家，而资产阶级的腰包永远是一天比一天鼓起来。

成年人可以在脱离了工作的时空后卸下角色的负担，而未成年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从精神压力上来说，未成年人并不比成年人轻松。然而比烂没有意义，角色“说到底只是人的功能性的存在方式”，“人毕竟不同于角色”。就像欧文·戈夫曼认识到了角色对人的非凡意义，但也同时明了角色依附、角色固化对人的压制性、窒息性危害。绝不能忽视角色距离的重要性，即人在扮演一个角色时，应该通过特定的行为与该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

将本应多维、丰富的未成年人简化为学生这一维，对做学生做的成功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对于更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则是莫大的伤害。

●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来说，固化在他们身上的“角色之茧”将他们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无法看到一丝光亮。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破除对于未定型的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未成年人的桎梏。未成年人应当尝试多种角色，尝试不同的功能，而非固化于单一的死板的角色，如果在学生这一角色扮演上失败，不至于因此从此落入深渊，而是可以从别的角色中重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多重角色会使人获得潜能实现感，在多种角色的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否定异化对学生的人的本质的否定**，从另一个角度上实现对人的复归。

学生角色显著必然导致未成年人的其他的角色受到压制。同样的，这种对于其他角色的压制

对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要求也存在着限制的影响。未成年人在家中固化了学生的角色，继而无法发挥作为子女的角色功能，家长也无法以对待子女的方式对待未成年人，从而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再被撕扯，未成年人从而持久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甚至就此沉沦。迫于家庭的期望与压力崩溃自杀的例子数也数不清。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的未成年人，用他们的身躯砸到地面上的沉闷响声，一下下地为我们敲响警钟。

与学生角色的外溢相伴随的是学校的外溢。学校与家庭本来是各有边界的功能与伦理实体，如今学校将学生安插在家庭之中，家庭边界对学校来说形同虚设。有人说，“学生通过书包将学校背回了家里”，事实上，学生本身与他们融为一体的学生角色就已经将学校带回了家里。家庭因而变成了学校的衍生物或派出机构。也就是说，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家庭的支配与控制。

学校的伴随性外溢不仅包括家庭，还包括社区乃至社会。不难理解学区这一现象了。学校对家庭的控制，逐渐地扩展成了对社区的控制。这也就是学区化地区价值飞速抬升，乡村等教学资源匮乏的地区价值一再降低的原因之一。学校的外溢也是社会性的。不难理解校外教育机构，“影子教育”的兴盛。学校由于外溢而无处不在了。与学生角色的外溢相伴随的除了学校的外溢，还有教师角色的外溢。教师也被制度化的社会角色所不断规范着，固化着。教师在家里，在休假时也和学生一样无法获得全身心的休息，而是受制于自己固化的角色，无法与工作脱离。

只有打破了私有制，才能够打破资产阶级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社会的一切成员的强制性要求即禁锢，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教育选拔

人们向来呼唤一个公平的选拔制度，可是什么是公平的选拔制度呢？怎么样才能是公平的呢？有些人认为，对于被选拔者来说，付出的越多，从而获得的机会就应当更多，这种基于被选拔者努力程度的选拔，是比较能使人接受和信服的。可是有另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不以被选拔者的能力作为标准，任人唯贤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下，**所谓的公平选拔到底是服务于谁的？**

将被选拔者作为主体，重视被选拔者的付出与努力的过程，实现多劳多得，这是服务于被选拔者的公平。

将被选拔者作为客体，重视选拔者的利润最大化，将被选拔者视作货架上的商品，只根据一个个的标签考察商品的最终的性能，选拔最符合选拔者需要的人，这是服务于选拔者的公平。

于是又有一些人探出头来，高呼调和，融合个人努力程度与个人能力评价综合作为选拔标准，似乎是实现了“公平”的选拔制度。果真吗？

在私有制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真正公平的选拔制度即基于个人努力程度作为选拔标准的制度的。在成绩现实化为学习的结果并且学生物化为原材料和商品的过程中，学生个人的活动，学习的过程是不会被选拔者加以考虑的，他们只是以成绩作为最终的标签，按照资产阶级与

市场的愿望进行分拣与发货。在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不平等的基础上，还存在着私有制所必然导致的个人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环境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前提下构建起来的以成绩作为普适标准的选拔制度，事实上**仅仅服务于选拔者即资产阶级，仅仅以选拔者的目的即资本的积累为转移，仅仅与选拔者的利益为标尺**的这种选拔制度，当然不可能是真正公平的。这种选拔制度，只是为资产阶级选拔合格的雇佣奴隶罢了。

教育是为了什么呢？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不就是为资本主义培养奴仆的同时，再生产社会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吗？作为将普罗大众与少数人分化开来的选拔制度，不正是这项工作的得力工具之一吗？为什么有人在害怕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到高等教育？为什么有人在害怕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归根结底不就是**资产阶级稳住统治宝座的诸多手段之一**吗？那么，要想打破



旧学校对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要想摆脱旧教育下学生遭受的物化与异化，要想实现人的平等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难道除了打破这一切的根源即私有制，**难道除了阶级斗争，还有别的路子可走吗？**

“要为国家选拔人才。”国家？谁的国家？是人民群众的国家吗？**是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吗？**为资产阶级当走狗，就是当人民的刽子手。为什么只能选拔一部分人做人才，不能人人都做人才吗？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让每个人获得全面的发展，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可以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人，真正具有当家做主的能力，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有不好，那就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老爷们相当不好。他们会把嘴都气歪的。因为在人人全面发展，人人当家做主的社会中，靠产业后备军维系与加固的锁链将再也禁锢不住无产者；在人人摆脱了庸俗的思想的强制性灌输的社会中，老爷们拼命隐蔽的剥削与压迫将在众目睽睽下无处遁形。

“高等教育是给有能力的人上的。”果真如此吗？北京、上海的老爷们的少爷千金们，果然是全靠了学力升入高校的吗？河南很大，大到有上百万高考考生；河南又很小，小到装不下一座大学城。果真是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考生中没有能力的人多吗？所谓的能力，是否也要包括经济能力、地区教学资源乃至家庭的社会权力关系在内呢？私有制下出于分化人民群众而导致的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单一学校内尚且如此明显（实验班与普通班），在地区之间则更是一目了然了。少爷千金们可以通过高尔夫入学一众 985、211 和双一流高校，以这种绝大多数人平常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东西作为高等教育的通行证，怎么，难道高尔夫也是所谓能力的一部分吗？有人叫嚣着脱不下来的长衫，鼓动过剩的大学生下放工厂单位，殊不知有多少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连这件脱不下来的长衫都穿不上呢？他们果真是没有能力吗？

“不是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还达不到，是生产力还不够。”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就是出自于对于历史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唯科学主义理解。社会规律作为规律，在客观性，必然性，可重复性，普遍性等方面与自然规律是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将社会规律简单地与自然规律等同，“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只能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语）。社会规律的承担者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社会规律。我们考察每一个社会现象，如果只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出发，忽略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就会走向历史观上的机械决定论与宿命论，得不出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结论来。

不可否认的是，选拔制度之废除，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在此之前，至少公平的选拔，而且是以人的努力程度为标准的真正公平的选拔，是可以在生产资料已然收归社会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在那里，人人自由而平等，不再受任何虚伪的庸俗的思想的浸泡，个人能力的发展，将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的程度，而非金钱或权力，或社会地位又或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并不养懒汉，社会主义养的是自主的独立的创造性的人。社会主义打破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禁锢，给他指明解放自身的道路。**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将会大大弥补个人之间生理上的环境上的不平等，并且在此之前，经济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已经被公有制所消除了。因此，社会主义的选拔将会是建立在本身公平的基础上的公平选拔，对经济、身处的环境、发展条件等一切外在因素的不平等的消除，将会是这个公平选拔制度之所以平等的大前提。在那里，学生不再是为了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需要而学习，而是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了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学习。应试教育与附庸其上的填鸭式教学，将会成为无用的垃圾，它们甚至没有资格“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而是直接被解放了的人民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教育应当是面向人民的教育，应当是服务于人民的教育。以培养雇佣奴隶为目的的吃人的资产阶级旧教育已经吃掉了太多的人了，它的累累罪行。它对人民的伤害，已经从各地无数跳楼学生的血泊中清晰地映照出来了。旧教育对于人民的分化，已经从北京四中舞会迷乱的灯光中，从学生高尔夫大赛的招牌里照射出来了。旧教育再不能存在下去了。一种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首先意味着它从现实的人的发展形式变为了人的桎梏，变成人自主活动的桎梏。教育制度也是如此。而只有变革生产关系，变革教育制度，才能够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同样才能够带来人的解放，带来人的自由的推进。

他们如何做？

中国教育最根本的出发点，无外乎在于使劳动者的子女在成为合格的雇佣奴隶的同时，磨灭

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从而确保自身的发展与存续。这主要是通过如下一些手段实现的：

歪曲历史。 比历史虚无主义更反动的莫过于历史修正主义。为了对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进行歪曲，中共除了通过大量阉割历史事实外，还持续进行着无耻的所谓官方的反动定论。前者在删减、“规范”历史、政治等教科书的同时与其他信息管控手段联合行动，使人民群众得不到对于历史的全面认识，即使半信半疑，又苦于找不到更全面的信息，结果只好接受官方得出的有利于维系中共统治的历史解释，被迫选择性地接受那些有利于中共塑造其虚假的光辉形象的历史事实。不管其正确与否，不管其全面与否，在中国人从小就从父母长辈那里养成的对学校的无限信任与服从的意识的指导下，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认识就这么被改写成了中共的谎言。由于缺乏了对历史的正确全面的认识，人民群众自然难以产生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权的反思，又加之中共庞大的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无数御用文人摇动起笔杆，那么中共自古正确至今亦然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即使见证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是转念一想，之前也没见有什么好的呀？好吧！于是也就只是摇头默叹中共教给自己的自我安慰口诀：“还是不够努力”而作罢。**将劳动者彻底变为无害的羔羊，甚至切断其头脑中反思意识的来源**，这就是中共历史等学科的教育的目的与现实。

树立刻板的规范意识。 高中阶段的选科中，很少会有人是为了学习政治而选择政治，如果不是为了拿分或是无奈之举，没有人会去学习那些写满了看一眼就知道是故意在恶心人的教条词句。即使选择了，在一个不选政治或历史的学生捧着一本相关的书籍阅读都会被质疑其选科的环境中，我们又能奢求选择政治的同学们脱离那充斥着鹿克思主义反动思想的教科书多远呢？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似乎被选择的科目打上了难以摆脱的烙印，标签，似乎选政治的就只能天天背那些恼人的废话，似乎选历史的拿着本哪怕是政治或是社会学相关的书籍看都要被问一句“你不是选历史的吗？”连学生们从这两门本应是生动的学科中学到的知识也被标签化了，似乎选政治的同学不会大谈公文体的废话，不会破案量刑就是渎职，似乎选历史的同学不准时背出个什么时代或是什么文件出来就是对不起选的学科。历史和政治的情况十分类似，无论是书上的内容，还是考试中体现出的要求，无不体现着机械与束缚。历史考试中表面再开放的论述题，背后也总是统一的死板的格式与论调，这样的题目**巩固的是学生对于歪曲了的历史的认识，同时也不断地磨灭着学生多角度独立反思历史现象的能力；巩固的是中共在学生心目中伟大而又正确的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形象，磨灭的是学生质疑与批判的能力甚至愿望。**

强制性的双重思想。 一面是语文老师在《种树郭橐驼传》中热情地歌颂“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一面又在作文中严格要求着那少得可怜的“健康向上”的充满着奋斗的鬼话的立意，要求着那令人作呕的文绉绉的语调；一面是学校大放着素质教育的厥词，一面又疯狂地压缩着假期，延长着课时；一面是学生们目睹着大城市的少爷千金们优哉游哉的学校生活，一面又起早贪黑，过着仅仅充斥着内卷的生活。这些都是学生们看在眼中的，但是从小养成的对学校的服从，还有对身边其他学生在无形中建构起的服从学校的秩序的服从，以及周围势不可挡的内卷大潮，毫不留情地将愤慨的他们淹没，磨去锋芒，**留下泡得温温柔柔的洁白羔羊。**他们愤怒，他们悲伤，但是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人的感情就这么被无力改变的现实扼杀了！他们除了欺骗自己，自我安慰还有什么法子呢？他们除了要么投身内卷大潮，要么彻底躺平，要么就此一跃而下之外，还有别的路子好走吗？**是要怎样的绝望才会将一个个活生生的青年逼上生命中最后的天台啊！是要多么残酷无情的现实逼着他们只能靠双重思想带来的短暂慰藉聊以度日啊！**

成绩挂帅的评价体系。 这首先包括着对成绩较差的学生的规训。不同成绩的同学们在讨论问题，特别是历史政治相关问题的时候，每个人的头上似乎立刻就显示出了各自的成绩，不

选择此科目的同学不用说，那是纯纯凑乐子来的，大家根本不会把他们的见解当真。而有的人的头上顶着全市几百名，有的是几十名，好像这种人所发出的见解，就自动地比别人的见解多了一层成绩加持的圣光，差生们看见这轮圣光，岂敢违抗这种以成绩决定说话分量的秩序？大多数时间是只得顺从的。越是在这种教育中取得更高的成绩，就越代表着对这种教育的认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成绩就代表了一个学生在这种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假如他考到了第一，那还了得，他岂不是句句是真理！相应地，**官方那更加权威的话语岂不更是真理中的真理！**除了成绩在这种体系下自动获得的权力外，成绩挂帅的评价体系还导致了学生学习的目的被单一地概括为成绩，似乎只要成绩考的高就是无上的胜利，并在无视家庭条件、地区教学资源和社会关系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后，强制性地在不平等上推行看似平等的评价体系，甚至就连这样中袖也要为少爷千金大开方便之门，在这一点上想必河南、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不会有丝毫的疑惑。中修假惺惺地推行的艺术特长选拔中，坐拥更多资源的富家豪门的优势是不消多说的，普通家庭甚至要牺牲无数财力与时间以及学生本人的意愿来追求从特长方面与起点便已高不可攀的富家子弟竞争，更不用说什么高尔夫那种普通人连碰都没机会碰的贵族运动了。中修的评价体系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学生在违心的内卷中丧失的无数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与富家子弟们在逍遥的环境中所获得的相比起来，就拉开了用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壕沟，前者无数的努力与付出，最终也只不过是成为这名劳动力的一部分为资产阶级创造价值罢了。

扭曲价值观的培养。成绩挂帅的评价体系引出的无休止的内卷中，同学们本应美好的互助关系被无情的竞争所泯灭了，在这种环境长达三年或六年的浸泡下，未成年人对于竞争与内卷已经是司空见惯，以至于到了职场上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内卷中你追我赶，在他人为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迷失了自我。无尽的上课，繁重的作业，周考，深夜的晚自习，无不在刷新着学生对以后工作待遇的承受下限，无不在预演着生产场所的机械劳动，分工，交换与分配，**血淋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这种不自觉的演习中得到了这个社会的未来的确证。**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每天六点四十开始晨读，十点放学的学生不对着 996 大叫福报呢？毕竟 996 每周是放一天假的，而我们亲爱的高中可是两周才能放不到一天啊！对于自由的空闲时间的奢望就在高中被彻底消灭了，996 的剥削制度不仅在学生的心中合理化，甚至还福音化了。拜金主义在学生的头脑中生根发芽了，顽固的小资产阶级心态在学生的心中潜滋暗长了。人身为人的价值观就这样被扭曲并在漫长的压迫中固化了。这是直指每一个人心脏的利剑。人的心就此被改造为奴隶的心，物品的心，机器的心了。**这是杀人。**

难免有人化身看破红尘的教师爷或现代的马尔萨斯，复读起什么中国人的本性和人口理论来，什么“14 亿人如何治理全世界没有人知道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这种陈腔滥调。这些可笑的辩护士们的吠叫，中国的学生和工人听得已经够多了。他们明确地知道：**中共共产党统治集团、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正是中国共产党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本质，决定了他们是如此地害怕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的处境有哪怕丝毫的反思，以至于他们厚颜无耻地大肆阉割着历史，歪曲着群众的认识，又通过教条化机械化的背诵使人民对政治产生排斥感，并利用标准化的刻板印象的加深疏远着人民群众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把政治变成少数人的政治，变成寡头的政治，与此同时又大谈致富经成功路，使人民的自主思维被压抑，沦为温顺待宰的羔羊；

正是中共浓厚的官僚主义作风决定了他们与人民群众的极度隔阂。形式主义与贪污腐败盛行的官僚评价体系不断向下腐化着学校的评价体系，从而进一步扭曲着学生评价体系。无数的空话与假话，自上而下渗透着全中国的方方面面。瞒上欺下的中共干部那害人的形式主义，将人民群众变成自己的政绩中或真实或虚假，总之是可有可无的数据，并疯狂地动用一切手

段来镇压着一切不利于自己乌纱帽的忤逆行径。人民群众在中特的手下只是被作为不论死活的奴隶般对待；

正是这些权贵和官僚所捍卫、依靠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将未成年人培养为可堪使役的雇佣奴隶的骇人要求，这不仅包括强迫学生学习无效无用或违背本意的知识，还包括通过对压迫剥削的合理化辩护打消奴隶们反抗的可能，不断加固着束缚着劳动人民子女乃至整个无产阶级全身的锁链，妄图使人民不得翻身解放。**正是中共复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一切拉回市场的脚下，迫使一切为了市场和利润而服务。**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妄图通过对人民群众子女的分化挑动内卷与对立，在一次次同样处于被压迫地位之中的无产者的相互斗争中攫取沾满鲜血的暴利。

我们如何做？

人的意识不是也不会是线性上升的，就如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线性上升一样。以脱产为铁证强加罪名给进步学生，无视他们的诉求和力量，是任何先锋队都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抖擞起精神为“进入居民的一切阶层中去”准备，为动员起一切反秩序的力量准备，为从现在开始着手抵抗中国进步左翼力量的原子化状态准备，为提早哪怕一天具备给群众提供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准备。

“现在就组织起来！”

论仕途主义问题

统治阶级的仕途主义

“仕途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官场的写照。“仕途主义”狭义上是指在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系统中，**官员将个人在系统中的升迁视为最大的自我价值**。中国的历代政权为了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十分重视官僚制度的作用。超长的历史周期和极大的规模与广度，使中国沉淀出复杂的官场文化。在生产力没有充裕到满足每个人的自由需求时，只能有少数人通过独占多数资源来实现从生产中的解放。阶级国家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这种不平等局面，以让社会不至于因资源争斗而崩解。维护不平等的局面必然要使用暴力、强制的手段，官僚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对公共权力的实际占有使其得以依靠这一点为自己谋得超过一般人的利益。阶级国家承认并保护了这部分利益，官员被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在等级制中，官员的权力大小和待遇大小与具体的等级挂钩，升迁就成了官僚最为突出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将升迁看作走一条长路，那可以说“仕途”一词是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它。**

仕途主义是官僚对自我价值的病态追求。仕途主义的官僚通常为了升迁，而忽视社会的其他需求，拿社会、甚至是整个统治阶级和政权为代价实现一己的利益。这自然就会伤害社会的健康，伤害政权的合法性。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承认仕途主义正确，都会要求打击官僚主义歪风，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痛恨官僚以权谋私（他们本来就在不危害政权的限度内给予了官僚特别的利益），而是为了自我保护。中国至今仍在沿用集权式等级制的官僚制度，官僚主义作风、腐败作风的土壤与前现代有很大重合，历史以来民间对官僚的批判到了现在也不过时。在如此条件下，中央推行的反腐活动、作风建设不外乎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却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革命团体的仕途主义

这种条件也可能会反映在不健康的革命团体之中。当组织缺乏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即事务决策由少数上层的闭门会议做出，多数成员无法“染指”，那么上层就具有不一般意义。这与国家官僚的性质并不相同，因为前者仍是依靠组织成员的主动性来实现“权力”，总的来说，他并不能总是偏离服务革命，而后者依靠垄断公共权力，总是将决策之中的野蛮、草率成分

一并加于社会上。即使如此，组织的上层与下层依然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只有上层才有决策的权力，只有上层才能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那么为了实现作为革命者的价值，“我”就必须首先在组织中“升迁”，这便是仕途主义萌芽。**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广度、深度都得到大的发展，还会出现工作项目的浅深、狭广差别，如若组织过分宠爱成熟、突出的项目，资源过分倾斜于它，那么就会形成隐形的项目上下差别，同样会提供仕途主义发展的土壤。

总的来说，**革命团体不健康的发展，会为其成员造成这样的认识，即为了能够尽可能实现自己作为革命者的价值，就必须首先在组织中谋得上层的职位。**这就构成仕途主义了。更有甚者，**忘记革命初心，一心追求虚荣地位抑或是被权力欲熏心。**这样的人就会荼毒革命队伍，当组织发展到拥有调动物力的能力时，离贪污腐败恐怕也不会远。因此，认识到革命团体中的仕途主义的危险是有必要的。将这一点与阶级国家官僚的仕途主义条件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



仕途主义的革命者有何利益可图？

不同于国家的官僚体制，革命团体经常处于生存挣扎的状态，尤其在那些政权稳定、政治极权的环境中。不仅革命团体因政治反对得不到社会资产主要所有者——资产阶级的可靠支持，而且由于非法环境，资金的募集也相当困难。在这样的重压下，**革命团体在物质上极为匮乏，同时成员的精神也不断受到挑战。**极为普遍的是，**那些轻如浮萍的革命团体的运行，只能依靠成员无回报的奉献，**也可以说是为爱发电。这种形式虽然允许在匮乏条件下，让这样的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根基并不牢靠，长此以往，人心散尽，小组织也就渐渐消亡，回顾数月乃至数年的热情工作，只能发现什么都没有留下，徒劳一场。

“升官发财另寻他路”，投身革命团体，以利益的眼光看，大抵没有收益。然而，仍不断有新的青年在探索这一条路，这真是人的意志的一种魅力。他们对旧秩序有着批判的眼光，积极进取全新的世界，社会的未来正要由这些人创造。所以说，能下决心参与到革命团体中，

服务到其的建设中，就此不能吹毛求疵了。以此来看，仕途主义怎么可能在这扎根呢？毕竟这里没有财富可求呀？

官僚的福利待遇，当然地吸引了大批循规蹈矩的人投身仕途，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就这些人而言，革命的思想相当浅显甚至是从不加考虑的，革命的先锋从不会出自这样的人之中。能够投身革命团体的人，就已是心性独特的相对少数了。有革命之志的人，虽不那么谋求物质的富足，但也不会就此成为圣人，而会发展出另一层面的需求。广泛的是，产生对革命利益的需求，但每个人不一定就会产生对此的正确理解。例如**有的人会产生围绕自己的偏见，认为自己的作用对推进革命极为关键，因而怀疑所有对自己的否定，形式上它会扮演成“怀疑官僚主义”“怀疑针对个人”“怀疑批评者是错误立场”等似乎大义凛然的客观理由。**仔细甄别不失为革命团体的课题之一。

把对革命利益的错误理解汇集起来，就可以形成仕途主义的认知，只不过用“为了革命”包装起来了。更别说革命队伍中还可能**有真正的阴谋分子**。仔细甄别来，革命团体中的仕途主义和官场仕途主义性质仍不相同，前者究竟是要以服务革命为支撑，至少形式上要做好，而后者就是不加掩饰的宦海沉浮。可前者不会转化为完全的官僚主义么？完全会，革命团体的仕途主义的恶化发展不是不在发生，而是速度被恶劣的生存条件减慢了，这种条件既包括没有物质利益可追求，也包括团体成员的政治健康。这两项条件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仕途主义的扩张。

与宗派主义的组织拜物教交合

在组织结构中占据上层是仕途主义最为普遍的追求形式，那么这个组织又是否是力量最大、地位最高的一支同样决定仕途主义的利益大小。革命团体有着隔离的性质，因为它们需要保护秘密，不可能完全向外界公开自己的状况。这样的话，任何一支组织就更加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既有成员上，换句话说，老成员更能为组织内部所了解，资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当选因素之一。如此情况便很明显了，**更换一个新的组织，或者组织改组造成成员换血，都会深刻地伤害仕途主义者的利益。**

一想到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就意味着把不了解也可能不信任自己的他人引入组织中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受到挑战，意味着要把权力分享给被新人信任的他人，仕途主义者不免会气到发抖。当然，这在形式上可以扮演成“引入落后分子损害队伍的纯洁性”“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我们是意见不统一的”的“客观”理由，再次提醒我们仔细甄别是革命团体的必要课题。**那么如何保卫自己的地位呢？只要组织间不融合只业务合作就好了，**因为“意见不统一”“只是工作有共同合作的点”。总之，组织的权利不应该向那些已经去信任别人的人分享。我们应该吸纳那些从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组织的人进来，这难道不是仕途主义者对于可靠的、意见一致的革命者的理解吗？

组织拜物教崇拜组织架构、组织制度这类伪似客观的上层建筑，这与仕途主义的目的不谋而合。革命团体的根本在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织的一切运行终究是要由人来实施，因而对架构、制度的观点终究不能脱离人的意识的范畴。**越是看重纯粹的上层建筑，就越轻视活生生的人的观点，即越脱离组织的根本。**通过强调职位、制度的不可冒犯，仕途主义者愈加能够远离基层的观点，巩固自己的地位，至少这意味着“坚强有力的领导”不是吗？此外，与信任、忠诚的相关性，使仕途主义者可以在宗派主义上找到工具。**在这些意义上，宗派主义、**

组织拜物教、仕途主义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问题，它们相互交合、互为臂膀，共同撑起个体的升迁之路。

坚决反对仕途主义

革命不应该是个人建功立业的仕途。革命团体应是所有个体政治参与的综合。分工、纪律、指挥本身不是目的，它们只是保障政治利益实现的途径。**没有同志们兄弟般的合作，我们不能实现任何一点伟大的创造。**仕途主义的惰性就在于，它埋没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过分地强调个体的作用。上层的任何旨意，到了下层究竟还是要下层自己实施。没有充分的解释和教育，或者是旨意根本不关照下层的意志，机械照搬、执行懈怠、旨意变样都不可避免。仕途主义者走到头，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的话不再有人认真聆听。怎么办呢？就这样吧，只要自己的地位不被侵犯，革命的减缓和毫无成效都是可以容忍的。仕途主义最终成为目的本身。

健康的民主集中制是防范仕途主义的有效工具。革命团体的意见不应由机械的周期选举和提案投票组成，而应在每一步、每一项，都在活生生的人中去寻找来源。这就意味着组织方式的灵活性、意见的思路多变、不固定的制度。这并不奇怪，追求制度设计的相对永恒和成员严格的循规蹈矩只是组织拜物教的幻想。通过这样的措施，让一切生动的、创造性的、杰出的观点和人物站上舞台，而不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仕途主义者就无处遁形。

对于个人来说，须知基层的任何一人都不是小人物，上层也不是成绩的代名词。社会的任何环节要做好，离不开这一环节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人，我们都是我们手上工作的唯一依靠。**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属性，让校园管理、企业生产、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命令者与受命者的分野，让生产实施者反而不是生产决定者，让多数人成为生产活动中纯粹的机械工具。参与革命组织的民主生活，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做主自己的命运。祝愿我们都能做出大胆的创新。

XVII

论左派内部的批评 与自我批评

在整个中国的左派内部是常常要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不仅左派要讲，连中修也还在讲，但是中修和一些左派组织群众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已经和历史上的批评以及我们最初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变成了形式主义而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间的革命内核，而又有一些组织、群众，他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批评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不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而是要么不愿意接受批评、回避矛盾，要么不负责任的进行派别斗争、打击异己，失去了通过真诚的交流和反思来促进团结和进步的意义。本文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重新阐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革命者间应当的作用和做法，重申同志之间批评的目的以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并对各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导致的错误倾向进行批判。

什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什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不是整人，不是攻击同志的武器，而是帮助行为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同志认识到错误并改正，是个人、组织和革命工作进步的方法，是去追求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和能够推动革命前进的方法的方法，批评是在随时的活动中判断一切自己和别人的观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对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和做法要坚决批评，对于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方法要坚定立场，对于自己的观点要时刻检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自己错了就要主动承认改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矛盾是符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不是分个谁对谁错。

不要害怕批评，要害怕自己不符合实际，但是也不要害怕自己不符合实际。害怕自己不符合实际是为了让自己不要不符合实际，要经常的检查自己的观点做法是不是符合实际；不要害怕不符合实际是说有错误了就要改（不要怕犯错，要怕的是有错不改和不承认客观实际，怕的是要为此和同志闹情绪和犯主观主义），不符合实际了就看看实际的是怎么样来纠正自己的认识和做法。是人就会犯错，犯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要尽量避免犯错，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犯错误的地方然后勇敢的承认改正。

怎么对待批评和被批评？

对于同志的批评来说，要乐于接受乐于观察同志的批评是什么，但是接受不是说要承认实际上批评错了的批评，而是说有批评本身这个现象很好，如果说同志批评你了，他可能是观察

到你哪里有不足了，哪里有不实际的地方了，我们做事情和认识世界讲的是要符合实际，那就没什么不好接受的。同志把我们的问题指出来了我们就改正以更好的进行实践；但也可能是同志在什么地方认识不够全面或者没有认识你在说什么东西做什么事和为了什么，这个时候就要分析他对你的批评是哪方面不正确，哪方面实际上是你没有的错误，哪方面是他自己理解错误和认识不足导致的认为你有错误的批评，去分析进行批评的同志是因为在什么方面得出了不全面不正确的批评，耐心的和他讲他批评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批评的对不对，然后给他指出他是因为什么理解错了或不全面而进行的批评，也就是反过来纠错和相互批评补充各自不充分的认识了，看看双方是哪里还有不足，这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实践来说是极有益处的，即使是系统的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人也不可能说总是全面的认识到某样事物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去进行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认识的互补，其他同志可能常常看到更多方面或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方面。

如果被批评了，首先要观察的是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错误，有没有不实际，是不是像批评说的那样，要先去顺着批评的思路走，而不是说看到批评就觉得是有人要来反对自己，然后不给人批评不承认批评来相互攻击，这是不对的，是不利于革命实际的；如果发现自己有或没有同志批评的问题，要怎么做前面提到了，但也不只是对是否有错误和指出的错误进行思考和反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是促进双方共同进步和扩充认识的好时机，比如说就别人批评的去分析自己为什么错了，为什么没有看到实际或者没有更全面的看到问题，去分析这样的原因，这样的原因中又有主客观条件的区分，主观条件的问题发现了也能借此改正和推广；而通过批评对问题的讨论研究，我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更深入的去探究，这还可能会发现双方都没有发现的事物的某些方面来更好的促进实践的展开；如果自己其实没有错，那也可以按照上面的逻辑对这个问题进行展开，就同志为什么会认识不全面和没有认识到你为什么实际上没有错的这方面去推动实践。

关于一样事物的矛盾上的观点批评常常不是彻底否定或单方面分对错的，这也是前面多次提及的实际上一个人在某方面认识不全面的问题，矛盾事物是复杂的多个方面且不断运动的，显然我们不一定能经常的把握一样矛盾的整体样貌，这时就会得出一些不够全面的结论，对其他同志的观点得出一些不够全面的结论，然后对其进行批评。而批评的发生也常常不是单方面的有问题，不是只是你不够全面而我没有问题，但这里只是在一般的事物矛盾上的我们批评一个人的认识如何没有全面的把握矛盾整体的，不是批评方法论的；为什么对矛盾整体总是把握不清，在实践上实际也总是犯错误的，这就可能是有方法论的根源的，而方法论批评的性质就是严肃的了。

团结与批评的辩证法

批评经常是双方就一个问题都没有全面的认识而互相批评互相进步的，因为人不能总是把握事物发展的全部方面，而事物的方面还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讲团结——批评——团结了，批评不是目的，团结才是，团结是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实践，团结在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的，进而为全人类的利益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利益着想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求他讲客观实际，讲唯物辩证法，没有系统的世界观方法论可以学，但是不能否认客观实际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地位。一切按照客观实际上来，按照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来，一切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去，还愿意承认实际愿意沟通，愿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奋斗，那有什么不能团结的呢？这是团结在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

的立场上来。而不要其他一切形式标签或者形而上学和宗派主义的判断，人家既然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要革命的，那首先要从团结批评团结出发，把人家当同志，像无政府主义的群众，他们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但是人家讲要推翻资本主义实现“自治”是不是？那他是实现“自治”的愿望大还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愿望大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给人家讲为什么不能是无政府的，因为它不符合物质运动的规律，不符合客观实际以及不能真正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嘛，那最终作为一个个人来说他是要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主义表象还是要实际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些固执的认为一旦不讲“马列毛”就不是要革命的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同志，我们也要和他们讲到底是要一个教条主义的，形式标签的“马列毛”，还是要一个能最终使革命胜利的唯物辩证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嘛。对于其他一切客观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群众，主观上愿意为无产阶级服务，愿意革命的群众和同志，我们都要首先和他们讲团结，然后才是对于他们错误的认识进行批评并要求改正，要把客观实际是什么样指给他们看然后帮助其理解改正。不能给人批判一顿后就扣个右派落后群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或者说成是其他的立场问题然后不管人家了，这不是群众路线，这是不把人当人，把自己变成某种表面意识形态评判的政治机器了，还是非辩证的不符合革命利益的。而群众也可能有做出了反动行为的群众，这里有一个程度，不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都说了要给机会改正嘛，也不能抓着改正了的群众或同志过去的错误不放，特别是本来是一个认识问题的话。



革命不是靠一言不合就彻底划清界限、不讲任何争取的态度和做法的，这不但可能割裂我们已有的革命队伍，还可能把其他尚未在“革命队伍”中的但完全可以争取的群众和力量直接拒之门外，这与我们的唯物辩证法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革命不是靠划分简单的敌友来取得胜利的，而是靠不断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帮助广大群众提高觉悟、统一思想、整合力量的过程；是在我们的根本原则和目的的面前“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敌人搞的少少的”，进而又把

我们的朋友变成我们的共产主义同志。

所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要争个对错，批评批判本身也不是党同伐异的工具，而是一起来研究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什么样才是能推动革命实践的，帮助我们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批评的过程中应该是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攻击的，即使人家有什么错误，在到不能团结的地步前我们也不能上纲上线或非理性的人身攻击。

批评的尺度与实际上的宗派主义

在所有的批评中，有一种批评是最为严肃、最不能随意进行的，那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世界观、方法论、乃至阶级立场的批判。因为这不是指出某个认识有错，不是“你在这里忽视了 xxx 的方面，你在这里犯了主观先验的错误”，不是对某次实践偏差的批评，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判断——这个人是否可以团结？这个人是否属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个人的根本立场是否已经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且不可争取？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种批评是要上升到立场问题和敌我矛盾的性质。

一旦对这样的问题下了结论，就等于否定了一个人或者群体的整个实践方向，意味着将他从革命队伍中排除出去，否定了他根本的阶级立场和作为实践思考的根基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一种根本的政治性的结论。这种批判如果建立在不全面、不辩证、甚至完全主观判断和情绪化的基础之上，那不仅是在伤害被否定的个人，还是在破坏整个革命运动的团结，是在把自己孤立起来，是在脱离群众，是在用“革命”的名义搞大清洗、党同伐异和派别分裂。

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左派中并不罕见。这种动辄给人贴“右派”“小资”“反动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标签，不从具体事实分析具体问题，只要观点不合自己口味，立场就被全盘否定，这不是批判，这是宗派主义式的打击报复，是小集团和个人利益本位的思想清算，是形左实右。

比如说，有些同志一听到什么思想就非得给它挂上“什么派”，立马变了脸色，然后挂着这个名字的人就全是敌人。这种“因标签或特定观点就否定一切”的做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是完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不少左派群组和组织中，就有不少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人在处理内部争议时，明显是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时，不是以实事求是、团结批评为出发点，而是一上来就满口脏话和扣帽子，只要你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那你就是“右倾”“反动”“敌对分子”。而有的组织在被多位群众同志和其他组织明确指出其观点存在严重片面性甚至实质性错误之后，不是要去思考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误、是不是事实，而首先是拒绝自我反思、拒绝公开回应，反而可能继续在内部制造舆论，说“这是敌人的围剿”“群众也会被反动思想影响”。这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作为思想主导的话，更严重的往后面发展就变成了其他反对他们的都是机会主义泥潭派了，对其他组织大肆攻击大加污蔑，尽管它还自称革命但已经质变为立场问题了。

这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批评团结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和教条主义，发展下去也只会变成后者的实际上的机会主义，到那时就要更加的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来掩护他们实际上的反动了。我们提出批评不是为了打倒谁，而是为了让革命更好。对批评意见的压制、对错误的掩盖，只会加深革命队伍内的不信任并凭空创造矛盾，把一切对话空间彻底压缩成互相谩骂、和无底线的扣帽分裂。

在面对一些实际上在分析方法就完全错误的错误的观点时，当有人提出异议并把客观实际是什么样摆在面前时还有人要出来“和稀泥”——他们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嘛，这个分歧没那么重要，只是次要矛盾没必要一下子搞清楚谁是对的。”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而恰恰是这种对原则问题“和稀泥”或认识不到两个根本对立的观点是原则问题的态度，才使得错误被反复遮掩，才让路线斗争变成了“个人恩怨”式的口水战。如果连客观实际都摆在了面前还不愿意分个对错，如果连对群众负责的根本立场都不能坚持，那我们是在革命吗？还是在保全自己没有错的面子？

宗派主义和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同根同源的，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革命中的不同表现，都是不尊重客观实际，不以革命利益为第一位的表现，放任组织在理论和原则上的错误只会使得革命利益被进一步的损害。

为了革命胜利的团结与批评

必须明确，对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阶级立场进行批判，只有在我们真正了解其思想来源、发展过程、实践表现、以及与实际运动的相互关系之后，才能慎重作出。否则，不是批评，而是打击；不是革命斗争，而是对异见者的清洗；不是团结同志，而是制造敌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旗帜鲜明反对错误路线观点，也要实事求是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们不能把理论批评当成口号战，更不能把路线斗争搞成自我标签化、盲目划界的宗派狂欢。只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放在为了革命的实际利益上，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进行批评，我们才不会像调和主义者那样掩盖矛盾或是像宗派主义者那样自我孤立分裂革命队伍。

真正的革命者，应该相信群众的判断力，用事实和理论说服群众；而不是一听到批评就打标签、一看到异议就扣帽子。只有那些不愿意自我改造、不能接受批评、不是真的为革命实际着想的人，才会害怕别人揭露其错误。对于那些在群众中有思想分歧的组织，我们也不能用“和稀泥”的态度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因为不是所有主张都对革命有利，所有的观点都是可以相互调和的，也不是所有错误观点都可以妥协。我们的批评必须明确目的——不是为了争一时之胜、树立某个圈子的正统地位或因个人恩怨对其他同志进行打击，而是为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胜利。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一种政治上的耐心——即便面对的是普遍的错误也要有信心通过实践、教育、斗争和团结，把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地团结到革命事业中来。不是靠派别划分，而是靠实践和真理赢得群众和其他同志的支持。

针对没有翻墙渠道的读者们

推荐 VPN：魔戒

国内直连官网（任选其一）：

- <https://mojie.app>
- <http://mojie.host>
- <https://mojie.co>

打开官网注册账号（邮箱注册，常用邮箱即可），登录后台，购买套餐（支持微信、支付宝）

邮箱推荐使用 Proton，其家的 VPN 也有安全保障：<https://proton.me/mail>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